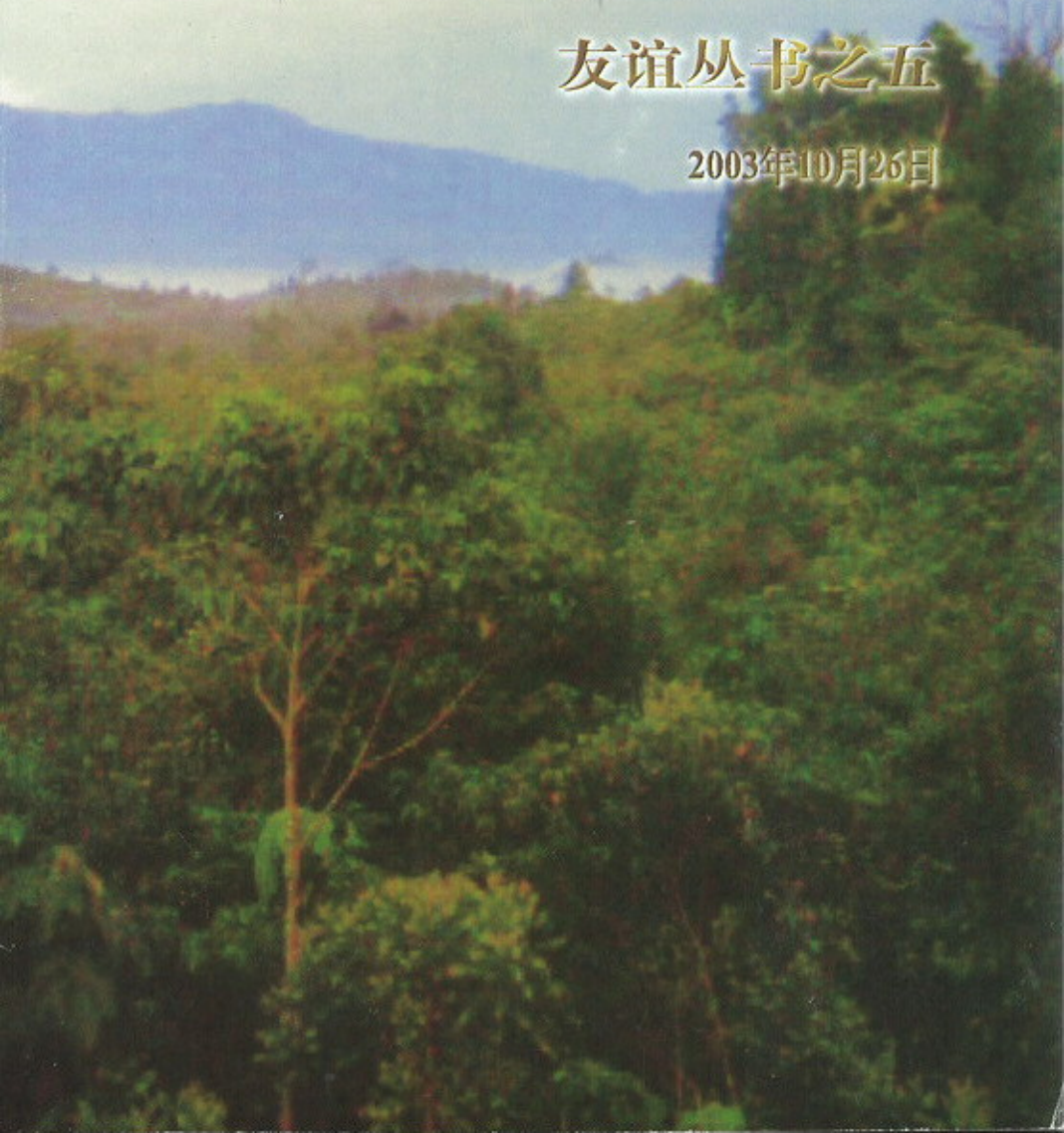


# 砂印边界风云

友谊丛书之五

2003年10月26日





砂印边界风云

2003年10月

友谊丛书之五



# 砂印边界风云

## 《友谊丛书》第五辑

### 边界风云

与印尼共成立联合部队的回顾 …… 向民	3-8
当年开展第一、二省边界开展民族工作的回顾 …………… 实尚远	9-26
马印军事对抗 …………… 江宏	27-28
网漏鱼游，死里逃生 …………… 林风口述	29-32
水中行军 …………… 黄锦隆口述	33-35
惊险的两次被伏击 …………… 尤远口述	36-46

### 回顾历史

印尼“9.30”事件 …………… 烛光	47-51
---------------------	-------

### 回忆录

风雨战斗历程	
一、老温的片段回忆录 …………… 老温	53-66
二、文生的片段回忆录 …………… 文生口述	67-74
三、广平的片段回忆录 …………… 广平口述	75-81
四、往来边界的日子 …………… 余添松口述	82-86
五、独自“非法”战斗经历 …… 詹雪娇口述	87-91
六、加帛访友忆当年 …………… 罗丁	92-96

### 转载

华族是印尼民族的组成部分 …… 许天堂	97-117
印度尼西亚“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及其活动概略 …………… 蔡仁龙	118-140
苏哈多暴政下的排华惨情 …………… 红至樽	141-155

铁蹄践踏 奸杀一家六口见证记 …… 红至博 156 - 164

### 人物介绍

砂拉越人民的好儿子 …………… 许贵仁 165 - 172

一位可敬的出色海上交通员 …… 广平 173

### 编后话

封面 峰峦巍峨、气势磅礴的砂印边界

与印尼共商在联合部队的工作

(一) 成立大埔山部队

# 边界风云



# 与印尼共成立联合部队的回顾

- 向 民

## (一) 成立火焰山部队

1965年印尼“9.30”事变后，印尼右派军人集团篡夺政权，对印共及其同情和支持者进行血腥镇压，使印共的力量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这一事件后，印共中央发表《自我批评》声明：检讨了过去所犯的错误，决心从严重的流血经验中吸取教训，坚决批判修正主义，纠正错误，决心从血泊中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印共西加省委在新年期间发表了文告，表示从1967年开始，要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但是，他们没有武装，要找北加同志。他们在昔邦找到在那里搞后方地下工作的北加同志蔡国志，并通过他去华莪找在那里的北加革命领导人。

1967年2月间，砂罗越人民游击队总部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会上决定在双空与华莪中间地带，建立个前哨站或中间站。这个据点将同一支、二支一样起着战略协同作用。平时负责华莪等地的联络工作并为三支购买与运送粮食、日用品与药品等物资。这项任务交由黄纪晓负责，刘顺胜、朱云辉、叶碧珠等负责人也加入工作。随后，他们就离开双空基地前往华莪。

1967年4月6日，印共西加省委书记苏斐安(Sofian)与副书记陈礼夫来华莪山区(Sangau Ledo)与北加共产党的林和贵和黄纪晓就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商讨，并做出初步的决议。随着，印共派人下到昔邦，叫陈文协和邓武吉省委级干部上去华莪进一步研究，然后再跟北加林、黄领导人协商，最后一致通过以下的决定：(一)印共决定在火焰山成立一个部队；(二)军事方面由我方负责，帮忙他们训练军事干部，带动他们的军训；(三)政治工作互相配合，统一领导。大家也同意共同成立个宣传组，出版《不灭

的火种》刊物；（四）后勤部也互相配合工作；（五）成立联合指挥部，由黄纪晓任司令，以反击印尼军的反革命“围剿”；（六）地方工作，由各自分头去做，西加的由他们主要负责，我方给予配合与协助。

印尼右派军人集团上台后，不但在全国掀起反共的浪潮，也掀起反华排华的浪潮，他们也把矛头对准西加的华人，特别是 65 年至 67 年，反华发展到了更加严重的地步。印共西加省委为了争取华侨和统一整个华侨问题，於同年 4 月 16 日发表了关于《西加华侨的决定》。这一《决定》有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具体纲领是要西加华人团结起来，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并与北加革命战士结合起来。

同年 5 月，印尼政府强逼华人在华莪地区进行修补道路，这是无代价的劳动，引起华侨强烈的不满。为此当地华侨成立了一个“西加华侨反迫害斗争委员会”，加强团结力量，准备进行斗争。我们以前在华莪成立的农会，也跟他们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当时印尼右派军人政权实行野蛮的白色恐怖统治，对在卡布亚斯河(Kapuas)一带、西加各地的华人进行烧、杀、抢的政策。西加的万足地、孟加影、华莪和甲板巴厘等地没有被杀被捕的华族年轻人，被迫上山进行自卫自发的斗争。那时西加各地布满干柴，只要点上火星，星火就到处燎原。我们同志利用这血淋淋的现实揭露反动派的野蛮政策，从中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从而动员了大批华人青年来参军。那些没有来参军的，也当起了民兵的角色，支援与配合我们的斗争。

当时成立联合部队的山区很冷，为了表示我军有顽强的意志与火热的斗争精神，因而命名此山地为“火焰山”。而在此山地成立的部队，等于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 4 支队，称之为“火焰山部队”。这支部队有一百多人，多数为印共人，负责人是黄纪晓、刘顺胜、朱云辉和印共西加省的省委正副书记。火焰山部队成立了三个月后，在华莪印尼空军机场进行了一场夺取武器的战斗。

## （二）夺取华莪空军基地武器

1967年6月，有群众反映情报，即华莪空军基地有很多武器，但戒备松弛，只要进一步掌握情况，做好动员与部署，乘敌不备、出其不意，完全可以胜利夺取武器。

刚好，4月间，马足地、孟加影和华莪一带有近百位群众在刘汉明、马云的带领下，来到华莪，寻求军训。6月间印共又收了一批新兵，我方帮忙他们做短期的训练。我们一边训练，一边派情报组进行侦察。通过侦察与调查，我们了解到他们有多少兵力，属于什么兵种，拿什么武器，和怎么布兵，等等。

7月13日，我们又得到一个重要情报，即7月17日他们的头目会来。由于6月间印尼军队内有发生磨擦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是枪对枪、一个集团对一个集团。为了避免这种冲突，上面就把整连空军驻兵的武器收起来。在7月17日头目会来检阅，还会收回枪支，若没收回就不能向上头交待。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的好机会。印共发展的新兵很缺乏武器，他们只有少数陈旧的枪，多数都打不响，正需要装备自己。经双方开会研究后，下决心打。我们从第一批训练的印尼新兵挑选出6个军事较好的队员，加进我们队伍，人员共有30个。

7月13日，做出战斗决定后，还花二天时间进行紧锣密鼓的部署。

我们同志最后掌握到的情报是，掌管钥匙的四个守兵，换岗的时间是14日到16日，他们拿什么武器都清楚。这样，战斗一开始，我们就迅速控制了整个基地。这个贮存武器的仓库是当年荷兰人做的，相当牢固。当时我们准备用氢氧焰割铁条，却不意拿到钥匙，行动进行得更快，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在行动时要求尽量少杀伤，因为里面有些是好

人，因而行动时只打死 4 个守兵。印共还写了字条，大意是说：我们不是要打你们，而是借用你们的武器反对政府。

这场战斗，夺取武器共 100 多支枪，其中包括 50 多支来福枪，和 50 多支冲锋枪，而我方无人伤亡。我们又即刻派 2 个通讯员，用一天的时间到四面八方去通知 80 个左右群众来帮忙运走武器。这些负责运输的群众平时要到各地去进行劳动生产。当晚，就一股脑儿把武器搬完，天亮之前撤回火焰山。

### （三）“7.15”夺武战的影响

这一场夺武战斗震撼印尼当局，他们派了陆军教导团特种部队（又称红帽兵）来驻守，并调查实况，以为是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打的，但调查不出其实质。初时，第 12 军总司令 DiaKud 曾到处贴告示：“我们原是朋友，共同打马来西亚，为什么变成打印尼？……希望你们不要留在此地，回去更好……”但接下又发生了 2 个印军去甘榜采波罗蜜被火焰山部队歼灭，并缴两把 AK47。同时，於农历 8 月 25 日有 12 个印军去参加李三保、杨长新的生日会，也被火焰山部队全歼。

这一系列的攻击行动，使印尼当局极为恼火愤怒，他们即刻就派了几千名兵力进行追剿。他们在华莪的宋彬港、马拉版、上下板先、哇郎等华族农村进行四光（即杀、烧、抢与砍）政策，其中杀了几百名华族群众，约有整千名群众被迫上山，撤向巫落河港一带。上山群众跟火焰山部队在山里坚持一个月多。后来，印军来搜索，发生交战，部队同志在前面狙击，掩护群众转移。新军区司令苏玛尼走马上任，他采取怀柔政策，到处贴告示，号召群众，只要出来，就不对付。后来中老年、妇女、小孩先后出去，被遣送到山口洋、坤甸等城镇去，民兵和青年留在山上。出去的群众中出现坏分子，出卖了情况，造成几百群众被捕。

长达一年多的持续“围剿”。初期火焰山部队坚守阵地，敌军来就打。后来内部出现逃兵，有些沦为敌人的耳目帮凶，伊班群众在敌人的威迫利诱下，也反过来带了猎犬配合印军的军事行动。逐渐困难越来越多，坚守阵地三个月后部队撤进森林，坚持斗争。面对敌人有增无减的军事进攻，又面对粮食的短缺，火焰山部队的领导人认为，分散战斗更有利于保存与发展。於是 1968 年 1 月后，火焰山部队北加同志与火焰山部队印共同志分开战斗。

一年多后，火焰山坚持不了，黄纪晓带领剩余的成员转向第一支队去，后来又再撤进国内。

在打华莪军用机场之前，据说火焰山部队没有通知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事后获悉，攻打行动后不到一星期，印尼空军就到双空第三支队去轰炸。

#### （四）西加印共的最后战斗

1967 年初，印共成立了以鲁斯兰（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代主席的新中央，并继续领导印尼人民斗争。1968 年 6 月，印右派军人集团发动了对在爪哇省勿里达县南部的印尼共中央所在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使印共力量又一次遭受损失，鲁斯兰 7 月被捕后被判死刑。

1968 年初，火焰山部队已化整为零，印共所领导的大部分成员，有的下到昔邦，跟那里的群众自发力量结合起来坚持斗争；有的分散到山口洋、坤甸、三发等沿海地带跟地方同志结合起来，开展地下工作；西加印共省委书记苏菲安则带领了一股武装力量辗转於华莪、孟加影、中公港、上侯、横平山里、松柏港农村以及米仓港上游等一带。

1971 年，印共在米仓召开了一次西加印共扩大工作会议。会议是由苏菲安主持，还有陈文协、郭明山、老马、老潘、邓武吉等 10 多人参加。会议提出建党和开展群众工作，

以及要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会议总结一条经验：要进行有效的武装斗争，就要作长期的准备，而且要有人民的觉悟和参与，才能进行武装斗争。苏菲安强调，往后的工作重点是在卡江上游，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以华族为主的在三发、华莪一带。

印共订 1972 年 5 月 25 日为“升旗日”，在兵营等处升旗，在沿海城镇广泛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这样做却弄巧反拙，无形中告诉敌人他们还有力量，结果招致敌人从三发至坤甸沿海城镇进行大逮捕，使印共遭受严重的损失。

1972 年，印共领导的武装斗争仍在昔邦、华莪和卡江等一带坚持斗争。但在敌人的高压政策下，有些在“围剿”中牺牲，有些被捕，有些离队投诚，革命武装力量进一步遭到削弱。

苏菲安带领 10 多人的最后一股武装力量，是以合法的身份潜伏在 Kualan 自己的伐木场。1973 年，印尼当局出动了特种部队——红帽兵，从山口洋和坤甸分二路合击苏菲安的部队。

在敌人不断“围剿”打击下，最后只剩下苏菲安和他的两位警卫员。当时他分配其中一个警卫员下来搞粮食，不幸在途中被捉。叛徒带着印军上去包围苏菲安。印军在包围袭击中，苏菲安的头额被打中，而壮烈牺牲。另外一位警卫员逃出，后向敌人自首。至此，印尼共组织全面瓦解。

# 当年开展第一、二省边界民族工作的回顾

实尚远

## (一) 小引



实尚远留影

民族问题没有解决，土著人民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北加革命不能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因素。但不应该就此否定过去事业的性质和成就。

“人间正道是沧桑”，古今往来，人类社会的正义事业和斗争，尤其是不能一蹴而成的。一般上都是要经过反复的失败、甚至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逐渐呈现出胜利的象征，也是事物发展的一般客观规律。

作为革命事业和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工作也一样要经过上述过程。

这些用无数鲜血换来的失败的经验值得人们加以重视珍惜和进行探讨、总结经验，取得教训。

既然有着上述作用和意义，这里就暂且让我回顾当年开展第一、二省的民族工作。

## (二) 殖民地统治所造成的民族问题

英殖民主义的反动统治，不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激起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百多年的英殖民主义的反动统治，造成了我国各族人民，尤其是乡区和内陆的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生产力、文化政治等方面，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和发展。相反，却

是在掠夺我国的资源财富，和始终都进行着高压和欺骗的反动统治，苟延残喘其殖民地统治的寿命，达到维护其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权益。

英国人为了上述目的的需要，也进行了一些简单和粗糙城市与乡区基本设施的建设和改良。

所以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所看到的，除了城市英国人统治中心，军警及其行政机关和华族人民用自己血汗所凝成的基本设施的建设外，也有几条极为简单粗糙的石头公路，从各省省府伸展到乡区内陆，甚至到印尼边区。

此外即使在一些非常偏远落后的土著乡区和长屋，都可以看到，由英国人所建立和开办的教会学校和教堂，在进行着所谓“开化”落后民族的奴化教育的工作。

由于上述的殖民统治造成了我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土著人民在政治文化、经济生活等方面的极端落后，愚昧无知，几乎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荒野、穷乡僻壤，和半原始的状态中。

### （三）简略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有剥削和压迫，必定有反剥削和反压迫。从英殖民主义统治我国开始，我国各族人民就进行了强烈的反抗和不懈的斗争，这也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客观规律。

太久远的不提，只是从 1841 年布律克皇朝统治开始的一百多年中，我国各族人民就发生了连绵不断的反抗和斗争事件。

1845 年由沙立夫 奥斯曼 (Sharif Osman) 所领导的海上反抗白人的斗争，即著名的马鲁都之役，其活动海域是汶莱、北婆和砂拉越的美里、民都鲁一带。

1848年，由石隆门华族矿工领袖刘善邦、黄甲所领导的反抗斗争坚持到1850多年，才基本上被平定。

1849年，由林吉尔所领导的海上船队反抗白人的白丁马鲁之役后发生的。

1853年由第二省伊班民族英雄林达所领导和进行的砂督山之役坚持十多年的斗争，接着又发生了第三省拉让江上游伊班民族的反对拉让江、乌驿河（Oya）、沐胶河等地区被侵占的马沙荷事件。

1942年到1945年有沙巴人民领袖郭益南所领导的沙巴人民义勇军所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

1946年，砂拉越马来族进行一场反让渡斗争。除了抵制、游行示威之外，更刺杀第二任总督司徒华，在反让渡运动遭受严厉的镇压而告终止。

1946年北婆三邦，正式由保护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虽然保持十多年的相安无事和相对的稳定，不过却酝酿着一场更深入更广泛各族人民自觉的反抗斗争。

1962年12月8日，由汶莱武装起义所点燃起来和北共所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革命的熊熊烈火，一直持续了将近30年的漫长岁月。

上述我国各族人民所进行的反抗和斗争，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却给了统治阶级沉重的打击，逼使英国人不得不提早给人民较多的自由民主，也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这是一方面。

#### （四）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农民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左右，土著民族几乎都是属于上述阶级的群众。因此“农

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边区各民族农民则是革命的决定力量”。（引自：《1965年的建党宣言》。）

从上述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革命不但和农民阶级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而且更突出明显地和这个阶级中的土著民族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砂盟始终把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摆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公开政党成立后，甚至提到革命的议事日程上来，加以积极处理。

民族问题和工作，确实属于农民问题和农民工作。早在公开政党成立之前的1957年，砂盟不但积极着手开展农运工作，而且也提出积极向民族区进军，和开展工作的实际行动。不过，由于当时主客观困难和种种原因，只能派出少许干部到民族地区，作短暂的居留和熟悉地理民情的工作。因此，工作成效并不大。

公开政党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也只是通过公开政党的活动形式，到民族地区去，号召他们参加公开政党。

### （五）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基本认识

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农民运动是革命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民族问题和唤起他们的觉醒，是农民工作最为主要的一环。

这里讲的是民族，主要是指华族以外的其他土著民族。这些土著民族，包括马来族、比达由族、伊班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

其中巫达（海陆）是三大民族，人口相当接近。不过当时陆海达雅民族合起来，人口会稍微多一点。

华族主要是居住在城镇和城镇附近的乡村地区；马来

族主要是居住在各大河流沿岸和城市周围的乡村地区；陆海达雅族主要是居住在深山僻野，穷乡僻壤，尤其是各大河流的山区地带。以上大概是我国三大民族分布的基本情形。

华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革命和斗争传统。首先接受先进思想的古老民族。马来民族政治觉悟程度次于华族。很早之前，马来亚就有一批先进份子，是参与马来亚共产党和公开左翼政党的缔造和组织者。1962年汶莱武装起义，也是由汶莱马来人的地下组织所策划领导的。三大民族中虽然达雅族最为落后，不过在历史上，也有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反外斗争。

殖民主义为了维持对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反动统治，除了进行暴力统治和高压政策外，也在各民族中实行了挑拨离间，造谣中伤，制造仇恨和进行分而治之的分裂民族统治。

在历史上英国人所煽动和挑起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有石隆门华工的反外斗争，后期演变成大规模的民族屠杀。日本投降英国人回来初期，也曾趁着人民对日本汉奸的不满情绪，企图在华人社会挑起对其他民族，尤其马来民族的不满情绪。1961年和62年，为了配合镇压革命运动，英国人也曾经在某些地区，发动过达雅民族砍胡椒头、迫迁，企图掀起排华的民族矛盾冲突事件。还好由于华族人民的政治觉悟的提高，和各族人民长期都和平友善地生活在一起，英国人当时的阴谋诡计始终都没有得逞。

不过，由于土著民族的落后无知和殖民主义者长期的愚昧奴化教育政策，无疑的必然会导致土著民族的觉醒和民族工作的开展增添了种种的客观困难。

只要摊开地图，我们不难看到北加里曼丹。砂拉越的东南方和印尼交界都是一望无际的高山峻岭，深山僻野山蛮水绕，土著民族聚居的地方。北面临南中国海，河流交错的平原地带则是华巫民族寻找生活，获得温饱和生息的土壤。

土著民族在上述地区，是在婆罗洲岛上，尤其砂印边界的土著民族是最落后的民族之一，他们甚至一生人都不曾到过城市，见过世面，几乎长期与世隔绝，只有少数居住在与边区小镇较接近的长屋甘榜，才有到过好像第一省的安拔梯头、打必禄、望割，第二省的鲁勃安都，第三省的桑、加帛，第四省的巴南上游和姆禄，甚至更加接近砂印边界的山区进行物物交换。他们的物物交换是极为简单的，一般上他们所拥有的是树胶、树积（狗巫油）、蛇皮、穿山甲壳，甚至是猪牛羊鸡等家禽。到上述地区的小店，换得他们所需要的铁、盐、毒鱼白药和火石等用品外，其他日常用品，尤其是那些奢侈品就谈不上。

他们生活不但简单而且落后，那里没有正规学校，他们几乎都是文盲，不管男女，都没有穿衣服，只是把树皮或树叶织成围巾，围在身体的主要部分。就是来到上述地区的小店，也是男女不分，全身精光一起到河中洗澡和戏水。十几岁的少女没有穿上衣，是平常的。只要和她们相处一个时期，关系比较熟悉后，在大庭广众面前，可以倒卧在你怀中任由抚摸。

他们除了一年一度的稻谷生产，果子收成和养少许家禽外，就没有其他方面的生产和收成了。平时主要是靠打猎捕鱼，采集野果等维持生活。

由于他们没有卫生知识，所以卫生工作很差。妇女生产做月，根本不懂得对身体的调理和补养。他们主要是靠生火取暖维持身体温度。住家和周围环境，从来没有打扫，清除污秽。家庭用品，饭锅等用具，几乎从来没有进行卫生清洗。

生产力和思想落后，对自然界现象，和自然界所产生的各种情况和所引起的问题，无法理解和加以克服，致使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迷信思想。因此对一些天灾人祸，不但无能力克服，只有听天由命。由此所产生的各种禁忌，不但影响到人民的正常生活，而且也影响到生产的进行和生产力的提高。由于土著民族的贫困落后，生活在远离城市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外界讯息难以传入，尤其是正确进步的讯息不容易传播给

他们。由于人数众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向来都是革命和反革命所进行争夺的对象。

由此民族工作不得不是一项长期、艰苦、曲折的工作。

以上是当时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基本认识。

## （六）调派干部

民族工作是砂盟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就必然和革命的成败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

有了上述开展民族工作的目的和政策之后，干部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真正在砂盟领导下比较有规模的调派干部奔赴民族工作地区，还是1961年尾、62年初的事情。

也就从那个时候起，砂盟中央才从第一省农运部先后调派了小杨（原名杨贤华，已牺牲）、方生（原名赖石辉，已牺牲）、山民、钟娘锦、刘震雄（原名庄美祥，已牺牲）、施敏、黄英（原名彭梦合，已牺牲）、莫明思（原名朱谨旺，已牺牲）、贝泽、耕夫、抗生、钟坤柱、李景请（已牺牲）、邓XX、刘XX、王明、丁乙、田友、坚民等；学运部有敏华、胡勇（陈玉球，病逝）；工运部有陈自强、田云端、黄勇；公开党部有弗克，公开政党代表小D（原名杨柱中、已牺牲）。

上述部门所调配来的干部，除了个别人派往第二省，大部分留在第一省民族区。

## （七）立足点和工作起点

留在第一省的民族工作干部和成员，主要是被派往古晋县的巴达旺和安拔梯头，西连县的打必禄和打马庚，下砂隆县的实文然，石隆门县和伦乐县等地区。

这次砂盟派遣干部开展民族工作，已经不是像前一次那样，只是在那里进行短暂的工作和居留而是决心长期留下来开展工作了。

由于这样到上述地区开展民族工作的时候，必须通过一定关系寻找立足，便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了。

一般上除了通过公开政党的关系外，还要在当地有一份固定职业，作为掩护，才能长期立足和生活。所以当时他们到上述地区，不是租借土地种胡椒，就是去打工，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上述地区还不是纯粹属于民族地区，其中有不少在那里从事小生意和进行农耕的华人。这些华人，多数已经和当地的土著民族，有着通婚关系。他们不但通晓当地的民族语言，而且在风俗习惯方面，几乎都和他们一样了。

这些和当地土著民族通婚的华族群众，他们的前辈，同样是从中国来的。大部分都曾经受过中国革命的影响和熏陶，尤其是早期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甚至更早之前的革命运动。由此他们都具有中华民族的优良革命和斗争的传统。

民族干部在上述地区立足，和作为工作起点，不但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也自然提供了不少方便於工作上的条件。

### （八）对开展民族工作的领导

从上述部门调来的干部，都先后奔赴工作岗位了。这个时候领导机关的建立，对他们的领导，便是往后成败的主要因素了。

1962年，田友联系坚民，然后通过后者，联系各地的民族干部。同年中，第一省民族工作核心的领导组宣告成立。组长宇太（1966年离队），成员包括丁乙、田友、黄勇、坚民和公开政党代表的小D同志。

1962年“6.22”和“7.23”的逮捕事件发生后，为了适应当时局势的剧变，砂盟所领导下的工作，逐步由公开转入秘密，由城市转向农村，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退却，和积极保存革命力量。除了对民族的加强领导外，也进行以下的重组和调整。

在第一省省委的直接领导和具体指示下，1962年尾63年初，第一省南部边区民族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

第一省南部边区民族工作，主要是指从石隆门县开始到第二省的砂印边区。

委员会书记坚民、宣传敏华，财政黄勇，监察弗克，成员包括胡勇和施敏。

委员会负责下的地区如下，敏华，施敏联系XXX三人组成一个小组，负责上砂隆河、打马庚、打必禄以下公路地区的民族工作；黄勇联系七午、贝泽、钟娘组成一个小组，开辟打必禄和砂印边区的民族工作。胡勇联系小杨、方生、山民负责安拔梯头和砂印边区的民族工作，坚民联系黄英、庄美祥、弗克和耕夫负责四哩鲁邦河巴达旺公路一带的民族工作。

不久，敏华、施敏和他们领导下的成员都被捕，工作也遭到了破坏。

63年到印尼后，为了更好地执行第三项革命总方针和“大力开展民族工作和积极准备武装的条件”的具体指示，除了继续开展第一省南部边区的民族工作外，也要积极把工作推向全省去。因此扩大和健全化民族工作的领导机关，便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了。

64年初，一个以丁乙、坚民为正副书记，成员包括水浒（原名郑瑞绵，不久被调往民族工作部门负责宣传出版工

作，直到牺牲为止）、抗生、刘震雄、田志锋、弗克、黄勇等人所组成的第一省民族工作委员会宣告诞生。

委员会所负责的实际工作，除了原来第一省南部边区民族工作外，也真正扩大到全省的所有地区，不过重点是放在砂印边区。

此外，坚民也开始兼第二省砂印边区的民族工作。

接着第二省砂印边区民族工作的开展，被派往那里的干部有谢亚声（原名蔡义清）、祝春（原名郑维忠，已牺牲）、李智、赖福强、李武飞、高金兰（女性，已牺牲）、沈蒂玛（女性，陈爱娘，已牺牲）、赵大山（原名吴德荣，已牺牲）、黄珍娜等。

上述被派往第二省边区的民族工作干部，其中谢亚声、高金兰、祝春、赵大山、赖福强等人被派往英吉里利、鲁勃安都的砂印边区；沈蒂玛、黄珍娜、李智、李武飞等人，被派往横江、板督一带的砂印边区。

砂盟除了发动和调派专门的干部开展民族工作外，也积极通过被派往参加北加国民军的第一、二、三、四连的干部成员，除了在军事上和有关方面配合外，在他们所到之处，也负责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通过他们的活动，至少促进了边区军民的良好关系。

部队成立后，除了领导机关和后勤部，几乎整个部队都是民运队。

### （九）执行砂盟的决议

1962年汶莱人民党武装起义前后，砂盟先后组织和成立了秘密的砂拉越农民协会，和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以及提出第三项革命方针等一系列措施和工作。

汶莱武装起义后，我们执行砂盟所提出的“以地下工作为主，以民族工作为中心，大力开展地下工作，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条件”的第三项革命方针。这时候，土著社会的主要组织工作，除了继续通过公开政党的组织形式去发动群众外，更重要的为适应当时形势的要求，必须把秘密农民协会和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的组织形式，作为土著社会的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更广泛、更深入团结农民阶级，和其他阶级组，成包括各民族的反帝反殖广泛的统一战线。

正因为有了上述组织形式的提出，才有可能比较大规模的组织和发动群众进入武装斗争的历史阶段，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群众已初步被发动起来，砂盟所领导的所有工作，才有可能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退却，积极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 （十）砂盟在民族工作部门的宣传和出版工作

砂盟在处理民族问题与开展民族工作的时候，也是始终非常重视宣传教育和出版工作。宣传教育和出版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大部分的口头宣传也是从文字出版而来的。

除了砂盟早期所出版的《民族独立》、《学习报》、《工农报》，外围组织的机关报，以及公开报纸不提外，到印尼后，第一省省委驻印尼地下小组，和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所出版的就有专供给民族干部阅读的《拉让江战斗报》和用伊班文编写和出版的《民族呼声报》（Suara Bangsa）。还有第二省北加民族解放同盟机关刊物——《解放呼声报》和许多有着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专辑的小册子。

认识和经验都是来源于实践，但是，理论却是来自认识和经验的整理和总结。

比较正式开展民族工作，从 1962 年到 1965 年，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砂盟领导民族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实践，基本上取得了以下的初步认识和经验。

根据上述初步的认识和经验，民进同志曾经以 MC 为笔名，发表了“北加革命和民族问题”为题，於《拉让江战斗报》创刊号的社论。

社论基本上，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简述以下的问题：

- 1, 加的民族问题和革命，实际上是属于农民问题和农民革命。
- 2, 由于土著民族的落后，和殖民主义者的长期统治和奴役，致使土著民族的工作成为一项长期、艰苦和曲折的工作。
- 3, 民族压迫，归根到底是阶级压迫，必然有反抗，加上革命组织的正确领导，土著民族的最后觉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 4, 革命是群众本身的事情，因此其他民族的干部，尤其是华族干部，在开展土著民族工作过程中，必须从根本上把培养土著民族本身的干部为主要任务，建立他们本身的领导机关，树立他们的领袖，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看成是一项关系革命成效的根本战略问题。

坚民同志以坚敏为笔名，在第二期的《拉让江战斗报》发表了“民族工作和土著民族干部的培养问题”为题的专论。

专论除了同意 MC 同志关于开展民族工作，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外，也进一步地提出了关于培养土著民族本身的干部的重要战略意义和作用。

以上刊物和专辑小册子的出版，虽然缺点不少，却对民族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 （十一）民族工作的成就和干部的献身

砂盟领导下的民族工作，经历了公开和非法（包括和平宪制斗争和武装斗争）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首先要肯定这项工作所取得了以下的成就。

1，进行和经受了一场广泛的反帝反殖和初步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运动。

2，第一次由砂盟领导下，把婆罗洲岛上最落后的第一省砂印边区、双空（SongKung）和第二省的砂印边区的部分土著民族发动起来。

由于上述地区的土著民族工作的开展，为砂盟 1962 年所领导进行战略退却，准备武装斗争，大批人员向印尼提供了客观的方便条件。

其中后来成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负责人的叶存厚、杨柱中等人就是从老路 14 哩出发，经过左手港一带，由小杨同志所安排的交通线，抵达安拔梯头，然后由当地的民族干部安排越界到印尼的巴来嘎兰岸（Balai Kerangan），再由当时民族工作负责人胡勇同志接送，最后经过上侯（Sanggau）安全抵达印尼的坤甸和山口洋。

第二批，由天空同志（原名沈稚威）所带领的最大批（一百多人）的一队，从晋连路 24 哩木瓜山出发。由黄英同志所负责的交通线，经过最少 20 多座民族长屋和地区，到达打必禄。由黄勇他们安排越界，到达双达（Sondah）。由七午、黄安老伯（黄祥明的叔父）他们负责，取道巴来嘎兰岸，经过上侯安全抵达坤甸和山口洋。

第三批是从伦乐直接到印尼的尼姑村，由于实际有关的负责人直接安排联络，也安然抵达山口洋。

最后一批是火炬所带领的 86' 人，由于发生意外事件，带路人被捕，缺乏经验，部署不周，又被达雅人出卖，结果不能和打必禄民族工作者取得联系，除了少数突围外，结果有 69 人被捕。

此外，还有很多零星和小股，由于他们有和边区民族工作干部和负责人取得联系，所以他们都安然越过边界到达目的地。

第二省，由于边区民族工作稍有开展，所以李洪彬（原名范子香，已牺牲），谢亚声（原名蔡义清）他们才能大批过界，不过由于印尼那一边工作没有开展，到了印尼境内的新当（Sintang）县地方，就受到那里军方的阻难，甚至扣留，经过相当时间的力争，这批人才能继续成行，抵达目的地。

汶莱武装起义后，大多数公开阵线的干部和同志都转入秘密和华族农村。不过，也有少数转向土著民族地区和甘榜。其中黄英、弗克、耕夫等人，除了潜伏在民族地区，得到土著群众的保护外，也开展了不少工作，和吸收了不少的农会会员。

当他们得知有大批华族群众要路过他们的甘榜，取道到印尼时，这些土著群众除了主动热情为他们送食物送点心和送行外，甚至有个别的积极分子还要求参军。

3、从 1962 年到 63 年，仅仅是一年的时间，就把立足点和工作起点的华达混合区的群众，几乎大部分的发动起来。这些群众不但为过界撤向印尼起了向导的作用，而且也为后来军事活动，提供了多方面的方便。

他们的贡献应该得到了肯定，也引起敌人的仇恨。所以，当晋连路一带的新村强行建立时，他们的整个村庄都被逼迁到新村。

4、由于边区土著民族工作的开展，不但为上述工作进

行和完成，提供种种方便条件，也为后来部队建立、生存、坚持反围剿斗争，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第二省巴当艾部分地区民族工作真正通过部队武工队形式去开展，还是1967年后的事情。

当武工队开入上述地区，不但受到他们的热情欢迎，而且往后还主动负起分担武工队的粮食和保安的工作。

不到两年的时间，武工队活动过的甘榜有四十多座中的二十座，其中有四座，整座都被吸收为北盟盟员。在艰难困苦的反围剿的岁月中，敌人进行无期戒严、宵禁，和全面的封锁，而且凡是被认为可疑的人物都被逮捕，投入监狱，只有屋长才被请去西马“观光”。

在上述高压行动面前，他们并没有屈服，仍然为武工队送情报、买粮食，甚至要人在厨房和武工队人员接触谈问题，前面客厅则由一些女盟员去应付和“奉陪”敌军，他们的机智勇敢令人钦佩。

长屋中尤其是一些女盟员，甚至和武工队一起进行反围剿的斗争，直到武工队撤回印尼边区，她们仍然坚强不屈。第一省边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地区的个别屋长，甚至遭受敌军的严行拷打，至死不屈服。

汶莱武装起义后，砂盟所领导下的革命，能够顺利地进行和完成战略退却，撤向印尼，保存革命力量，以及建立部队，坚持斗争，和边区民族工作的开展，取得一定的成就是分不开的。

5，民族工作除了肯定上述成就外，民族干部队伍也经受了一场锻炼。在上述长期、艰苦、曲折的工作中，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出色、忠于民族工作事业的干部，他们包括水浒、谢亚声、祝春、小杨、胡勇、黄英、沈蒂玛（女）、高金兰（女）、刘震雄、赵大山等。

这批干部始终是忠于革命和民族工作外，具体表现在认真学习民族语言，初到民族地区时，有的连半句伊班话都不会讲，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后，成为基本上学会能讲能写、应用自如的民族工作者，尤其是水浒同志在翻译华伊沟通民族文化的工作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们真正深入到民族区，同群众打成一片，同劳动、同生产、同吃、同娱乐。尤其在劳动生产，开芭砍大树等工作中，祝春同志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

土著民族社会的物质生活极端艰苦，卫生也很差。他们经常把已经高度腐烂发臭的肉类，做成肉酱如骨（Jukut）当做佳肴美味，敬奉上宾，这些食物，上述民族干部也照吃。这样的物质生活对原来的城市富裕家庭出身的人，能说不是勇敢考验和艰苦的改造过程吗？

因此，民族工作有上述成就，和上述大批干部的决心与献身是分不开的。

## （十二）挫折和失败

在肯定民族工作成就的同时，挫折和失败也应该加以承认和探讨的。

挫折不等于失败。但，多次的挫折，可能会导致失败，不管是挫折或者失败，首先和以下主观原因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 1，尤其认识了土著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之后，但因为组织不健全，专门的领导机关无法设立，始终成为一项根本问题。

- 2，由于没有专门的领导机关的设立，因此对土著民族问题和工作就无法着重研究，提出有效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

3, 民族工作部门的直接负责人和干部缺乏应有的理论水平与工作能力。

4, 叛徒的破坏也起着一定的影响。

除了上述的主观因素外, 也有以下几方面的客观原因:

1, 土著民族的落后性不是短时间可以改变的。一个民族的觉醒, 是一个民族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奋斗过程。

2, 长期受着英殖民主义者的反动统治和奴化, 导致土著民族工作开展, 面临重重困难, 要觉醒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

3, 土著民族始终都成为革命和反革命互相争夺的对象。在这场矛盾的争夺战中, 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 不但还未达到势均力敌的程度, 相反的, 革命的力量还处于相对较弱小的方面, 在统治阶级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的镇压下, 土著民族是暂时被压服了。

4, “斯里阿曼”事件的发生导致民族工作失败的最直接原因。

上述的主、客观因素, 主观因素始终是根本和主要的; 客观因素只能起着影响的条件作用, 是次要的。

### (十三) 正确看待民族工作的失败

因为革命的全面失败, 因为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和血腥统治, 土著民族工作也和其他民族的工作一样, 再也不能继续开展和发动了。从这个角度出发, 应该承认民族工作是失败了。

其实这也和其他民族工作一样, 只是信心上受到极大的破坏和摧毁。并没有根本改变阶级矛盾和斗争的趋势。

不能简单地把民族问题和工作看成只是伊班民族, 其实也应包括马来民族在内。在反对外来统治的长期斗争中, 马来民族曾经出现过不少民族英雄、革命先烈和领袖。他们的斗争对历史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做出重要的贡献。今天

以马来民族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为先导的社会运动，必将对今后社会起着重要影响和作用。

#### （十四）结语

写完这篇拙稿，难免会有深深喘一口气的轻松感觉。不过在回顾这一部门工作的经历时，心情却又更加沉重的感觉。

虽然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但今天拿起笔来进行整理这份历史资料时，仍然有着严重的“理论用时方恨少，实践之后才知难”的深刻体会。

三四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有着上述情形，三四十年前那个时候，不是可想而知吗？

老实说，没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学识和工作能力，只凭着满腔热情和一股干劲，是无济于事的。

以上所略述的只是第一、二省土著民族工作开展的局部情况。以粗浅学识和理论水平所挤出来的东西，缺点、错误和不足，实在所难免的。

笔者大胆执笔完成这篇拙稿，仅仅盼能取得抛砖引玉之效。

## 马印军事对抗

江 宏

东姑阿都拉曼一提出马来西亚计划，就遭到印尼苏加诺政府的反对。印尼认为，这是英国殖民者表面上退出，让位于当地附庸，实际上仍维持其殖民主义利益。这一计划会威胁与损害到这些地区（包括东南亚与印尼）人民的利益。1963年2月11日，印尼外长正式宣布反对大马计划。这种反对，由政治上的对抗，发展到军事上的对抗。

1963年4月12日清晨，印尼兵攻打砂罗越第一省边界哨站打必禄，掀开印尼对抗马来西亚的武装行动。在3年4个月的对抗时期，印尼志愿军和正规军主要是在由第一省的山马丹到第5省的林梦的一千哩长边界地带开展战斗，其中主要的战场是在砂拉越的第一、二和三（后包括第六与七省）省，而第一省的石隆门——伦乐地区就发生了几场激烈的战斗。第二省的鲁勃安都、板督、巴都林丹、无劳和史拉邦都发生过军事冲突。拉让江上游的桑(Song)和巴雷(Sg. Balai)的Long查威也发生两场战斗。印尼兵也进攻第4省内陆高原的巴隆昆(第4、5省交界之印尼边界的一个村庄)。第5省也进行了几场战斗。沙巴也发生一、二场战事，主要是在斗湖。

印尼武装部队除了攻击砂、沙边界的哨站与警署之外，也深入到加里曼丹的北部境内。印尼飞机还飞进砂拉越的上空，投下传单，印尼兵还把手榴弹放在桥底下或公园里引爆。

印尼兵还从水路进来，偷运武器入境，武装沿海地区的当地反抗分子。当时主要是供应武器及训练婆罗洲共产党及阿末再迪为首的砂拉越青年阵线的成员为武装人员，以便在砂拉越境内开展武装斗争。

除外，印尼还在马来亚半岛开辟一条战线，从 1964 年到 65 年 3 月 25 日，苏加诺政府派遣包括马来亚人组成的突击队先后进行 5 次企图在柔佛地区登陆，但都没有成功。

在对抗期间，英军(尚包括辜加兵及其他英联邦部队)共出动了一万名海军突击队等兵种参战，一万名后备军随时准备上阵。这是英国为捍卫尚是殖民地的砂拉越利益而进行的战斗，马来西亚军队只担起小角色的作用。印尼也出动了自愿部队、正规部队，这些战士曾参加过西伊利安、西利伯对荷兰独立的斗争，也有参加过汶莱人民党的武装反抗，也有伞兵部队……。在 3 年 4 个月的对抗中，发生了 215 次(沙巴则有 63 次)的驳火或军事攻击，双方都有数百人死伤。

对抗战掀开之后，菲律宾的马卡巴加总统也站在苏加诺总统一边。不过，菲律宾不想长期对抗，马卡巴加总统充当起鲁仲连的角色，安排马菲印和谈。这样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直到 1966 年 8 月 11 日中午，印尼外长马力克与拉扎克首相在和平条约上签名，宣告对抗的正式结束。

## 网漏鱼游，死里逃生

林风口述 露营整理



林风留影

1980年中，同志们从砂拉越转进边界印尼境内。要在新的环境中立足，就要开荒种地，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要种下各种农作物，就要砍芭烧芭，还要解决这些农作物的幼苗或种子问题。

1980年12月31日，领导上分配刘伟华、蔡汉辉和我三个到Kungba河边去找番薯藤回来种。

当日我们从“楠敦”点出发，下午到了该河的河边。观察了四周，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动静。於是大家分头去做自己的事情：伟华负责拿烧火柴；我负责站岗戒备；汉辉就游向河的南边去找和采番薯藤。我们计划是先采当晚与次日上午吃的二餐番薯叶，待翌日再过河的南边去采较多带回营地去栽种的。

当晚我们在 Kungba 河的北面进一条小支沟的东向沟边扎营休息。我们靠近小沟平行而睡，我的吊床绑在中间，汉辉靠近我的左边，伟华在右边。上半夜一切平静，我们把枪靠在床头安然就寝。

清晨约4点，我蒙蒙醒来想煮开水，骤然发现东北向一道道亮光照射向我们，意识到情况不妙，我赶忙通知左右两位同志。在我坐吊床上还来不及穿上另一只鞋，我听到汉辉喊“Siapa”（谁）的同时，对方紧着回应说“Memburu”（狩猎的）。说时迟，那时快，前面的来者的枪口已对准我的心窝，枪身右边却拦住汉辉。感觉汉辉纵身一跳，我也抓住 sten 枪向后一跳。当我落地在木棚后一向时，猛烈的枪声骤然响起，划破了静谧的原始雨林，我感到

枪弹打到木桐，木屑飞溅到我的身上。我脑子闪过“这次完了”，但身体没有子弹打到的感觉。我隐约听到右边伟华叫我的名。我压低声音唤她移过来，我们手抓着手，向后滑下2米深的沟渠。雨点般的子弹倾泻过来，雨布被打得在剧烈的颤抖。我们手牵手，沿沟向北移上。越向上走，沟则越浅，但子弹没有打到我们的方向。我们担心汉辉的安危，在沟尾稍等一阵子，等不到他只好先撤走。

撤了好久，枪声还在不断的响。直到天亮，丛林中的枪声才稀疏了。在细雨霏霏的阴天里，看不到太阳，我们吊带来不及拿，身上没有指南针，只看水向东流，向北方向走。我们人少痕迹小，又有动物的足迹，我们不担心会被跟上痕迹。我们设法找出来时所约定的途中联络点，但找来找去，找不到。我们主要认水流向，向北走。发现水流方向不对时，不敢前进了，又倒回……。走着，走着，我在沼泽地里捡到一只乌龟。原本回营地只要走3个小时，我们也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到那里……。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除了一把枪，枪匣本来较松，在抓枪一跳的一刹那间，枪匣碰撞落了。伟华除了一把 galok 枪外，口袋还好有一个打火机。打火机在这个危难的时刻显得格外珍贵。用它起火，烧断一枝小树的头尾两端，剩下一条一米多长的木棍，就用它来敲树根板。“笃、笃、笃”打三下，这是跟同志们联络的讯号，希望同志们能听到有回应来。我们每走一段就敲一、二次，但都听不到反应，使我们焦虑惆怅。

在沼泽地里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动，天暗了，雨还在不断的下着。没有雨布，没有吊床，又没有乾地、高地好歇脚。我只好把乌龟当作垫子坐着，另一方面也怕它溜走。又冷又饿，半睡半醒，艰难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半年多来，由于初建基地，还没有什么收成，我们吃了很多一种叫“海柳叶”。这种长在沼泽地的野树的叶，把它的嫩叶采了，用热水烫了，再煮过，吃起来又酸又涩。有时把海

柳叶跟别的菜叶混合起来煮了吃。只是为了生存，为了聊慰饥肠，实际上，吃后身体都是酸软无力。再加上几餐来毫无东西下肚，只是渴时舀起沼泽水喝。在半途遇上了一只吠鹿时，我想向伟华拿 galok 枪来打。由于怕暴露，伟华表示不同意，只好罢了。我们在茫茫的林海中失去了方向，像只彷徨无助的孤舟在海中毫无目标的飘荡，也随时可能沉没海底。我们焦急地走着，不时不时又敲打树板，但都毫无反应，使我们滋生怅然若失的感觉。

第二天又要过去了。在夕阳西落之前，我们找个较高的地，捡些干柴，起火把乌龟烧了。由于没有刀子，只好又敲又拉，才能把龟肉弄到手，随便刮刮了脏东西，也管不了有没有龟屎，就狼吞虎咽吃起来，真是又香又好吃！身体也顿时感到有力。当晚，我们也只能坐着打盹，面对赶之不绝的蚊虫，也毫无办法。

第三天的整个上午也过去了，也不知走到那里，毫无着落，感觉万分地焦虑！行行复行行，天近黄昏时，遇上了一处藤叶较小的芭。这是我认的“楠敦”点附近的特征！我们高兴地三步并作二步走找到了出发点。在此拿了同志们留下的联络信，我们兴奋不已！在此，向西走 45 分钟就可以回到“沙龙点”。这路线我会熟，我不敢再敲打树根板了。顿时感到脚不痛了，有力了，我们笑着走。到了营地附近，我们才敲讯号，很快亚华、广平等同志来到点出口处迎接，我们经历死里逢生，真是喜出望外，抢着握手时，大家的手似乎还是冷的。

话说到汉辉。当他发现来到跟前者拿的是 M16 枪，又看到对方身上的军徽时，才恍然知晓是敌人来进攻了。他立即向左一跳，紧接着枪声就响。乘着黑夜，乘着敌人还未完全摆好阵势、布好罗网，就从两个敌人的空隙中间溜过去，向北向撤离。撤离到山上，他停下来，看看两位女同志有没有跟上来。实在等不到了，他就自个走。汉辉的指南针也来不及拿，只拿到猎枪（出来途中准备打猎）。但他是当尖兵

的，对地形、路线较熟，很快他当天上午 11 点就回到营地。他报告了情况，并估计两位女同志很可能不是牺牲，就是受伤或被捕。同志们认为，多等几天，静观其变，到时再进一步处理。

根据过后了解的，当时汉辉穿青衣游过河时，被坏蛋发现。对方赶快去附近驻扎有兵的甘榜报告。当天凌晨他们纠集了 30 多个 Brimok（警察机动部队）印尼士兵，原本想抓活的，却没想到眼看就要到手的大鱼，却从网中游走掉！印兵无不沮丧懊悔，捶胸顿足！

## 水中行军

黄锦隆口述 露营整理



黄锦隆留影

我们在陆地上行军，有时整天在山陇上走，傍晚宿营就靠近垄边最河尾有水的地方，或者是在垄上的“山猪湖”（山猪曾浸身嬉水的地方）边。有的整天时而跋涉在水里或时而行进在河岸上，宿营就选择在河边较平坦有利的地形。有时行军是时而上山，时而下山，扎营地通常选择在有猎好打，或有鱼好钓的地方。在沼泽芭行军，面对驱之不尽的蚊虫围攻不算回事，较辛苦的要算深陷大腿以至齐腰深的艰苦行军。要过小河，通常把军包、吊带用雨布包好，枪放在上面，推着游之而过。较阔的河流，有时要选择在群众较少活动的时间，或是夜幕低垂时用船或简单包裹推着过。有时逢至连绵不绝的雨季，山洪爆发，下游的岸边会涨水，这时要过河，就要在这岸涉水一段，过了河再涉水一段，就可以完成过河。在国内，我有听说在砂隆(Sadong)河尾有同志们在齐腰深的水里行军一整天。我还没有听到过要泡在水里整7天的行军。

在此，且听黄锦隆介绍在印尼边界的一次水中行军。

在印尼西加三发河尾到了年尾雨季时经常要涨水，但没有像1976年那次我们行军所面对的那么大。从印尼边界的营地到直木港(Tebas)通常我们只用7、8天单程，但那次我们却要多花一倍的时间，其中一半的时间是在水中行军。

1976年年底，志坚、宴文、汉辉和我四个，从边界基地前来直木港执行任务。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从Tebas东向

的依罗河(Sangguo Delo)支流出发。这一段时间，7天内有4天是下雨，晚上几乎都有下雨。我们向东偏北走了一天多，觉得水位越来越高，不能再在沼泽地涉水而行。我们只好择个较高地处，制作一艘特别的“船”。我们先把二张4米X1米多鹅牌的雨布重叠摊开在地上，先把雨布头尾两端收拢绑妥，再去砍6条约10尺长枝叶茂密的树枝把它绑成三束，每束的一条树枝尾必须对另一条的树枝头，树枝尾必须比树枝头稍长一点，而且要将树枝尾折回绑住(防止树枝头撞破雨布)。这样将三束树枝对着雨布头尾并列平放进“船”内，再拿3、4条树棍横放在三束树枝上，绑住形成一艘特制的“船”。若“船”左右里面两边再放一些枝叶更好。这样背包、吊带、枪以及其他东西就可以放在里面，可以载重近500斤，3、4个人坐上去也不会沉。不过在里面的人必须坐在横木上，这样的“船”比木筏好得多，比较轻便灵活，行驶速度快，既使遇到稠密的灌木丛和交横叉生的树枝也畅行无阻。我把手枪放在身上，绑住手枪的绳子另一头绑在我的颈项，防止它掉进水中。这样，2个在前面扶着“船”游，2个在“船”后面推着前进。

晦深如海的雨林顿时变成了汪洋大海，一片茫茫，望过去只能见到大树的树干和小树的梢枝叶。水是黄澄澄的，冷冰冰的，整天泡在水里，冷得直打颤。还好我们雨季行军备有姜粉泡水喝可以去寒，另外我们备有乌豆炒了浸白酒，每天喝一些，在水中就没有那么冷。

那么在水里吃什么呢？我们主要是吃干粮，它是用黄豆、白米等炒了加进白糖磨成粉制成的，要吃时舀几汤匙泡水就可以充饥了。同时，出来时我们有打到一只狗熊，返回途中还有熊肉吃。

那么，在水中怎样炊食呢？首先去砍一些浮木放在水面垫底，再砍些木叠高，绑紧。在我们活动的Boel河有一种叫Agatis的树，我们有的同志称之为“蜡烛树”，它比其他的“打马土”(Damar)都好。晒干了很好用，它的特点是无黑烟，不

会暴跳，照明、起火都好用。这次行军没有带 Agatis 来，我们就用胶块起火。这胶块是过去在打马约海边捡的，整百公斤四方形胶团，割下来有时带在行军中备用起火的。起火后，再堆叠干木，把炊具放上架好的木架上，就可以煮饭、煮菜了。

夜间睡觉更加奇特，我们要把吊床绑在离地面约 30 尺高的 2 人合抱大的树尾的水面上。我们还要注视水位的上升和下降：要随着水位上升而绑高；随着水位下降而绑低。

在水里游着游着，我们顾不了水里面有没有鳄鱼和其他水中侵犯物的袭击，也不太在乎冒出水里的枝槿有没有蟒蛇之类盘居其中正在严阵以待扑向待猎之物。我们注意的是有没有人躲在树上，听有没有划船之声，和注意有否巡逻的敌人。期间我们遇上一只约 60 公斤的人猿抱着一只小人猿在吃果子，尽管彼此遭遇、对视迟疑一阵，大家还是互不相犯，畅通而过。浸在水里的雨林比平时静谧得多，偶而可听到树籽跌入水中发出的响声。

浸在水里那么久，毕竟不太适应，也不大耐，只好下午提前扎营休息。

泅游又泅游，日复一日。到了第 7 天，靠近 Kungba 河，我们才发现露出水面上半身的山丘。我们真是像发现“新大陆”，才靠近山边，几只安窝扎营的山猪被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吓走了。我们还来不及开枪，它们就迅速游进稠密的山林水中了，失去了当天一道山珍佳肴。

过了 Kungba 河，再走几天才顺利抵达营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七天水中行军。

## 惊险的两次被伏击



尤远 口述 青云 整理

### (一)

我们这个社会是中间大，两头小。换句话说，较积极的、较好的群众占少数，坏的群众也是占少数，大多数群众是处在中间状态。即使如此，在一些条件下，积极的、好的或中立的，也还是会变化的，甚至向它的对立面转化，变成坏的和消极的。

从总体来看，群众多数还是善良的，即使是达雅族群众也是如此。但当群众受到敌人的利诱、迫害和磨劫而超过了他的觉悟和所能接受的程度时，他可能会经受不住考验，就可能被迫配合敌人来陷害自己的同志与同胞。

当年我战斗在第二省的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第一支队时，经常到印尼境内去搞粮食和组织教育达雅群众。在印尼境内有一个甘榜叫 Wak，有一个达雅群众患有严重的贫血和疟疾病，好一段时间总是卧床，不能工作。我就给他医治，帮他打鸡血。经过一段时间的医疗，他得到痊愈。他跟我的关系很好，也帮我们同志做了不少的事情。这样，风声漏了出去，印尼兵就来找他，对他进行审讯、迫口供，用火点了的塑胶来烧他的生殖器。他挺不住，向敌兵屈服。他出卖了我，并在一次搞粮中，我受到敌兵的伏击，险些丧命。

情况是这样的。有一次，我约这个达雅群众见面时，跟他商量搞粮问题，要他帮忙去收购长屋居民多余的米，并约定下次拿粮的时间、地点和办法等。詎料，印尼兵跟他策划了这次的伏击行动。

约定拿粮的时间要到了，吃过早点，我跟洪民从营地出发。我们要到群众的 Lambat（达雅语，第二住所的意思）拿粮，必须经过一条平地的羊肠小径。我们割到这条小径离群众有一定距离的路边附近安下临时点。我叫洪民一人守点等我，背包交他保管，我以为一个人去碰群众会更灵活。

已将近中午时分了，我跟洪民交代后，就沿着曲曲折折的小径走。那个约定的群众在半路等我，看到我他就紧张张张的赶着向前走去。我叫他停下，谈了才走，他似乎没有听到，给我感觉他是魂不守舍，情绪与表态跟以往大有不同。我对他起了疑心，感到有些不对劲，我警惕地双手握着士登枪，一边离他有 20 多码在后面跟着。才跟上几十步，到了左边有一片大小树林时，突兀一阵猛烈的枪声从左边树林向我扫射过来。我感觉到周围泥碎溅飞，我及时向枪声处扫射了一排。在对方稍停的一刹那间，我赶快后退，奔回临时点、跟洪民会合。

在撤退过程，我才发现手持的士登枪上的子弹盒被对方子弹打中，子弹在我周围飞过，我却安然无恙，竟奇迹般的活下来。

一个大目标，咫尺之隔，竟然打不到。后来，据群众说这一队 12 人的印尼兵对我有些“恐惧感”，说我有“隐身术”，开火时手微有颤抖，就射击不准。另外，我行走时持枪，并及时还击，一时压住对方的气焰，才使我从死里逃生。

## （二）

在第二省有一部分同志的牺牲，是在处理联络的过程发生的。由于革命内部出现了叛徒，兵在叛徒带领下，埋伏在联络点的周围或必经的路上，等同志们前来拿信或拿粮食时，展开突然的袭击。像谊松（蔡汉仁）同志去到第一站拿字条，内容没有指示什么，到第二站拿联络信却遭到伏击，侥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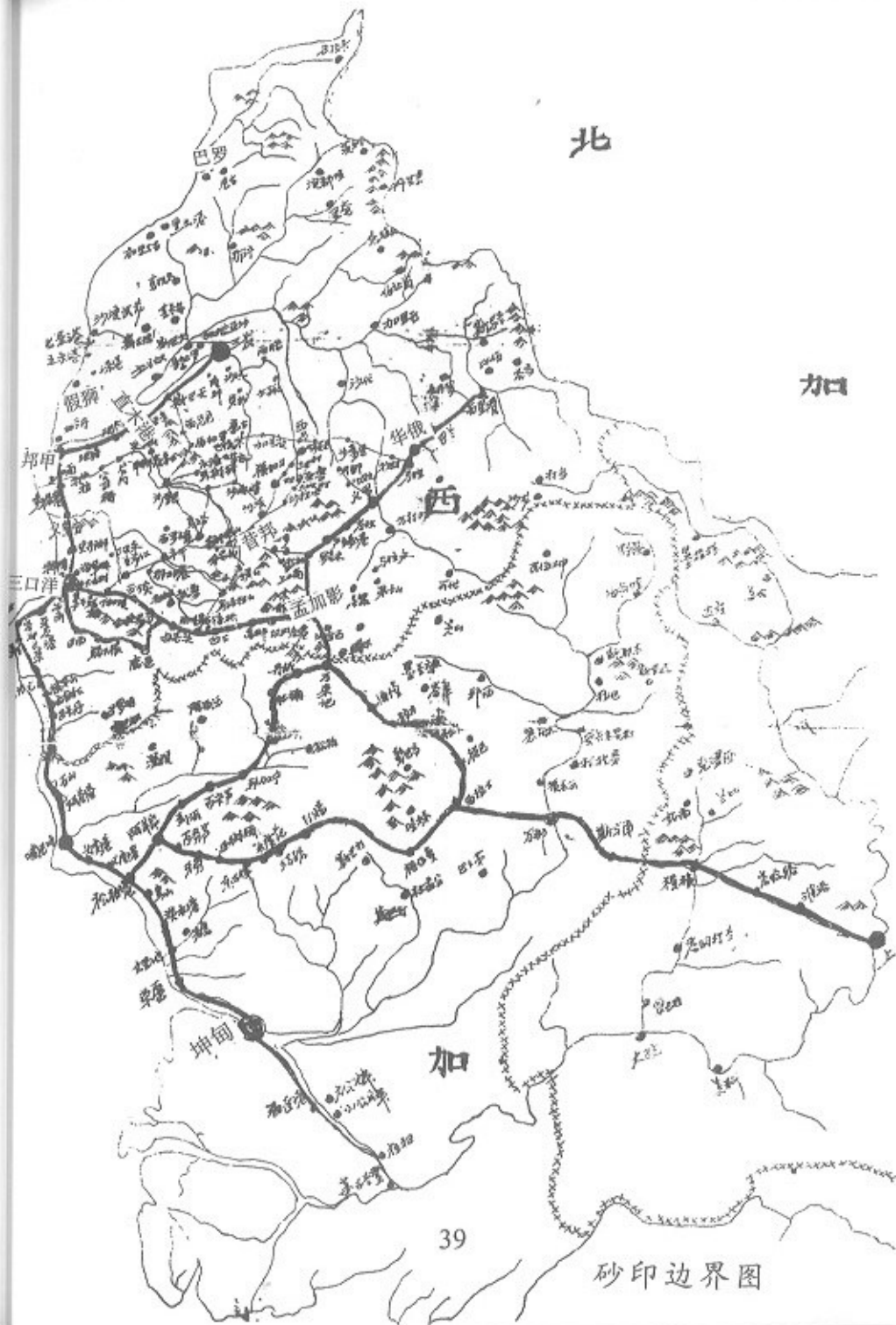
没有伤亡，又到第三站拿联络信却被伏击身亡。有一次，领导上急于找李洪彬（范子香）联络，前后派了3组的同志，每组至少有3人组成的联络组，分别到三个不同地方去联络。但联络点都被L.A.等叛徒出卖，而且每个点都有叛徒带兵进行埋伏，结果这3个组的同志统统牺牲。这是惨痛的血的教训！

我也经受过这样的遭遇，幸亏阎罗王不收我，才得以幸存留在世间。

那个联络点是在巴莱林京过去一些，在河西一带，我们是跟吴铁他们联络的。当时，我们不知M.L.出去投诚，并带兵来联络点埋伏。广源跟我两个，从营地出发，走了半天多，到了那个联络点。

那是阡无人迹的森林原野，周围都是稠密的树林，我不会想到此处会有敌兵。找到了那三棵树，其中一棵树下就藏着字条。我走在前、广源在后，趋近一看，三棵树下的叶子有被翻过的痕迹。我警惕起来，立即蹲下，环顾四周，没有看到什么异常东西，也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我们小心翼翼地蹲着挪近，把字条挖了，并蹲着挪回。当我正打开字条看时，倏忽一阵枪声从我们对面打来。我们即刻伏下，对着前面，我扫射一排土登子弹，接着跟广源一起翻下低一层的凹处。乘着对方稍停一阵，我们就迅速撤离火线。

在撤离的途中，我看到广源的帽边被子弹打了一个洞。待我拿水壶喝水，却没有水，原来它被子弹打穿，水都流掉了。我想，若我慢一点伏下，或伏高一点，我就会被打中，成为革命烈士了。



北

加

西

加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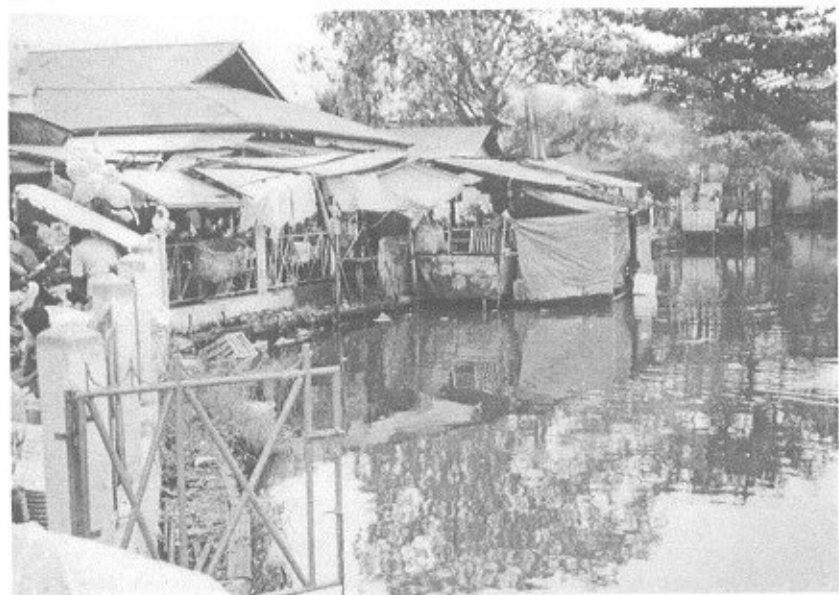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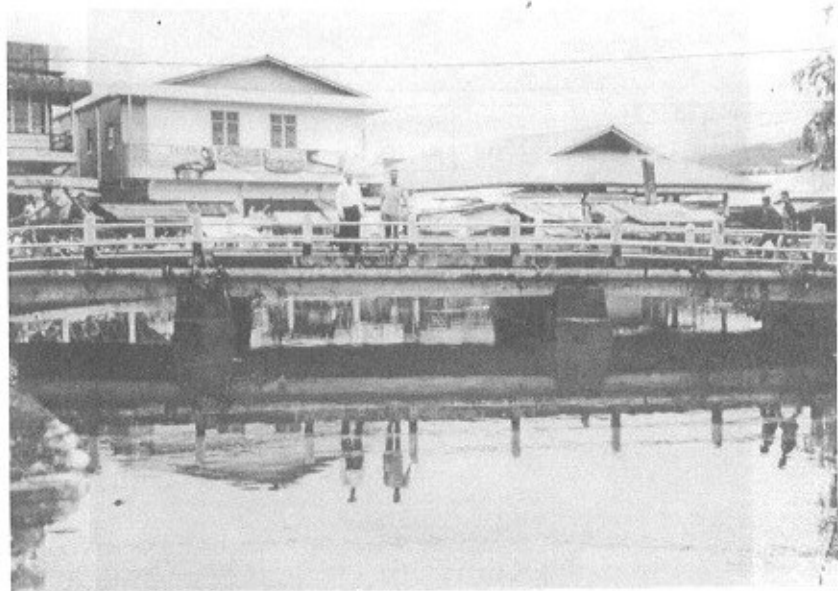
砂印边界图



当年北加人民军建军一带的附近长屋。



砂印边界印尼境内的马罗河（Sg. Embaloh）。  
当年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曾在这条河及其上游地区坚持战斗了六年。



这是山口洋巴杀的河边，河水污浊，有时水面还浮有粪便。当年同志们住在离此不远的公会，等天暗时来此河边冲洗。



山口洋张氏公会的旧址（中间一间）。  
当年参军的砂拉越青年聚集的其中一处。



山口洋潮州公会的旧址。  
当年越界到印尼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砂拉越青年聚集的一处。



以上图示印尼军人烈士墓。  
北加的王秀昌与张玉凤俩同志安葬在此。



在出发去参加连队之前，同志们在此小学运动场集中。  
李玛耀等同志在集合场上讲了话。



山口洋莲塘路领导机关旧址。  
原来建筑已拆除，正改建新的。



当年孟加拉影（Bengkayang）连队军训的旧址。  
如今却杂树丛生，面目全非。



坚持武装斗争到1986年的部分西加同志留影。  
后排左起：黄元兴、韩鹏飞、刘和海、官德添、余世达、陈振和（已逝世）  
前排左起：郑美娥、刘佑桃、吴三花。

1975年在“斯里阿曼”谈判后出来的部分前西加同志。



上图14位：陈美云、刘永和、古现德、赖贵生、何天灰、古景清、刘石坤、吴振辉、田永昌、黄兰华、Jaspin Ak Den、Satek Ak Majew 和 Sapu Ak Dasi。



上图11位：李石华、韩光庭、何永财、黄任华、谢春琴、刘佑喜、叶锦强、何永福、刘俊达、黄菊英、余细仁。



回顾历史

# 印尼“九.三〇”事件

烛光

## 印尼“9.30”事件的发生与经过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对峙状态。美帝国主义搞强权政治和军事霸权，极力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企图把尽可能多的国家纳入自己统治与所能驾驭的范围之内。

1945年8月17日印尼获得独立之后，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之下，印尼民族遵循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在保卫整个民族的独立权利，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舞台上起着积极和显著的作用。而苏加诺在为印尼人民争取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完全的民族独立以及人民广泛的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得到以艾地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取得了成功。当时的印共是中、苏以外拥有300万党员的大党，在城乡皆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在国内政治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加诺在国际上跟社会主义中国和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跟国内共产党也是保持良好的关系。他甚至考虑到在他去世后，把国家权力移交到共产党的手中，实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

苏加诺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军队内部如陆军参谋长雅尼，和国防长纳苏蒂安等一些亲美右派高级将领的不满，也引起了美国的不安，他们狼狈为奸，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颠覆活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唆使与操纵下，印尼右派将领集团成立了“将领委员会”，他们在1965年9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还秘密组成新的内阁，他们策划1965年10月5日建军节时发动政变。

苏加诺当时因病卧床不起，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紧急地和印共共商对策。印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动一场运动

来击败“将领委员会”的政变，他们还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来取代现有的内阁，但并没有具体讨论采取什么军事行动，只是打算在军队中下层作一些争取工作，一旦发生政变，这些中下层军官便可能站在印共一边，挫败右派将领的阴谋。

然而，就在此时，总统卫队查克拉比瓦营营长翁东中校却抢先行动了，他发动一场旨在消灭“将领委员会”、保卫苏加诺总统的兵变。

1965年9月30日深夜，他召集了总统部队和有关部队总共有3000多人，在雅加达市郊一个叫鳄鱼洞的地方集中，他把部队分成7个袭击小组，奔向不同的目标。

在这次突击行动中，击毙内阁部长兼陆军参谋雅尼、陆军总部将领苏普拉普托少将、哈尔约诺少将、巴尔曼少将、苏托约准将和班查依丹将军共六位。国防和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却给他机灵通过隔壁的一条地道，溜到几步远的伊拉克大使的住宅。虽然他在翻过围墙时被发现，士兵在黑暗中向他开枪，但没有命中。

清晨，翁东指挥的部队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电报大楼。

但死里逃生的纳苏蒂安却指令苏哈托组织反攻。苏哈托是战略后备部队的司令，他的部队担负的是防御马来西亚部队入侵的任务，他也是右派将领的一员。他立即命令西利旺义师的坦克和装甲部队配合一支伞兵突击队向雅加达挺进。

10月1日下午，翁东的二支小部队经不住压力与威胁，终于投降了，空军部队也在总统训令下，为避免流血冲突也被瓦解了。首都被苏哈托、纳苏蒂安部队占领了！

右派将领集团大造反革命舆论，指责“9.30”运动是共产党一手策划的，认为“印共要为这一谋杀事件承担责任”。他们乘机制造印尼现代史上最凶恶、最残暴的白色恐怖！

他们唆使穆斯林学生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共产党!”“美国万岁!”的口号。这些暴徒袭击和焚烧印共总部,攻击印共领导人。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屠杀几十万印共共产党员、非党人士和普通男女群众,甚至不懂事的孩子和婴儿也惨遭杀害,真可谓血流成河,到处是腥风血雨。这些数以万计的尸体被抛到河流中,再漂入大海。当海潮来时,又把尸体冲到岸边时,这些腐烂发臭的尸体堆积得像一道海堤!

除了肆无忌惮的大屠杀,也蛮横无理的捕捉监禁几十万人,不经任何审讯的进行迫害,甚至折磨至死。

印共总书记艾地在事变后,曾指示党的各级组织:千万不要举行拥护“9.30”运动的示威游行,声明那些是陆军内部事务,与印共毫无关系,并表示完全支持苏加诺宣布的任何解决办法。

艾地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他却在意料之外,被贴身警卫中的一个陆军谍报处的特务出卖了,而遭到杀害。

随之,右派将领集团篡夺了苏加诺总统的权力,建立了法西斯军人政权,把印尼人民推入深重苦难和黑暗历史的深渊。

### 事件发生所产生的影响

震撼国内外的“9.30”事件,不论是印尼本身,还是亚洲和东南亚的政治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影响也是既深且远的。

1945年印尼独立后,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像巨人般开始崛起,在亚洲新兴独立国家第三世界中享有领袖声誉的崇高地位。但“9.30”事件后,印尼局势却急转直下,代表印尼封建官僚买办阶级和各军阀利益的苏哈多右派集团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上,它们追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

充当它们在亚洲和东南亚的马前卒，执行反苏、反中、反社会主义和反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在国内，它们执行极端反共、反革命、反人民与反华的政策，对共产党人与革命同情支持者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甚至连民主人士与进步力量也不放过。它们对历史是反其道而行之，使印尼进步的社会倒退了几十年。

尽管印尼共产党拥有几百万的党员和上千万的支持者，而且对当时的苏加诺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由于它在采取和平斗争一手时，没有准备武装斗争的另一手，因此在敌人疯狂的武装进攻面前，还是抵挡不住，而遭到血腥的屠杀和彻底的失败，这一惨重失败对印尼革命产生极深远的不良影响。

我们北加里曼丹的边界跟印尼是有着毗邻的密切关系，印尼局势的变化对北加革命武装斗争牵动影响巨大。印尼“9.30”事件对北加，首先是砂罗越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是一个大打击，是起着极为不利与恶劣的影响。

首先，印尼由反对马来西亚和支持北加人民革命武装斗争，转为充当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和镇压北加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可恶可耻帮凶，共同“围剿”我们北加革命武装力量。这样，我们的敌人由最初的英帝国主义一个敌人；到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我们又面对第二个敌人——马来亚封建官僚买办集团；到了1965年9月30日后，印尼的右派反动势力成了我们北加革命第三个敌人。这样，三个敌人加起来更加强大了，我们的革命力量就显得更孤立弱小，敌强我弱的对比更加悬殊了。

在“9.30”事件之前，我们得到印共与左派的很大和多方面诚意的援助。我们原想在印尼边区建立牢固的革命武装根据地，并以此为起点和出发点，然后循序渐进地把革命武装斗争向北加境内推进展开，但却已设下了层层障碍与严重的困难。我们再想得到印尼的支援帮助已不可能了，我们以往在印尼境内所享有的合法斗争地位已经不再存在了，我们原来作为

后方的却变成了前线。我们已经实行了二年多的战略退却方针，不得不继续下去。

在统一战线中，正确认识与处理好敌、友、我的三者关系，对革命的兴衰存亡有着重大的影响与关系。由于我们在“9.30”后没有正确认识与谨慎处理好以上的关系，没有制定与执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在对敌斗争中执行“左”倾冒进的政策，结果造成还有一线希望争取的盟友，却变成了直接头号的敌人。西部最强大的第三支砂罗越人民游击队，直接战斗的对象不是伪马反动派，而面对的却是印尼右派反动军队，结果西部的这支部队被印尼敌方所消灭！而边区原本会同情支持我们的伊班民族群众，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也反过来变成敌人的耳目与帮凶，配合敌人一起来进攻与消灭我们人民武装力量。

再说，在印尼局势发生历史性转变的紧要关头，北加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文铭权却去了中国，而回不来北加，造成我党我军没有一个统一、团结的核心领导，不能强而有力地领导全党全军与人民跟敌人作斗争，造成恶劣的影响与严重的后果。

一个寡民岛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如果没有借助有利的国际形势、没有国际主义的援助和没有周边邻国的理解与支持，要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是很难的。



# 回忆录

# 风雨战斗历程

- 我的片段回忆录

老温

## 参与罢课斗争和进行学运工作



老温和张淑瑛留影

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往往在初期的革命斗争中，起着先锋和带头作用，在砂拉越和第一省的早期革命斗争中，他们就曾经扮演和发挥着这样的角色和作用。当年在第一省的古晋中华中学的学生斗争中，青年学生先后开展过1951年的“10.29”罢课斗争和1955年的“3.30”罢课斗争。我就曾经参加了后者的斗争。

当年英殖民者从台湾、香港聘请来的教师，有些具有双重身份，名义上是教师，又是英帝的代理人。这些教师有的学识低，有的根本不是来教书的。像几何教师何永祺，只是在黑板上照搬照抄，没有讲解，学生不得其解，不了其义，根本学不到东西。当年的中中是古晋唯一中学，许多学生受到中国革命的熏陶，受到青年社的影响，早有酝酿着革命的思想。而当时的校长黄中廛是个坏蛋，他是英帝的代理人，他限制与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与正义斗争。学生提出撤换教师和改善教学法的正当要求，学生的愿望不但得不到实现，学校当局反而下令开除初中二下乙班的代表张本仁、王祚英和庄金明。学校当局顽固不化，一意孤行。全体同学团结一致，奋起斗争，一场不可避免的罢课斗争终于爆发了。

罢课斗争从初中二下乙班开始，得到别班和高班的支持，得到全校近千名学生的绝大部分的支持。罢课期间，同学们坚持在家里上课，由高班教低班，也上政治课。学生还组织旅行，几百人到海口区去，渡2、3天的露营生活，举行政治座谈会和开展文娱活动。经过3个月的斗争，学校当局不得不让步，接受学生的要求：解除黄中廛的中中校长职务；收回开除张、王和庄三位学籍的成命；取消对学生学术研究和健康活动的各种不合理的措施。“3.30”罢课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3.30”罢课斗争是吸取与总结了“10.29”斗争之后，克服缺点，发扬优点；也在整顿组织的基础上，在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有理、有节、有利的斗争；同时，也充分注意发动与依靠80%以上学生的支持与参与斗争，也充分注意争取董事部、教师、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同情与支持，而取得斗争的胜利。

1956年新校长林郁初博士走马上任。我们乘着有利的局面和利用学生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气氛，扩大对学生的发动，组织他们进行学习和开展各种的进步活动。当时，高班联系低班，我是负责初中一的一班的工作。我在学生中进行识别与挑选，把好的和较好的学生组织起来进行小组学习。如当时蔡家布（纪平队长），蔡少祥（益利）等是我联系的。

1957年，我加入了砂拉越先进青年会。在学校里我更积极开展学运工作。在假期，我下乡到农村中去，到西连、石隆门、晋连路17哩和海口区等地。白天劳动，晚上组织同学和农村青年进行集体学习，学习英雄故事，学习人生观，讨论国内外形势等。我们把学运的斗争扩展到农村中去。

1959年，我高中毕业。1960年，我在晋连路32哩的夜校教一年书。

## 参与第二省的民族工作

盟组织重视民族工作，1957年开始调些身体好，思想品质好，尤其是有技术与民族语言能力的同志，到民族区去开展工作。组织上也成立了专门负责民族工作的小组，出版关于民族工作的刊物。

1958年开始，我也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积极准备去开展民族工作。我学习组织有关民族政策，学习外国开展民族工作（如中国开展藏族工作）的经验，学习理论，也学习生活技能（如向黄兴汉学修手表、修收音机，）理发，民族语言等等。

当时我们秘密的开展民族工作，必须遵循16个字诀：“避开敌人，深入群众，积蓄力量，待机而动”。我们这些外来的革命青年，就是所谓“白皮红心”，以公开职业与公开政党为掩护，跟土著群众在一起，进行长期耐心的宣传教育。

1961年，我响应组织的号召，向第二省的民族区进军。我没有向朋友及家人告别，深夜我从古晋码头下船，经过一天一夜的行驶，抵达成邦江，和在那里等候的郑春喜会合，然后再步行一天上到丰洛一带的Batu Lintang。郑春喜与我负责丰洛一带的民族工作。〔注：S.Undop（丰洛河）是鲁巴河在成邦江以上右支流，丰洛是一区总称，包括Batu Lintang，巴姑（Baku），三嘎（Sumark），总共几十座长屋和卅多户华族〕当时其他地区的工作分配：英吉里利对面是海洋（郑万灵）同志负责；卢勃安都是郑小风同志负责；马鹿是鲁洪（刘德庆）同志负责；马纳是刘队长（李日晴）负责、龙芽是郭楚然负责。

从学校到农村，从舒适的环境到艰苦复杂的环境，要深入到偏远落后的土著群众中去，组织上几个月才有一次的

联系，组织上出版的刊物许久才能收到，自个面对的一切和遇到的问题，全靠自己去解决。特别是从一开始，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从生活、工作到安全等方面，都得靠自己去摸索、学习和动脑筋、想办法解决。在生活上组织没给经济，而我们又不能暴露，根本无法从家人和外界取得支援，一段时间的生活全由春喜家人承担。新的工作岗位，的确是个不小的考验与锻炼。

丰洛的华族群众大部分都和伊班族在婚姻上或经济上有密切的关系。为了方便工作，我们也积极去联系华族群众，特别是年青群众。向他们宣传世界各地的反帝反殖斗争；反对殖民主义教育制度；鼓励他们积极参加人联党的活动等等。李日晴、郑春权、徐锦木与李汉文等就是我们经常联系的积极份子。

这里的华族群众与印尼边界的伊班群众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几乎都把农产品（如胡椒、树胶、米、生猪）卖到这里换回日常用品，每逢节日有斗鸡时，这里的群众都去印尼边界参与。为了更深入开展工作的需要，我随斗鸡队伍越过边界到印尼长屋，争取熟悉地理和那儿群众。这方面的努力更在1962年汶莱起义后为第二省同志越界参军起了积极作用。

在 Batu Lintang 活动一段时间后，政府加紧对我们注意。我决定春喜留在 Batu Lintang 而我转入更深入丰洛河尾 Baku 一带。这里距离英吉里利较近，并和马鹿的范子香保持联络。当时我住在一个有华伊血统的群众家，距长屋不到一百米远。这家的妇女是达雅人，丈夫是华人，在这里做小生意。一次她丈夫在背东西回的途中，遭到不好的达雅人谋财害命。她有几个小孩子，最大的才12岁，最小的才两岁左右。由于失去了家庭支柱，12岁的大儿子傅金贵（部队名明光），挑起了家庭重担，砍芭种稻，造小农舍（朗高）有时还去附近长屋做小生意全靠他。他们生活很贫苦，弟妹们无法上学，平时以木薯和竹笋为主粮，小妹妹到河里捉小螃蟹，采野菇当菜。而我因处深入地区又不敢暴露，修理钟表及收音机的零件无法

取到，没有经济来源，也无法资助他们，和他们一样过着一段难于忘记的生活。

这里有二、三座长屋，居民贫困，文化水平极低，又少和外界接触，不懂得清洁卫生，由于缺碘，好多都患大颈泡。为了能跟群众打成一片，赢得他们的信任，就要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就要入乡随俗。我要求自己，他们做什么，我就跟他们做什么，捉水鸡、捉鱼、打猎跟着他们去。他们小蝙蝠打了，没拔毛破肚，烧得焦黑的，想起来会恶心反胃，但为了使他们看到我不嫌弃，没有跟他们保持距离，我还得硬着头皮半吃半吞下去。再说，达雅人装的捕捉小动物的陷阱，按风俗他们第一天是不去检查的。等两天过后才去收时，有的动物已腐烂了。他们没有丢掉，放些盐做成肉酱类，伊班称之为“Jukut”，过后取出来放进竹筒烧，又苦又涩又臭，看了令人皱眉头，但还得跟他们一起吃。看到我吃，他们就高兴。只有尊重他们，才能被他们所接受。

白天我到他们稻田和胡椒园，帮助他们劳动，晚上到长屋宣传。然而少女们以为是去 Nganyap（谈情说爱的意思），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在后屋或蚊帐里等。有时，在河里冲凉，一大群情窦初开的少女光着身子围过来，向我泼水调情。对年轻的小伙子来讲，这确实是个考验。那时组织上也不会去检查我这事，我要怎么做都可以。然而我头脑清醒，有道德观念，有革命纪律约束，没有陷入儿女私情的漩涡中去。

“12.8”事件后，革命形势起了新的变化，政府有关方面更加紧注意我们，民族工作呈现更多的困难。在新的形势下，革命组织提出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当时由范子香召集在第二省活动的主要干部，都集中到英吉里利的马鹿开了一个会议，与会人数十几人，由当地积极份子范国强（部队名吴铁）负责站岗。会议进行不久，政治部主任王文发带领一

队人员来围捕，国强放响鞭炮作暗号而被捉去。我们的会议便结束，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地方。

回来后情况更加紧张，雇佣军（古加兵）经常巡逻和包围长屋。为了保存自己，我不能再住金贵的家，除了一把手电外，什么东西都没带就躲到与英吉里利交界海拔 3000 尺高的一个群众“兰高”（小茅屋）。在“兰高”除了有一点盐外，其他都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每天得去采奶汁果树的叶和竹笋，塞进竹筒烧了吃。晚上睡的“枕头”黑得发亮，睡觉用的被是“加隆”（Tekalong）树皮去掉粗皮后，再捶打制成的。有一个晚上刮大风、下大雨，又把盖屋顶的树叶吹走，本已寒冷的夜晚，再淋得全身湿透，实在冷得全身直打哆嗦。第二天再一片片把树叶盖回。整星期的时间内，就这样吃一点野菜，每个时刻都在忍饥挨饿中渡过，我饿得酸软无力，眼睛变黄，张眼都吃力。

1963 年初，我已很难继续在这里躲，决定先转过印尼边界。由于许多地段经常有兵，所以由我工作地区的一个群众带路。由于长时间跟他相处，通过不断的宣传教育，我赢得了他的信任，他把我当做他自己人一样。当遇上敌人包围追捕时，他同情我、帮助我。他主动地跟我讲：“Tukan（对我的称号），我走在前面，你跟在后面。若遇上人，我会大声讲话，你就躲闪一边。”就这样沿着连接边界的大森林开路去印尼。到了印尼那一边长屋，他就跟印尼那边群众讲：“我把这个人交给你，你要好好照顾他噢！”正因为有这些群众的帮助，所以几次都成功避过敌人的追捕。

还须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第二支队成立后在这里活动，有一次明光与蒂玛同志在那一带群众的稻芭跟敌兵驳火，蒂玛同志受伤，躲进“如基”（有一种又硬又易脆裂的长茎的蕨）丛里。马来西亚兵还驻在长屋，屋长看到了她受伤，却大胆地向印尼兵要消毒药水和纱布，说他自己儿子的手割伤了要用。这位可敬的屋长，约有 50 多岁，有一对长长的耳朵，上

身赤裸，下体用 Sirat（缠腰布）围着。他拿着煮好的饭和药给蒂玛，最后还把她背到同志们的地方去。

在印尼长屋住不久，从英吉里利转来范国强和叶贤钦（鲁恩），紧接着范子香、丘振芳（赖福）、蔡义清、志伟（成邦江来）、春华、郑春喜以及我们在丰洛联系的李汉文、李佑晴（部队名刘亚胜），徐锦木，Dalu（伊班族）等也相继到达。到此在丰洛开展两年多的民族工作就告一段落，我们以更激荡的心情踏上武装斗争的征途。

两年多的民族工作并不算长，然而给我许多感触。我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思想中存在着许多幻想、幼稚、软弱与温情，经过实践使我变得较务实与坚强，独立与粗俗；在比较艰难困苦与组织不能及时监督和指导的偏僻落后地区生活，是检验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可靠的最好的地方。在现实中考验下，大部分同志失败了。面对困难，我曾出现过许多思想斗争，想家、想往日在校的同学、想过去较安逸的物质生活和安全方面的斗争，等等。可是那时我想更多的是我来的目的、组织的教导与革命组织的纪律，不时勉励自己前进。在短暂初期的民族工作过程中，我没有做出多大的成绩，却给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从中我学到伊班语言，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风俗；也学到生存和生活本领……这些在往后的军事活动，特别是六年后（1968年），再以武工队的形式开展拉让江中游武工队工作（主要还是民族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 民族工作点滴体会

根据 1962 年“12.8”汶莱武装起义前的两年和 1968 年后，在拉让江中游武工队前后 10 多年搞民族工作的亲身体验，我有以下的点滴体会：

一、革命斗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只有他们自己起来了，坚决为争取与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团结斗争，才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在北加，特别要广泛动员与依靠占人口最多的、占据战略要地的达雅族，离开了他们的广泛参与坚决斗争，要坚持长期的斗争是不可能，也不可能有的最后的胜利。

二、要想得到土著群众的尊重与信任，首先就要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要以我们的诚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来赢得他们的尊重与信任。我们要入乡随俗，深入到他们中间，才能跟他们打成一片，这样我们讲话，他们才愿意听，也才能听得进，需要他们动时，才能动起来。

三、以少数人秘密的形式搞民族工作难度很大，也更容易损失。要把秘密与公开以及武装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特别是武装的形式，更具有威力与号召力，敌对者也较难对付我们。通过广泛的武装突击宣传后，从中找出典型，然后进行长期耐心的深耕细作。

四、当年搞民族工作还比较简单与急躁。试想，把一个青年人一下子放进偏僻落后的土著区，两手空空，没有任何帮助，全靠自立、自理。如果没有一定的思想素质与工作能力，很快被淘汰掉是不奇怪的。当时，我是凭着一股热情、怀着理想、和对组织的信任，并对为之奋斗事业的忠诚，我才坚持下来的。

如果是以华区为基地，利用和依靠先进的华族，利用华族与土著的良好关系，逐步开展混合区民族工作，进而再逐步深入民族区。总之，如能循序渐进，按部就班，要进可进，要退可退，会更有回旋的余地，更为妥当。

五、预防，避免和处理好群众被镇压、收买，也是一个要解决的大课题。当年在马罗河搞民族工作，老吴、小燕、安

西、李三等同志搞的长屋群众都不错，但随着敌我斗争日益尖锐，群众被镇压、被收买，群众的革命态度就会起变化。特别是有些地区的革命内部出现叛徒，出卖群众，致使群众被捕，有些还被吊着拷打，以致被活活的残酷折磨至死。这样，土著群众就会感到畏惧，以致在威迫利诱的情况下密报我军活动，陷害我同志。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当群众被迫害时，有些地方的整座长屋群众避到山里，要求跟着我们一起，但由于我们主观能力有限，容纳不了他们，不能有效地保护他们，结果让他们返家。他们在家里经受不了敌人的压力，结果被迫和敌兵一起对付我们。

我们的主要群众工作，说到底就是民族工作。我感觉到，民族工作开展起来不很难，但要巩固好，就难了。在拉让江中游时，敏战、丹莉、南章、亚福、亚厚，后来珍娜、德兴等与我一起开辟牛麻（S. Ngumah）的支流加牙河（S. Kajah）约整十座的长屋。初时，群众感到害怕，但我们以实际行动与表现，通过突破个别“兰高”、带动长屋，群众很快就消除了恐惧，向我们靠拢，被我们动员起来。我们更进一步，通过搞福利、医药服务、文娱演出和不断宣传教育，公开的把整座长屋群众集中起来开会，群众就被鼓动起来了。拉让江中游的卡地巴斯河、Poi 河、牛麻河和加拿逸河等几条大河的绝大多数群众都搞起来。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例如 Impah 和 Sinal（富春太太），Arok（Dap 长屋）还投入我们部队的行列。但当敌人的镇压超过他们的觉悟水平和所能接受的程度，我们又不能争取与捍卫他们的利益时，加上当时的阶级矛盾不够激烈和政府的改良主义政策的欺骗性，群众就会被分化淘汰，有的甚至反而站到敌人阵营方面反对我们。

### 参与印尼的连队

大约在 1963 年的三月大家集合后，就设法和在坤甸的领导联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联系上，因此就住在印

尼边界群众稻芭的小屋。一方面继续和组织上联络，一方面自己搞军训。白天拿着木棍在草丛里摸爬打滚，跑步练体力，晚上学习军事知识。粮食除部分自己买外，好多米粮是当地伊班群众给的。春华同志还不适应这里的气候生了病，发高烧又呕吐，那时没有药，锦木就到周围采些草药煮给他喝，结果服了几次就好了。

5月份左右，印尼志愿军通知我们转下到 Sintang（第12军分区）。在那里接受了由地方军教导的基本军训，过后就编入北加国民军（TNKU）第二连队。这连华族有30多位，一个连队总共120人左右，设有正、副连长和连部（迫击炮手、交通员、电讯、连长随从），连下分三个排（每排皆设有排部），每排设三个小队（每队10人）。连队是北加和印尼军方联合组成的，但是一切领导权都由印尼方面掌握，连长、排长和小队长全由他们担任，我们全是普通士兵，一切军事行动以及行政由他们决定，我们除了服从和执行外，完全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参加志愿军的人也很复杂，有的是地方军和退役的军人，有的是边界走私的，有的无业流氓以及普通群众，他们在连里占多数。当时组成的连队有第一连、第二连、第三连和第四连。在这几支连队中，除第三连的华族较多外，其余的仅占少数。他们不但品质差而且纪律性也很差。绝大多数参加志愿军，目的不是真正和我们共同解放北加，而是想控制北加或垂涎北加的物资。我们北加的革命战士还受到他们无理的欺负、刁难，我们只能忍辱负重，只能从长计议，从大局着眼，为将来累积经验，加强武器装备和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为建立自己的部队创设先决的条件。

简单的军训后，除原有二连人员外，我们后来加入的同志中，部分同志配有来福枪，有的只配给两颗手榴弹，每人一套军服、背包、雨衣、食格和水壶，但有好多人都没有。领了装备后，二连就迅速开往砂印边界（即第二省板督到成邦江这段），随后连长命令第一排进国内攻打距成邦江约14哩的 Engua 长屋英马军事哨站。但出师不利，在队伍刚越过边界就受到

伏击,二连里的革命组织负责人郭楚然不幸牺牲,无功折返。

我在第二排,当时是在 Selupong 距 Engua 长屋不远,附近的西成公路埋伏,准备打来往的英马军队。下午四点左右,驶来一辆砂拉越运输公司的巴士,印尼志愿军用中型机枪向巴士扫射,还好只打几发子弹,机枪就发生故障,巴士被打停,他们就冲上巴士用轻机枪打死身穿浅黄色制服的售票员(印尼警察是穿浅黄衣的),抢走车票和钱袋。我们当时已来不及和无法阻止这一错误行动,内心深感难过。

这次行动后,部队驻扎在印尼边境的长屋进行休整,暂时没有新的行动。不久,我、春喜、吴铁、鲁恩、李汉文、温尤远、温尤金、徐锦木、李恩端等被转到第三连。

第三连驻扎在 Badau (大约在国内鲁勃安都一带),全连中华族有 60 多人,是全部连队中华族最多的一连。沈智威(罗平)、沈耀彬、沈钦龙(沈坚平)都在这个连队。我们到后就参加军训。这次军训是由印尼空降兵(二等兵)328 营负责,训练内容较充实,要求也比较严格,时间为期一个月,是一次比较有成绩的训练。武器装备方面也作些补充,同时每人发给马币 100 元(数目有些模糊)。三连也进行整编,我和罗平参加连部,我负责电讯〔其实自始至终连队都没有电讯配备,只是正规军(328 营)有无线电话机〕。

1963 年尾,为了乘“柯勃德调查团”来砂拉越调查之际,向调查团表示砂、印人民的坚决反对马来西亚的立场,共有 160 多人(包括一排的印尼二等兵)的队伍,从 Badau (在鲁勃安都边界过去不远处)驻地出发,准备攻打加拿逸,在两位伊班人带路下,开进国内。那时几乎天天下雨,每个人的衣服都淋得湿湿的,晚上睡觉时也没换,就这样用年轻人的热血把它烘干。可是第二天行军又是淋得湿湿的,晚上扎营,雨布又不够只盖顶,地上就砍树叶铺。有一次我们在深谷扎营,原始森林的树木都长着苔藓又整夜下雨,第二天

早晨不懂如何炊事，个个都站着发呆。有的人索性将布鞋的的胶片撕来生火，有的将一包牛油丢到水淋淋的材堆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吹，就这样一双鞋煮一顿饭，往后只能赤脚上阵了。当同志们不知如何生火的时候，我们看到那正规军，参加解放西伊利安战斗过的老兵，拿着一把老虎刀在林中转，选择易烧的生树用刀削下一小片一小片的，将它叠整齐，很快的烧成熊熊烈火。以后我们向他学习经验，解决生火的问题。出发前，各自只带有十天的粮食，结果迷路在大森林里乱转，挨饿了20多天，什么能吃的都拿来吃。一天来到群众稻芭，他们砍生香蕉、采金瓜、砍割稻谷来炒，连壳也吃进去。吃的结果几天大便不出，异常痛苦。但我们砂拉越的革命战士，宁饿也不违反群众纪律，没有一个同志去采群众的农作物。最后，我们经过 Batang Ai 河尾长屋，抓了两个民防队员和缴到两把猎枪。这次行动中我们有一位志愿军因掉队饿死在森林中。一场看来颇具规模的军事行动就这样结束了。

当时的连队主要任务就是进入国内开展战斗。由于各队内部情况和所处地理位置关系，二连要比三连战斗多些。我自1963年尾离开二连后的两年多时间的战斗最频繁。他们几次结合印尼正规军进入第二省的 Batu Lintang 小镇，屡次遭到埋伏，继郭楚然同志之后李玛耀负责同志又牺牲；在第二省 Karingan（边界山）山扎营时，受英军轰炸造成社光同志等牺牲；二连曾主动攻击英军在“共邦朗尔”（靠近鲁勃安都）据点，双方用机枪、迫击炮，英军甚至动用火焰发射器，交火几小时。我方同志爬得很靠近敌人的营地，用来福枪射击。有个同志打到忘记后撤，当同志反复叫他时，他还说：“啊！撤退了！”然后才跟大家退下来。这次攻营虽没有缴获，但给敌人很大的杀伤，次日英军用直升机运尸将近整天。在这段期间，二连的营地也曾被敌兵攻击，都被击退。三连方面，1963年初开到边界后，就准备进国内打仗，一次部队于夜晚摸到 Batang Ai 河尾的长屋，由于事先行动情报泄漏，敌人当天就将长屋群众撤空。敌军事先埋伏在长屋周围的高点。当部队摸上长屋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志愿军开始捉群众的鸡，这时的军用机枪向长屋

猛烈扫射，大家听到枪声便迅速跳下长屋撤退，在长屋外守候的五号迫击炮手也及时朝敌人背后连发二炮，瞬间敌人火力停了下来。在这次行动中石源同志牺牲，江流同志腿部受伤。

“9.30”事件前的两年，是各连队战斗最多的时期，64年我连计划再次进入国内的 Batang Ai 河尾。那时其中一排先出发，二排三排在长屋稍后开进。早上九点左右，一排上到边界，刚坐下来休息，一队澳洲雇佣兵从反方向沿边界巡逻过来，那时一位志愿军小队长坐在树后抽烟，敌兵发现后首先开火，不幸那位队长中弹身亡。这时我方迅速还火，双方以机枪、迫击炮等进行剧烈驳火，战斗持续将近半小时，双方才撤离。过了不久敌人还用80毫米迫击炮向我们撤退的方向进行轰炸，并配合直升机在边界盘旋。整个行动就在这样遭遇后放弃了。

这段时期边界的夜晚气氛都显得比较紧张。时刻警惕敌人来偷袭，要注意敌人打来的迫击炮，几乎每晚都在隆隆的炮声中渡过，同志们学会根据炮声判定发炮地点，落地远近和什么型号的炮，以及如何防备等等。长期在炮声中使我们老练起来。

再说那次（1963年尾）去加拿逸失败回来后，我连就在“兰惹”（Lanjak）休整。和我一起行动的328营正规军被调回爪哇，他们从前线返回中央，好多装备可以不必带回，他们回去后中央可以再发新的，所以他们主动将这些东西卖掉。我们乘机会搞到不少物资，没有水壶的人就用钱（印尼发下的马币）买水壶；没有吊带的人就买吊带；食格、军刀、背包、军鞋、新的军服，雨布等等都买，他们有的喜欢手表，就用手表跟他们换，我们也想买他们的手枪和子弹，可是他们坚决不肯。总之有了这些装备补充，同志们才真正像一个完整的军人。连队里的砂拉越战士就是这样逐步完备自己，并为成立一支真正的砂拉越武装部队做贡献。

在印尼“9.30”事件前，革命组织在印尼的统战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左派力量进一步影响抗马前线工作，那时第三连队有40位同志转到中部的巴来哥兰岸(Balai Kerangan)。但由于局势很快向右转，这40位同志又转回马罗河。在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成立时，这40位同志成为这支队的基干。第三连队剩下20多位华族同志由我负责，一直坚持到最后起义。

在印尼“9.30”事件后，印尼局势向右转，印军对我方不信任，采取了防范措施。他们限制我们的活动。我们估计，印尼“8.17”国庆后，他们很可能把我们同志调回新丹集中，我们将被缴械和遣送给马来西亚政府，同时向我们在马罗河加拉央人民军基地展开军事攻击。为了挫败印尼右派的阴谋，为了更好的开展北加的革命武装斗争，我们从思想到行动上积极准备起义。终于我们在1966年8月17日胜利起义，坚持在第三连到最后的20多位同志终于起义回到北加人民军队第三支队。第二连在同时也有20多位同志起义返回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从而结束了约三年的寄人篱下，承受委屈的连队生活。

连队解散至今已经36年了，我仍然没有忘记当年的战斗生活。更没忘记许多感人的事迹和许多牺牲的同志。那时的连队并不像我们想成立的人民武装，占大多数又掌握领导权的印尼人也不是真正为北加的革命事业的国际主义者。既和他们一同战斗又要时刻警惕他们，既要团结他们又要作适当的斗争……。然而今天我还是认为在我国武装斗争史上，联合组建连队是正确的。三年付出的牺牲，也是有意义的。通过他们的训练和帮助，使我们学到了许多军事知识，掌握了战术和对各种武器的使用，得到一批武器装备，在政治和军事上有力打击反动派等等，这些宝贵财富对后来创建自己的部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参加过连队的同志成了自己部队的军事骨干，加速了部队的成长。

# 风雨战斗经历

## —我的片段回忆录

文生口述 青云整理

### 攻打 18 哩警署



我是人联晋连路 10 哩分部的执委，负责公开政党的工作，又兼负地下工作。我是参加温俊国、韩家顺、杨景放和赖世炼的小组工作，工作范围是晋连路 10 哩到 17 哩，到古晋的亚答芭。那时我经常上上下下肩负交通工作。韩伟平是直接负责我们这个小组工作的。

1963 年，印尼宣布对抗马来西亚，从此时有派军队到边界和越界到砂、沙境内，攻打警察署和军事哨站。

1965 年初，一支由 6 位北加里曼丹国民军和 20 多位西瓜哇的 Berawai Jaya 兵种所组成的队伍，活动到西连县一带，有一段时间是驻在晋连路 29 哩。在出发之前，这支队伍的上级交代了一项任务——炸飞机场。他们曾多次去飞机场侦察，看到机场主要是民航机，军用机只有个别架，而且有一定的戒备。同时，还要考虑到开展行动后，从飞机场到边界还有好长一段距离，在撤退过程面对围追堵截会有较大的艰险。另一方面，炸飞机场的计划遭到砂拉越地方同志的反对，我们同志认为这一行动影响较大，后果也不一定好。伟平也分配我去 10 哩警察署侦察，我去了两次，细心观察，发现警署周围挖有战壕，筑有沙包，且只有 6 位警察驻守。我打了一份调查报告，绘画有图案和说明呈交上去。截止日期

就要到了，若没有完成任务回去没法向上交代。於是，他们进一步商量策划，后来还是决定去攻打 18 哩的警察署。

当时这一攻打行动有没有得到砂盟第一省领导人的批准，我不清楚。当时陈传淦是省内最高的领导人，整个月的部署行动他不可能不懂，韩伟平也应该会向他汇报。不过，有一部分本地区同志表示反对，但这些印尼兵执着顽固，一意孤行，我们阻止不了，为了减少损失，只好给予协助与配合。

在行动之前，我们向陈文殿油站买了 20 多珍的润滑油。我们下一段的任务是倒润滑油，阻止军车载兵上去支援。6 月 27 日晚上 10 点，听到 18 哩枪声一响，埋伏在晋连路 8 哩、9 哩、12 哩和 13 哩的各组同志（一处有 4 个人一组）就在公路上倒润滑油，并用扫帚扫均匀。当时，我是在 9 哩埋伏，有人上来说 8 哩翻了一辆大型军车，阻止了后续之车。后来当局动用罗里车载了几车的沙石倒在公路油上，车辆才得以畅行。听说，17 哩与 22 哩公路也有倒油和放铁钉板，而且在 24 哩还有炸桥，炸坏了一部分，以阻止西连上面的援兵。

攻打了 18 哩警察署，使宁甘政府极为震惊恼怒，接着他就开展“铁锤”行动，把 15 哩到 25 哩的居民赶进新生村、来拓村和大富村。

### 参加 Riam 一带民族工作

“新村”建立之后，我在晋连路 10 哩一带潜伏一段时间后，就被调到廉(Riam)一带跟黄尼盛一起搞民族工作。这一带有几十座甘榜，西向有埔哥(Bungo)，南向有斯邦丹、斯国以至到安拔梯头。我的工作重点是在 Riam。我的任务是以公开政党的身份，住在长屋，跟他们搞好关系，也进行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要跟他们搞好关系，建立友谊，就要入乡随俗，白天跟他们一起劳动，晚上跟他们一起聊天。我还跟甘榜的人讲，若发现有同志经过这里去边界，或从边界回来这里，不要去报，而且还要给予必要的协助。每逢丰收节或

有什么庆祝活动，Riam 的甘榜头苏能(Sunam)会用舢舨载了我去跟他们一起欢乐。

若古晋党部有开展什么较大规模的活动，我们会发动几百名的甘榜人搭巴士下去参加活动。

在那一段时间，我在石山的洞里贮藏了好多珍干粮之类的食物、药物、锅等，准备给路过此地的同志们用。但一年多他们都没有经过此地，我后来去检查时，发现有的珍被老鼠咬开，一些药物被它们吃掉。

在甘榜活动时，我能得到达雅族群的保护。若有士兵来到长屋巡逻、搜查，能得到个别民防队的通知，屋长也要我躲进谷仑避一避，等士兵走后又叫我出来。

在我到安拔梯头一带时，曾听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早期这一带达雅人有猎人头的事件发生，他们砍头不是仇杀，而是跟你太好才杀你。因此，去那里常被人告戒，好友要离别时不可事先告知主人，否则，当晚主人就会把好友头砍掉。他是认为，好友离开了看不见，要把头砍下，可以陪伴自己，而且天天还能看到。

1968年中，林和贵他们回到国内的海口区。当年年底，我也离开民族区，被分配到海口区参加领导中心的工作。

### 海口区反“围剿”的经历

来到海口区后，我参加了领导中心的医药组工作。当时组员有叶碧珠、潘瑞汉、雪萍、杨文武、爱娟等，到了怒诺营寨时，包括实习卫生员在内，医药队人员已达约 18 人。医药队正常一星期召集一次，大家谈体会，交流经验，并讨论如何解决所出现的疑难症。这个会议通常是由潘瑞汉主持。医药队还关心同志们的健康和疾病，传授些保健、急

救、医药知识，鼓励同志们锻炼身体，治疗他们的一些病痛。我们还出版与翻印一些中医草药、医药刊物等。

在海口市期间，我总共参加了维持好几个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弄懂弄通一些基本观点，也比较能够用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去分析和解决一些问题。学习能够拿来用，这是学习的根本目的，也是学习的最大收获。

1970年2月24日，统治当局向海口市发动了第一省史无前例的军事“围剿”，我参加了林和贵那一大批的突围队伍。我们向南突围，过山马拉汉河时正是潮汐来到，河阔约整百尺，流水湍急，怎样渡河呢？讨论结果，决定做木筏过。我们砍了10多条香蕉茎，做成木筏，把枪、背包、吊带放在上面，会游泳的用绳子绑住木筏，一边在前面游一边拉，其他同志一手抓住木筏，一手划水。就这样，利用木筏，分成二批安全渡过大河。到了第七天，过了巴都工河，就到了晋连路17哩。利用一个晚上，从后芭出到大路边再沿大路边下到14哩。在此做小逗留，我们想用罗里车进行突击转移。我们找到一辆宝光石场的6轮载石货车，当晚30多人，绝大多数伏在车斗里面，用“加央”盖住，就进行冒险突击转移。车驾过10哩的警察署和8哩兵营（当时兵未驻进）到巴都吉当路，过了右手港，抵达甲港。

我们这一批30多人胜利突围后，领导上派亚昌、万里、亚弟和我四个回到海口市去接应未突围的同志们。我们利用一位姓林的公开同志的哥达船从石角驶到青山，再由青山驶到靠近亚沙再也(Asajaya)河口的海上。我们装扮在海上捕鱼，在海上一直观察了一天，发现有几艘船在河口。当时还是戒严，当局还在“围剿”，估计是兵船在河口，要从河口驶进是不可能的。万里认为，情况不明硬硬要闯进，是比较冒险的。於是，他主张倒回向领导报告情况。

## 参加两场战斗

自有关当局开展“巨网”行动以来，不断地通过电台、报纸等传播媒体宣扬其“战绩”，宣称“海口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已被消灭了”，云云。为了反击其反革命的舆论，证明我武装力量没有被消灭，领导上决定派万里、阿末、杨祖国、民华和我五个，去海口区打一场骚扰战。

在中秋月圆的晚上，在民华的带领下，我们用船来到了青山的对面岛—木良，再搭群众的船到三密(Sambir)上岸。我们向南走一段后，就向诺怒警署方向去。一路上，见不到一个群众，“围剿”后的海口区是一片漫荒野地，疮痍满目，许多人都搬走，人走楼空，有的蔓草爬进屋内，菜园变成荒芜，椰子跌满地无人捡。听说，戒严期间，有马来人在屋外采椰子被打死，一位13岁的小姑娘没米吃在稻田里割稻也被打死。

经过几天的行军，我们到达怒诺警署的附近。在摸近侦察后，我们估计有10多个警员在里面。我们决定天暗时才行动。警署是隔了一条河，我们摸近靠在河的这岸打它。行动时间到，大家同时向着警署的目标射击。顿时警署陷入一片寂静，过好久才有一些零星的回枪。我的LA来福枪一共打了整10发，才罢休。

骚扰目的达到后，我们基本上从原路倒回三密，又回到青山。

另一战是在海口区会议之后，在晋连路32哩所进行的埋伏。

我们选择一段弯路，呈现“L”形，我们29位战斗员就埋伏在“L”形路的右边。总指挥是黄汉，战地指挥是李光，他的位置是在中间，能观察两边、照顾两头。

某日上午约11点，在投入埋伏、屏息静待的当儿，终于等到两辆来自西连上面的连古舍兵车，载了10多个士兵。

兵车正在我们面前驶过，个个战士手握钢枪，瞄准目标，等待指挥枪一响，就一起扣板机，痛痛快快地打一场。转眼间，兵车驶出了埋伏圈，怎么没有开枪？我们都感到纳闷不解。后来，才知道是指挥员在打盹！稍纵即逝，错过机会。

兵车才过约半个小时，我们发现东面、东北面和东南面都出现有敌兵，我们意识到情况突变，意识着我们已暴露了，正陷入敌兵三方面包围之中。总指挥就下令撤出埋伏点，向西南方向转移。正当队伍转移之时刻，敌军就发起了攻击，投来的手榴弹在埋伏点爆炸。我跟另一个同志负责狙击，我们俩退下一点，选个地方，就向枪声响、草动的地方开枪。转移的同志约走了半公里多，打算突过路的北面，见路上面有二个士兵在站岗监视。杨同志是个神枪手，他自告奋勇干掉这两个，掩护同志们过路。他举起捷克的来福枪对准其中一个，“砰”一枪，只见他在半公里外倒下，另一个见伙伴被打倒，则慌忙而逃。看到同志们安全突过马路，我们俩跟约整百名敌兵在对峙，坚持了半个小时，一共打了9枪，才撤下火线，从后面跟上大队。

我们为什么暴露？根据后来了解，埋伏点旁边有一个爪哇妇女割胶。当时埋伏的两头都有同志守岗，一头守岗同志发现那个妇女割胶，没有及时向指挥员报告。本来规定若暴露要把人扣留住，等打了战才释放。可能那个妇女发现这一“情报”，赶快搭车上西连警署去密报，才引来了敌军的包围。

之后，敌军在这一带进行搜索，并在山马拉汉路的半路设下埋伏。兵士在埋伏的前面路上放了很多的树枝干叶，若晚上我军从这里经过，踏到枝叶发出响声，就发起进攻。诟料，第二天晚上，他们自己巡逻兵经过那里，误以为是“共军”，双方厮杀了一阵，死伤有整10个。

## 海口区会议

海口区会议是个重要的会议，会议需要解决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党军问题、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问题，研究国内外形势问题，等等。已经有7年了，国内高层领导人的会议还未召开过。大家都希望能见个面，商个议，求得共识，解决一些迫切问题。

1972年中，林和贵带了10多名人员从马当出发，用水路来到三密，先进后山驻扎下来。过不久，李江带了黄纪作及陈虎、立国、恩端和东华等身边工作人员来会合。

会议是黄纪作来后的第二天就召开。出席这次会议有黄纪作、林和贵、谢嫣素和黄纪晓四位。东西部领导人在中间开会，两边是各自的警卫员和工作人员。我们周围的同志会隐隐约约听到他们谈话声，听不到内容是什么。会议是上午九点开到11点左右，下午是1点开到4点。第一天散会后，看到与会者面带笑容。第二天没有引起我们特别感觉。第三天散会后，气氛不同，与会者的脸色难看。第四天虽然还有召开，看来有开与没开没有两样。

会议开完，林和贵等就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叶碧珠与黄纪晓留下，黄也要求我留下帮忙其兄治疗痔疮。我们大伙离开会议地点，转移半天的路程驻扎下来。

在这10多天的时间，主要是为黄纪作医疗痔疮。未来之前，我去石角找一位姓彭的老中医，他配了治痔疮的秘方给我。

在治疗痔疮尾声期间，范国强、黄赛莺带了江先芳、蔡细妹等一批人也前来集合。

范、黄来到的第三天上午10点左右，一股巡逻兵在森林搜索时，正好闯到我们的营地，跟站岗驳上火。大队在撤退时，黄纪作的特制右手套遗漏了（纪作曾试炸手榴弹，右手手指受伤、中指与无名指被锯掉），暴露了纪作的踪迹。在

撤离 3 个小时左右，有个战士阿末建议，他带个同志倒回敌军已占领的那个营寨进行骚扰，让他们不得安宁，睡不好觉。黄汉批准他的建议，并要他打了再倒回大队。

当晚当局就从三密、诺怒和霍若港采取三角度轰迫击炮进森林。一般上，若森林里面有自己的军队，炮弹不会轰向森林。这次当局可能联络不好，森林里有驻军仍轰个不停，甚至一颗炮弹在很近兵营处落下，森林里面的敌军不得不向空中发射一颗红色讯号弹，轰炮的敌军看到才停止发炮。停了一天，第三天又开始炮轰森林，连续轰了约一星期才停止。其实，轰炮的作用主要是起一定的心理作用，有时他们一个晚上於 20 点到 0 点轰一次，凌晨 3 点到 4 点又轰一次，让我们同志提心吊胆的，彻夜难眠，疲惫不堪。要说轰死人在国内还未听到。不过初时听到炮声会有些紧张，听多了也习以为常，只要没有听到“波咯波咯”（落在近距离的声音）的声音，我们自走自己的路。其实，我们掌握对方轰炮的规律，待对方轰时（说明森林里无兵）我们就动（转移）无轰时就静（停止转移）。晚上休息的地方，最好选择有大树之处，尽量争取找轰炮相反的方向，在大树的背面休息。一般上，炮弹先打到树梢就在上面爆炸。

大队到了如毛涧，在此黄兄弟分手。黄纪作带了 10 多人向西连路方向转移。我跟黄汉等留下在海口区约一个月。

时光如流水，30 多年不知不觉在流逝中，但战斗的经历仍铭刻在记忆里，激励我在人生旅程上奋发向上。

# 风雨战斗历程

- 我的片段回忆录

广平 凯锋协助整理

## 开展伦乐地区的工作



广平留影

1961年，组织上下达任务，要我去开展第一省伦乐边界一带的陆达雅民族工作。具体的地区是 Karangan, Sebako, Pui, 以至不超过 Bau 县。我二话没说，就离开了 10 哩分部公开政党的工作，放弃了印务工作，离开了家，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伦乐地区。我的民族语言又不会，真是茫无头绪，不知该从何处着手？

研究结果，认为还是首先应从深入实际工作，从调查研究、摸熟情况入手。沈友贵、蔡仁昌、姚佳裕、钟昆柱、和我俩花了二个星期去 Selalak, Sebako, Pui 和 Pamaga 了解情况。在比达友族过年时，我们一起去几座长屋跟兄弟民族欢渡丰收的喜庆，进行初步的接触。

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开展伦乐边界的民族工作，但实际上我更多的是开展伦乐的华族工作。

我来到伦乐 9 哩 Serayan, Selalak 和 Perigi 这一带华族农村，都是疏落偏远的村庄，各区也只有 20 多户到 30 户家庭。我住在群众家，名义上是割胶。白天晚上就在坡里活动，进行调查研究，联络群众，发动和依靠群众中积极分子，逐步开展工作，打开局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努力之后，我在 Serayan 的大伯公庙成立一组学习班。在 Selalak 和 Perigi 也成立有 10 多、20 人的学习班。一星期学习 3 天，主要是学课本，从中也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另外，我也组织歌咏队，一星期唱歌一次。我主要通过以上形式联络群众，从中发现和物色积极分子，并用农会来招收他们。再从积极分子中挑选优秀分子，吸收他们进砂拉越先进青年会。一年来我吸收了几个 O 员（砂拉越先进青年会会员），有些工作我就分配他们去做。

1962 年 12 月 8 日，汶莱事件后，我就离开了伦乐 (Lundu)。

### 分段开路到印尼边界

在武装斗争被提上议事日程之后，我们就积极准备武装斗争。要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就要熟悉国内路线和通往印尼边界的路线。领导上要蔡仁昌、姚佳裕和我负责开辟从马当到印尼境内巴罗的路线。具体的分配：由蔡仁昌负责从三巴里 (Sampadi) 开路到山马丹；姚佳裕负责从山马丹 (Sematan) 开路到印尼境内的巴罗 (Paloh)；我则负责从马当到三巴里一段。我从石隆门出发，首先用船，后行进到马当红桥。这一段路线有李运华、江纪松跟我配合。

这样的“开路”不过是走马看花，还不能真正学会用地图和指南针开路，不过至少对地形、河流、路线等有个感性认识。同时，至少也说明当时组织对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有些战略部署与全盘计划。

### 在石洞里避过一劫

开路之后，我回到家里等待新的任务分配。

一个夜晚，我兄带了叶存厚、杨柱中、林和贵、林广民、贝文对等 20 多人从新路来到我家，并住在此。他们可能

认为，旧地点用一段时日了，改用新地点会较安全。

那时正遇上我的父亲不幸逝世，家里人来人往较多。为了避免暴露，绝大多数同志又回到新路 12 哩，只有叶存厚、杨柱中、田云端和林广民等少数同志留下，住在我胡椒园的茅舍里。不巧，他们被附近的达雅人发现。我们估计达雅人会去报兵，决定要迅速撤离此地。我跟家人就把同志们带到 15 哩的燕窝洞里躲避。果真不出所料，达雅人带了一股士兵来追捕，他们上围下堵，左搜右查，在附近的可疑处进行了密集反复的搜索，唯独没有进石洞里。

原来，以往有达雅人进石洞采燕窝迷路而死，他们视之畏途，不敢轻易进石洞。石洞有 2 哩长，分为上中下三层，石洞里奇石嶙峋，多为高低不平，也有的平坦一片，也有的陡峭如墙壁，叹为观止。洞里有小湖泊要用木筏撑过，白天风吹进来，晚上风吹出去。洞里湿气重，书带进来不久会变成柔软的，灯光也显得雾蒙蒙的。石洞结构可谓错综复杂，星罗棋布，如入迷宫，走得进，出不得。石洞里黑黝黝的，要照明才能走。为了不迷途，必须拉线、放叶子，在拐弯处要写字或记路标。我想，即使明明懂得有人在洞里，也未必都能找到。叶存厚他们只住在进洞半小时的地方，瑞成迷路了 2 小时才找到。在里面罐头等都不大能吃得下，一旦出到洞外，皮肤就变成苍白的。

避过这一劫后，叶、杨、林和田云端等决定去印尼，由瑞成、甘石春、陈发和罗星负责带路。大伙向安拔梯头前进，过了打必禄，就由印尼那边的人来接应。

### 设法跟印尼军方联络

据说，马当 Selang 一带有个马来甘榜，在“12.8”前有印尼军队到此召集马来人进行军事训练。获悉此事，沈友贵带我去那里想见印尼军官。我们从 12 哩出发，由人带到石

角，再到马当由李运华接应，走一段小路才到王秀昌家。但迟了一步，他们走了。

友贵先回工作岗位，我留下掌握情况，见机行事。在此，我顺便召集群众，对他们进行武装斗争方面的宣传。稍后，我有见到马来人交通员，他说当前处境危难，马来人少，主要要靠华人。

过后有英军侦察机沿着这一带河流低飞和进行盘旋，也有一部分甘榜的马来人被逮捕。

在此间我收到马来人给的一封信，其内容大概讲：一、帮助了解情况，调查飞机场、电力局等处；二、露天巴刹XXX 马来人可以联络；三、要华人帮忙出汽油……。我把这封信带回交给了负责人。

待我再倒回秀昌家时，他已跟印尼队伍去到印尼。我就在秀昌家等候联络，希望能跟印尼方面联络上。可是不巧遇上了政治部人员来捉秀昌，主人捉不到，我就被当作替身而捉走了。

## 在印尼后方开展工作

由于政治部没有掌握到我的多少情况，给我蒙混过关，拘留了一段时间后，就把我释放了。

释放后几天，我就收到负责人的来信，要我上边界。63年6月初，我们一共有86人想越界去印尼参军，却在途中出事，绝大部分同志被捕，只有21人从破网逃脱，我是其中的一个。在晋连路24哩逗留一段时间后，我顺利去到了印尼。64年10月1日我到了山口洋，在那里休整一段时间。

1964年，组织上决定成立北印中部边区工作委员会，我也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我主要负责从三发到伦乐一带

的民族工作。

我负责带两组同志去开展这一带（后来就是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活动范围）工作。第一组的同志是陈瑞庭、田锦华、刘和海和老郑，以假狮（Jawai）为基地。第二组是吴俊八、刘武月、丘志远和余特云，以直木港（Tebas）为基地。

要开展印尼后方的达雅族工作，首先要有个合适的身份来掩饰自己，并尽可能深入到民族中去。在第一组的同志方面，刘和海会锯板，他利用其关系带田锦华（剑伦）到巴罗河尾 Sekuyu 去锯木。老郑就在直木港当店员负责联络。陈瑞庭则留下待机而动。

在第二组的同志方面，刘武月没有关系，自己去闯，他去 Seribut 烧炭，还认了一对达雅夫妇为义父母，也在那里砍芭种稻。吴俊八（金水）利用房先生的关系，叫他的女儿带他上到 Sakura 河尾，认识了那里的达雅群众。后来他带上一一些货物做点小买卖，由于资金短缺和怕人家讲剥削土著，他就邀本地土著一起合股开合作社。志远和特云（比德）等加入一起办合作社，一星期下来办货一次。他们利用合作社的形式进行组织教育达雅族。

再说，中国派的陈某在 Sakura 有橡胶厂和米较厂，据说他是印军的情报员。陈的姐夫在三发是个左派的民族资产阶级，有“橡胶王”之称，他有钱有势，跟印尼军方和各种势力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把余秋兰安插在他的家当女佣。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利用了这种关系。

砂罗越人民游击队在阿桑山成立之后，部队逐步在附近开展工作，以武装的形式开展民族工作，实际上更有威力与号召力。这样部队的同志取代了我们的民族工作。我们还利用陈某在 Sakura 中间地带开辟一块地，把瑞庭和锦华调来申请一块，和海与我也申请一块，再发动直木港（必须要有有

10家才能批准)的6家群众一起来。名义上我们在此开荒种地,实际上是设联络站,并开展印尼后方的地下工作,支援部队,为开展往后的武装斗争奠定基础。

我们根据领导上的指示,为了配合边区部队会议的工作需要,潜伏在群众中以印尼人合法身份出现。所以每一个参加工作的同志,必需遵守和做到下列几点:(一)要有合法的身份证;(二)要模仿当地人的口音,(包括方言、马来语)要懂得当地人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及有关地方上的特点;(三)要有适当的职业掩饰;(四)避免在公开场所和部队或公开的同志接触。

到1967年,部队由公开转为非法后,我们在第一支后方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搞经济和运输。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建立2条交通线和5个联络站。一条是内河的交通线。即:由直木港-斯古拉-丹容乌利八-直到边区部队。另一条沿海交通线是假狮-巴罗-打马若。交通站以丹容乌利八为中间站,上游能直接联络部队,下游能联络后方的同志、群众。

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建立后,及印尼局势的变化,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大部分被调到其他单位去,只剩下我和陈瑞庭,其他人都是西加群众。第一支队的同志们,失去了和其他支队或单位的联系,要我们帮助解决所需的物资(主要是粮食)。当时我们手中又没有钱,和领导上又失去联系。怎么办?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捐物、捐钱来支援部队,支援前方。那时的工作主要是搞经济和运输,深感到时间的紧迫、人手的不足,特别是干部力量缺乏,本身能力又差。除了主观困难之外,还有客观上造成的压力是很大的,如军警、特务份子横行霸道、抓人、杀人时有所闻,处在白色恐怖气氛中,无不使人心惶惶。同时还面对我们的友军,印共同志,对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之前工作)有所误解,在群众中产生不良的影响。

到1968年底，有一次在陈瑞庭同志的带领下，把一批物资运到部队，任务完成后，返回临时的休息站时，遭敌军围捕，陈瑞庭同志等四人被抓，另有四人先离去免遭逮捕。瑞庭同志为了保护被捕的群众，来一个假口供，敌人对群众还存有怀疑，用严刑拷打，想找突破口，结果一无所得，失败而告终。这些群众冒着生命的危险，和肉体上的摧残，捍卫了部队的安全和群众的利益，他们的行动，他们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在革命的征途中克服困难、坚持工作，继续向前。从此我们的内河，内陆的运输线遭受破坏停止运作。

1969年初，第一支队的同志派邓远达及咪咪同志到后方来联系，得知火焰山部队一部分的同志在黄纪晓的领导下，胜利的转到第一支队来和第一支队同志们会师了，这个消息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和勇气。前方在缺粮，同志们在挨饿，我们当务之急要把粮食运到前方去。同志们，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在刘国杨同志（文刀）负责下，克服了种种的困难，采用了海上交通线（由假狮、邦夏、新楠到打马若）终于把一批批的粮食运到前方，直到部队全部撤回国内。（这条线在二中队时1970-1971年，一直使用）

我一直坚持在印尼后方工作，直到1969年初，我带了最后一批29位同志（注）撤离北印边界回到国内。

注：最后一批29位同志撤离边界回国，他们是：

- |         |         |         |         |
|---------|---------|---------|---------|
| 1, 何玄招  | 2, 廖桂银  | 3, 廖显德  | 4, 廖显清  |
| 5, 何永财  | 6, 何永福  | 7, 钟丽霞  | 8, 何天庆  |
| 9, 韩鹏发  | 10, 朱云辉 | 11, 蔡欣娘 | 12, 黄克山 |
| 13, 潘瑞清 | 14, 郑美娥 | 15, 邓远达 |         |

（以下的是部队名）

- |        |         |        |        |
|--------|---------|--------|--------|
| 16, 陈锋 | 17, 坚赤  | 18, 细锋 | 19, 江华 |
| 20, 向欣 | 21, 钟江红 | 22, 红云 | 等      |

## 往来边界的日子

### 我的片段回忆录

余添松口述 振曼整理

#### 护送三批同志过边界



余添松留影

当年我们越界到印尼去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第一批从水路去的要比陆路稍后一些，而第一次从第一省水路去印尼的队伍，则是由我负责驾船领航的。

那是1963年5月21日下午2点，从不利基（Perigi）下船。这一批同志是曾佩雄、蔡仁昌、姚佳裕、赖添善、黄天石（刘忆民）、刘伍岳、刘六巡、赖仁日、洪明友（陈维平）和刘天石（刘忆民）等15位，乘坐一艘大的舢板船，只有4马力的引擎来推动。船只从山马丹河出口，幸好一路风平浪静，凌晨2点就顺利抵达伯拉诺（Tg. Datuk 下一些）。船主谢铁完成护送到这里后就独自驾回，我则连夜带领大家向西越界。走了接近2个小时到了印尼境内的打马约，在此有以端古鲁（即Amad Zaidi）为首的砂拉越马来青年阵线的部下接应。

那时，同一天林和贵他们一批乘哥达船也到此会合。我把带来的参军者交给他们后，自个又倒回去。

回到不利基，我等待着运载第二批。这一批有18位，女的有5个：胡玉金、许素英、陈日钗、洪秀保和黄清莲。男的有13个：陈祥林、陈锦业、裕奎和刘振为等。5月23日午夜从同样地点出发，清早7点就在目的地上岸。这里有船主打猎住宿用的茅屋，提供了通讯联络的方便。同样的，船主又驾船回去了，我也又带同志们越界去跟阿末再迪的联络站联络。

在这砂拉越的西端，西加的北面是一望无际、浩瀚的大海，南面是葱葱郁郁的原始雨林。次日一大早，我们沿着平坦岸边沙滩走，在骄阳曝晒之下，又热又累，走了整天真是举步艰难，傍晚到 Mutusan 河边时已精疲力尽了。随后，乘马来人的船过巴罗河，在尼古（Liku）受到村长蔡木林的接待，在这里过一个晚上。

从尼古步行一天才到 Sakura。当晚在陈开寿板厂停一夜。翌日，乘摩多船 5、6 小时到直木港，转搭巴士经过邦夏（Pemangka），最后到达山口洋（Singkawang）。到了这西加华族最多的市镇，我们受到叶存厚等同志的热烈欢迎。我们被安排进巴士兰跟约几十位同志住在一起。

在山口洋约整个月，我往返打马约——马当两次。我要准备接受执行新的交通任务。

1963 年 6 月中，我回到国内，到三巴里（Sampadi）后安排了 3 艘船，分别由陈领梅、江纪松与李广华各驾一艘，把第三批 28 位同志是由李应华带领，由我接应护送到伯拉诺过界。

### 和阿末再迪的人员往来

在印尼边界的打马约设有一个联络站，这也是国内与山口洋等印尼后方联络的一个站。我有时在打马约，往返国内与山口洋之间。过后郑裕奎和陈清福也跟我一起负起这任务，3 个轮流往返执行交通任务。

有一次，端古鲁（阿末再迪）的部下要我把 42 支轻机枪和整万发子弹从印尼运进伦乐，武装人员随后跟着进去。安排好了，不知怎么的又变卦，他们只带 20 多支轻机枪改道去拉让江，先到达老（Daro）上岸。当时，我也有见到婆共的刘家模，他们跟阿末再迪的人有来往，阿末再迪他们又跟汶莱人民党的阿查哈里有密切的联系。在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之

时，他们三者有某种程度的默契与合作。在北加里曼丹合众国成立后，我们也跟他们搞统战。阿末再迪是无兵司令，我方有派出林华章、赖仁日和陈香林等 60 个同志供他分配与使用。

当边界局势吃紧之际，联络中断，我回到山口洋住进群众的家。在这期间，没有交通任务时，我就参加劳动生产和搞自己的学习。

1964 年初，余新章和我跟文铭权、黄纪晓和杨柱中共 5 个一行人从山口洋乘巴士到邦戈，由此下兵船，驶到巴罗河下船。我跟他们进到阿桑山（Asuansang 山高 600M，是当地最高的山）接受一个月的军事训练。

一个月后，我又回到伦乐，加入余新章、姚佳裕和彭健良的小组活动。

### 回到山巴里联络出事

一个月后，我独自到山巴里处理联络问题。当晚，联络群众把我安排在离他家有一段距离的小破烂茅舍过夜，他说会去找另一个来见我。凌晨 3 点，他住家传来了犬的狂吠，情况有异样反常。当时我曾想转移别处，但天又下着毛毛细雨，我又睡了。东方露出熹微的曙光，我起身坐着，6.15am 想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新闻。我不经意地从草丛的空隙望出，似乎有人站着，我轻声“嘘”一声，但对方没有反应。我再看个清楚，令我一惊，突然出现两个敌兵，就站在咫尺我的面前。原来在此有二条路：右边一条去水井，左边一条来茅舍。他正左看右瞧，不知要走那一条。我想拉上 Sten 枪的枪栓，又怕弄出声来对我不利，而又不自主的喝一声。敌兵听到一下子伏下去，离我更近。在敌兵还未弄清怎么一回事之前，我顾不了背包，就用力冲破茅舍，迅速就地一滚。紧接着，就听到对方的“哒…哒…哒…”枪声。等敌之枪声一停，我又第二次翻身一滚，冲出一段。对方又接着雨点般的打过来。稍停，我又作第三次冲击，靠近一棵椰树下，伏在椰树的背后。这样，

子弹就不容易打到我了。随后，我就伺机悄悄脱离火线。撤离一小时后，大雨滂沱而下，我也跟着迷路了。

直到下午三点，太阳才从云里露出来。我又走了二个小时，走到 G. Papan 找到了 X 夫。据说，这一带沙滩有百多名敌兵，还有离我只有 5 分钟的路程，有 60 个敌兵带着警犬在搜索。我拿了粮食、刀等用背篓背了就撤进后芭潜伏起来。我有跟群众约暗号联络。据说，翌日有几十个士兵住在群众家周围，为了我的安全，群众悄悄地进芭找我，却没找到。

我转移到日本时期种稻和过去打山猪的地方，选个有利的山丘地形，估计敌兵可能来的方向，既有利发挥火力、隐藏自己，又有利于撤退的地形。心想，当天晚上若有拉好枪栓，就可以射它一阵子。这次若敌人又来，绝不让它们占便宜，要严阵以待，狠狠打它一顿。

几天后，我又转到后山另一家群众，我潜伏在他的后芭，每餐由他负责给我送饭。

约整个月后，我被安排回伦乐。我跟佳裕、新章和健良住进一个山洞。我们的保干群众经常被政治部调去问话，历时已久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因而对他失去了警惕。

1966 年 5 月 21 日，我独自休息，其他三位同志在研究什么问题。我听到洞外香蕉树响，以为是达雅人来砍香蕉，我悄悄地爬到洞口，把枪管伸出洞外，又探出头来，咋的，看到几把枪口对着我，我一吓，跌倒在地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保干群众出问题了，敌人派了 40 个士兵来包围这个山洞。我想从另一出口溜走，但也被堵住。敌兵大喊，出来不杀。我们四个碰个头，交换了口供，并要他们保证不虐待、不迫害才出。对方接受了我们的条件后，我们才出洞外，……。

## 被判死刑，后进黑牢八年

我们先被监禁在三角坡。第二天被押到古晋，被控上低等法庭。第三天我们又被当局引用“公共治安法令”，在高等法庭上判处我们死刑。我们没有律师，在程序上政府要安排律师为我们辩护。政府安排的四个律师是杨国斯、张守江、余锦成和 Hassan。在法庭上，我们异口同声否认有罪。杨国斯质问法官，当时答应保证不虐待、不迫害才出，为什么前后变卦，反而要判死刑？法官回答说，这一法令在砂拉越还未通过，还需要内政部的批准。这样，我们的案件暂时压着。

六个月后，法庭上宣布撤销我们的案件，获无罪释放。释放后，才走出法庭，我们又重新被捕，警车把我们载到 6 哩集中营。我被关进黑牢 8 年，直到 1974 年才踏出牢门。

## 独自“非法”战斗的经历

詹雪娇口述 江宏整理

### 在泗里街时的“非法”战斗



1962年12月8日，汶莱人民武装起义之后，英殖民者由牧师式的角色骤然露出青面獠牙，磨刀霍霍杀向要求祖国独立、民族解放的广大人民群众。在统治者的大肆逮捕和野蛮镇压下，不少热血青年转入地下坚持“非法”战斗。当时，泗里街是个红区，反动分子也较猖狂，敌我斗争是比较尖锐的。

为了保存力量，更好的开展工作，当时，只有17、18岁的，而且还是一个娇弱少女的我，就离开温暖的家，投入了“非法”战斗。

我的故居是泗里街的伯特利，转入“非法”战斗后，我就在本地区和沐鲁都两地活动。我的主要工作是搞农运工作，团结教育农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团结教育这两地的青年学生和农民青年，组织小组进行学习，通过他们去联络群众，去收捐、搞劳动福利、分发刊物文件和组织学习，等等。有时我也去拜访群众，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解决群众中的一些问题。

当年的农村华族都普遍同情支持革命，有相当一部分积极支持和实际参加革命活动。那时不支持或反革命的人，反而受到坡众的孤立与唾弃。我“非法”战斗在群众中，处在群众的掩护与保护之下进行工作。有时我住、吃和睡都在群众家，有时是在群众椒园的小茅棚里。那时还未有武装，因而没有枪枝可以进行自卫，但我的胆子还不算小，一个年

青的姑娘敢孤身只影的睡在群众胡椒园的小茅棚。有一次，夜深人静时，群众家的狗骤然狂吠起来，吠得很凶，我估计有兵来包围，就立即离开茅棚，潜入草芭里。当时大雨倾盆而下，我全身透湿，冷得上下牙齿直打架。好不容易等待天明才摸去找群众，了解情况。

当年早期“非法”战斗的泗里街同志不少都住过地洞，我也不例外。有时我有事来到鲁勃路 5 哩半一带，就曾经跟陈明存、王世良和卢宝兰等一起住在地洞里。地洞里湿气重，空气不足，蜡烛点的火都不明亮，下雨时情况更为不好，长期住地洞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若敌军带警犬来巡逻寻找踪迹，有可能被发现，到时将是瓮中捉鳖了。

在泗里街时，我“非法”战斗了二年多。

### 在诗巫时的“非法”战斗

基于时局变化和工作需要，1965 年我被调到诗巫的王士来一带工作。我住在黄家（他的太太我叫表嫂），对外人讲我跟他们是亲戚关系。每天凌晨 3 点多，我得揉揉迷蒙的眼睛，起身帮群众割树胶，要忙到将近一个上午才能绞好胶片。初来时工作不多，我花好多时间跟群众一起劳动，先从生活和思想感情上跟群众打成一片，然后安排其他时间进行工作和学习。

当时黄保干的隔壁家一个群众的孩子也有参加小组学习，保干群众严密做不好，把我的身份暴露给他们知道。但这家群众思想又较狭隘，他们可以因为我们这边树胶割得较多而产生嫉妒思想，也因而他们把我的情况泄漏给我们的橡胶园主。有一天，这位园主来到黄家，我躲进谷仓里，听到他警告保干群众不要收留我，省得惹来满身蚁，……。

在表嫂家只有几个月，基于上述原因，我主动离开了黄家，转到同坡的刘家。到了刘家，我同样清早 3 点多就起身，通常煮了一片干面，草草地吃了，绑着戴上一盏“波多”灯的

草帽，就独自进芭去割胶了。我一个人割 10 英亩的橡胶，工作量是很大的。而沼泽芭泥泞难走，一旦下雨涨水更难走。胶树根又高凸出地面，橡胶树老，树瘤又多，割起来格外吃力。有时一株胶树正面胶刀下割得又低又长，反面胶刀还得上割得又高又长，有时踮起脚尖还割不到。忙了一个上午，8 个多小时才割 4、5 片胶。我把自己出的力、流的汗，所换取的劳动成果全数交给群众，归群众所有。

群众跟我的关系都很好，他们大小都亲切地叫我“阿姐”。有一天保干的两个女儿上诗巫市去，她们在渡轮上看到我的相片和被通缉的传单，她们赶紧回来，哭泣着说“阿姐会被捉了”！我意识到，从此活动要更加荫蔽，也更加困难艰辛。

自我被公开通缉后，割好胶一回到保干家，就潜伏在天花板上。吃饭时，要用一条绳子把饭盒装在篮子里吊上去。要冲凉、下屋、要上屋都要留意小心，群众也会帮助看守。

当革命组织提出室外保干政策时，我就不住保干家了。我在离群众家几分钟，在自己割胶稠密的胶芭里找个地点，就自个动手建一人住的小“屋”。我明明把小树柱子插得一样高，坐上去后却高低不平，失去平衡。经过研究我才明白，原来烂泥土本身虚实不均，必须在插入泥土的四个柱子旁，在接近地面处各横放一条木，跟柱子绑在一起，才能稳住。四边的柱子要一样高，架子做好，再铺上几块木板。小“屋”的四周用雨布围住，要时随时可以打开。“屋”顶是用“加央”盖上。这就是我的“栖身之所”。再拿一些米、菜、小火炉灶、土油等，就可以煮吃了。

一个女孩子住在草芭里孤身只影，老实讲我是有点怕的。怕什么呢？怕敌兵来包围袭击甬讲，我也有点怕蛇怕鬼。听群众讲，蛇怕雄黄，于是我在“住所”四周撒了一些雄黄。可是涨水时，雄黄却被冲掉流走。又听群众说，鬼怕

铁片，於是我在“住所”放些铁钉、铁片之类。这样，我的胆就壮了。在这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环境下，一住就超过3年。

在这里，有时我约坡里的青少年积极分子来我的小“屋”学习、讲故事和搞联欢。有时我去到邻近坡跟同志们开会，和去组织教育群众。

### “八卦”陪伴了我近三年

有一次，我去对面江丹章公集一带处理联络问题，而那一带发生狗瘟。一个群众说，有一只小狗问我要不要。我想有一只小狗跟我作伴也好，於是我就把它带回去。这只黑白色的小狗，眼还未睁开，还未看到它亲生妈妈。我找了一个奶瓶，每天喂他喝奶，它大概把我当作它的“妈妈”吧。平时有空时，我就逗它、训练它。它在慢慢长大，也变得有点懂事、乖巧。

由于它的两耳下垂，有些像八卦，於是我们（包括保干群众）就取名叫它“八卦”。为了减少进出的痕迹，有什么事情有时我叫“八卦”代我去办。我写了纸条，贴在“八卦”的耳内侧，拍拍它的头，手指向保干家，跟它讲：“‘八卦’，你去阿妈家”。它就乖乖地跑去。保干群众家小孩子看到“八卦”来，就争先恐后去拿它耳边的信。同样的，保干群众有什么交代，也写了字条贴在它的耳边，跟它说：“‘八卦’，你回去阿姐那边。”它也乖乖地、高兴地、摇着尾巴回到我的身边。这样，“八卦”就成了我与保干群众的“联络员”。

有时去隔坡许月珠的“兰高”时，我也把“八卦”带去。它会在前面引路，遇到有人时会吠几声，又迅速返回，用它的咀碰着我的脚表达“情况”。若是到同志的“兰高”，见到自己的同志，它不但不会吠，还会望着你，跟你摇尾巴。若是出去工作，我会叫群众把自行车放在某一处，“八卦”会跟我割芭到放自行车处。当它看到自行车，我自个去别处工作，叫它回去，它听话，乖乖地回到那间“小屋”。

后来刘家保干被人出卖而被捕，他的母亲（我称她“阿妈”）搬到百花河板厂住，“八卦”也带去了。半年后，我去板厂探望阿妈，“八卦”看到我来，就像看到久别的妈妈一样，高兴地又跳又叫。我也喜悦地抱住它，轻轻地摸它的头。在返回的路上，它跟着我走，我叫它回去，打它都不回。拿它没办法，我只好走回头，把它带回交给阿妈她们，把它关住了，我才能返回。

不久后，听说“八卦”病死了。想到3年来，在困难的时后，它无时无刻不紧随在我的身边，帮我驱赶了孤寂，给我带来欢乐愉快，还帮我做事，想着想着，我心里不禁一阵心酸，眼眶里转动的是晶莹的泪水！

到了下游第4军分区进行武装自卫时，我就结束了6、7年的一个人在地下坚持“非法”战斗的生活，从此就转入武装战斗的集体生活了。

## 加帛访友忆当年

罗丁

### 数十年后重返加帛

今年 3 月 30 日，在参加了上午的为烈士们扫墓献花之后，跟来自古晋的泽珠、美里的连贵、石山的松美、珠英、瑞泰、诗巫的新水、静珠、绍其及民都鲁的炳河、淑贞、先明友等，一共 12 位，乘坐午后的快艇上加帛拜访老朋友。新水太太静珠友在 50 年前来过加帛；淑贞和泽珠也在四十多年前来过，就住在加帛的福南小学，那时还到对面江的 Seranau 瀑布游玩过。松美和珠英、先明友等在当年也都多次在加帛进行过工作，40 年前连贵还在加帛开过修理和卖收音机、手表店呢！

时速约 80 公里的高速快艇在砂拉越也是马来西亚最长的汹涌的拉让江水中前进，两岸不断映入大家眼帘和勾起回忆的热烈故事一箩箩，其中有的是“二姐”淑贞在当年下乡到广东芭工作的情景，还有绍其和先明也……指出当年活动的地点和经过。先明说当年从加帛对面江的 SG. Go 一带，划船下来到桑要 2 个晚上，桑再下来加拿逸联合国也要 2 个晚上，如到 Sibu 要 5 个晚上。现在，逆水而上三个半小时都够了。

### 喜逢老友

下午 5 点 10 分快艇终于停到大家盼望已久的山城—加帛的码头了。这里要感谢加帛老朋友江绍桂夫妇、谢爱文、江绍文友等到码头接应，及朱兄夫妇和郑世增友等的款待，与第二天带去参观加帛 Sirirek、Betik、拉让江边及加帛山顶等。没有绍桂夫妇及许多老朋友的帮忙，我们是无法在那么短时间内见到许多三、四十年前的老朋友的。当晚大家齐聚在餐厅内畅诉别后情，尤其是连贵更是喜逢旧雨讲个不停。

### 加帛的贡献和忧虑

第二早(31/03/2003) 6 点大家都起来了, 在薄雾晨曦中, 走到江边去看那从两、三百公里远的砂、印边界, 分别以 Baleh 和 Balui 两大支流汇集在加帛的壮丽景色。只见那满载木桐的大舢舨不时自大江上游由拖船拉下来, 也有空舢舨拉上去, 形成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见不到的一种特殊的水运形式。在砂拉越每年的一千多万立方公尺的伐木量之中, 约有由¼是从这里拖运下来的, 同时还有为数以百万立方公尺的数量向民都鲁 Tubau 方面运出去。据粗略估计多年来在加帛省出产的供出口连本地加工的原木价值贡献至少在马币 15 亿元以上, 为砂拉越各方面经济活动的持续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只可惜由於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控制, 这个天然资源将在可预见的未来 10 多年步趋式微。而从加拿逸连接桑市到加帛的整百公里公路的一再拖延, 也是一件憾事。在未来的岁月中加帛的经济发展将朝向何方? 是当地人都关心和忧虑的大事。

看了江畔, 转去著名的龟湖, 这是外地来客必到之处, 远看似一从加帛大山上下来的巨龟之头和前二足伸入大池之中。古老的龟湖, 近年来已美化为旅客游览之地和文化表演场所。

## 忆当年跳江潜水事

来到加帛不由得又回忆起了 31 年前, 1972 年尾在加帛码头发生的一件事。那时, 由江爱华(阿清副队长)、江先明(李红卫生员)、高夏远(伟红)、苦学、江国章(战平烈士)、东风、余清禄(8号)、黄月珍(红梅)、莫荣娣(立红)、江梅花(学英)、江秀娣(红英)等大部分新兵组成的上游工作队, 历经千山万水辛苦跋涉到加帛对面江, 住到伟红和苦学兄弟的父亲高木水伯屋子的后山, 并进行联系和发动群众工作, 木水伯还带回了来来饼店送给的糕饼等给同志们吃。由於到加帛市附近的 Betik 坡、Serirek 坡和

加帛市区内活动（化白，携带枪支）的暴露，而我们工作队却还不知晓得自己的活动已引起当局的注意。在 1972 年 12 月的一个晚上 7 点多时，阿清和 8 号 2 位在热心帮助我们的木水伯的护送下，从刘金码头下船，划到对面江的加帛码头，停在加帛船江金鸿老伯的永利航船后，并进到船内机器舱房，等候高伯伯上加帛市安排妥当才上岸。万没料到就在高伯伯离船上加帛市不到 10 分钟的时间内，数个警察野战部队兵士突然从黑暗之中出现在阿清和 8 号的面前，并高喊：“Angkat Tangan！Periksa Tengki！”（举手，检查登记）面对这骤然的变化，8 号赶紧回答：“Boleh, Saya ambil Tengki（好，我就拿登记）”，并将原先放在地板上的一个内中装着折散了的手提机枪提袋拿上来放在船旁横椅上，做势要开袋拿登记证。就在这时发现原先平举的敌人枪口稍为向下的动作时，8 号和阿清即刻跨上船窗和船尾，同时跳江潜水而去。在密集的机枪扫射下，他们不敢浮出水面游，只好潜在水下游动，这时长衣长裤被水拉着，只好在水底脱掉，手提袋内装着枪太重，游着拉不动，不得已，只好也让它沉掉了。而热心帮助我们的木水伯和船主金鸿伯之后也被逮捕了。

宁静的夜晚里骤然大作的枪声揪住了住点内的每一战士的心。经过一段难熬的时间后，终于见到阿清和 8 号两位先后安全地但却是狼狈地回到点内，真是又难过又好笑。

### 谢谢“两条鸡”

隔天，听到军机飞和增兵的讯息，我们随即进行了转移，来到了阿春家后山，并住了将近 2 个月时间。阿春的父亲宁叔在这情况紧张的时刻，仍然积极热情地给予了接待和帮助，使远离诗巫和加拿逸华区而孤军坚持在上游工作的这一小队同志们深为感动。时值春节，宁叔一次宰了两条鸡来给同志们改善伙食。一次送来两条鸡，这是许多战友在群众工作中少有遇过的特殊待遇，大家在高兴之余，就为宁叔取了一个不甚雅听但非常亲切的代号：“两条鸡”（那时，我们群众工作组为了工作

上的保密需要，常有为群众取“代号”或“化名”的作法)。我们还在宁叔的后山举行了春节小联欢，还有 4 位女同志的跳舞节目。事隔 31 年后的今天再来加帛找老朋友，其中一个主要对象就是要找宁叔，并向他致以最深的谢意！在绍桂、爱文友等的热心帮助下，终于找到了阿春。但非常遗憾的是，他的女儿阿春告诉我们，她父亲已於前几年逝世了！高兴的是看到阿春和她丈夫水保夫妇和睦、幸福，我们这些老同志也稍为宽些心。

### 可爱的山城加帛，我们怀念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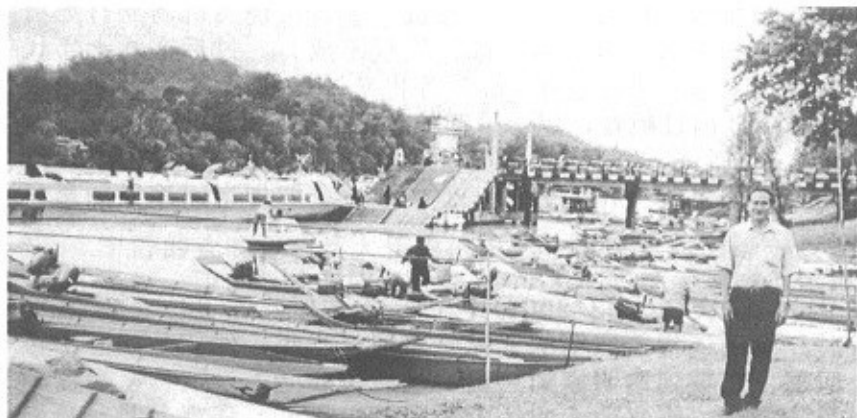
上游工作队於 1973 年春节后顺利返回 OMT 中心区进行了重组。此后，在 1973 年中等待、华英、伟红、8 号等又再重回加帛进行联系群众，并进行了一次烧飞机场兼打地雷埋伏战的活动（引不到兵来，埋伏不成）。过后在八十年代重上砂印边区建基地时，8 号等也来过加帛 Serirek 后山联系群众，搞过粮食。但，说起拉让江上游，加帛地区，最早有武装来进行活动的，应是吴松美（三明）、阿清、取明等 OMT 武工队的民族工作先锋队，他们多次去四省来回途经加帛联系群众，搞粮食等。

这次(30/03/2003)下午 5 点快艇驶过 SG. Lam 江面时，三民还指着取明的老家一带回忆当年，他们从四省工作回来，直插到取明家的后面。当时取明同志看到自家后面的果子树时，高兴地大叫：“是罗（口旁），那就是我家后面果子树！到家啦！”

加帛，虽然是一个小镇，附近的华区也很少，而且是零星地点缀在长屋和“郎高”（临时小屋子）之间，有的华人还和当地土著通婚。但他们都很好心、热情帮助同志，保护我们队伍，木水伯、金鸿伯还为之坐了牢。没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同志的上述种种活动就可能无法进行，或更困难进行。我们这些受过他们（名字无法一一道出，也无法一一去拜访他们，我们只是备了多份礼品来送给他们）先后无私

帮助的老战友们，一想起那日里的点点滴滴军民情谊就心里发热，我们感激他们！祝他们及他们的后代们都健康、幸福！

31/03/2003 上午又拜会了数位老朋友，江先华等 4 位老朋友也入了咱友谊协会，并在绍桂，世增友的带领下车游览多处地方和留了影。午饭后，大家依依不舍地和到加帛码头来送行的老朋友们道别。汽笛声声鸣叫，快艇即将返航，啊！我们心中的可爱山城加帛，我们怀念你；我们许多可敬爱的乡亲们、老朋友们！我们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上游工作隊的“8號”重游加帛時，留影於當年跳水潛游的老碼頭舊址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tropical beach scene. In the foreground, several palm trees are silhouetted against a bright, cloudy sky. The central palm tree is the tallest and most prominent. To the left, a thatched-roof hut is visible on the beach. The overall mood is serene and tropical.

转载

## 华族是印尼民族的组成部分

在华裔总会“华族在民族和国家建设中的使命和义务”

讨论会上的发言（2002年4月27日）

Benny G. Setiono（许天堂）（印尼华裔总会主席）

### 印尼华族的政治作用

远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印尼之前，华人很早就已经从中国来到努山打拉群岛。1293年，元朝（1280-1367）忽必烈派兵攻打对抗他的爪哇辛俄沙利王朝的国王卡达尼加拉。当时，爪哇岛北部沿海岸已经有许多华人居住区。这些华人来自中国福建，大多数是商人，农夫和手工艺者，与当地原住民和平相处。当元军中了威查雅王子设下的诡计而被击败后，他们因为害怕回国后受到惩罚，也害怕回程中航海的艰苦和遇上海盗，便留下来在北海岸居住，与当地妇女通婚。他们向当地人传授了多种工艺技能，如制造砖瓦，陶器，造船，火药和大型炮台的技术。

到了十五世纪明朝（1368-1643）时代，从中国南部云南，有更多的华人迁徙到爪哇岛来传播伊斯兰教。在1410年和1416年，明成祖派遣特使郑和（俗称三保公）率领舰队，登陆西蒙岸。他晋见满者伯夷国王，并传播了伊斯兰教。除了郑和，在爪哇沿海地区，散播伊斯兰教的九大圣人（Walisongo）大部分都是华人，苏南·波朗（温安）、苏南·加里查雅（严世章）苏南·安本尔（温瑞和）、苏南·古农查蒂（杜亚波）等长老，据说是来自占婆（越南），马尼拉和中国；他们建立了德麦的第一个伊斯兰王朝。巴达王子即仁文，德麦伊斯兰王朝的第一个国王也是华人（满者伯夷王朝的伯拉威查雅五世）。他娶了华族商人万芳的女儿为妻。

1596年6月23日，哥呢利斯·霍曼率领荷兰舰队在万丹码头停泊，他惊奇地看到这里的原住民官吏和华人有融洽的关系。荷兰人和后来的英国人也看到，除了在万丹，华人已定居在东南亚一些港口：淮安、巴达尼、金边和马尼拉。1642年在淮安有四五千名华人，而1600年万丹有华人三千名。

1611年东印度贸易公司总督彼德波夫派遣彼得逊昆收购土产，主要是万丹的胡椒，但他必须通过万丹苏丹的亲信萧明公。萧明公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华族商人，他的胡椒园相当大，万丹苏丹和农民非常尊重和信任他。葡萄牙人、英国人和荷兰人要购买万丹的胡椒，都要和他商洽。逊昆想到利用萧明公，但不成功，因为萧明公发觉逊昆欺人太甚。万丹苏丹对明公和华人是很满意的，这些华人传授了许多新的农业技术，如梯田、田埂、耕犁、灌溉，这些耕种方式使收成更好。

1619年，逊昆夺取查雅加达城并计划建设巴达维亚城。他成功地说服萧明公动员万丹华人迁移到巴达维亚城。逊昆授予萧明公为第一位华人甲必丹官衔，由他来管辖和领导巴达维亚华人，后来也把运载中国商品的船队驶向巴达维亚城卸货。在萧明公和华人的协助下，巴达维亚建设成一个热闹的港口，成为东南亚重要的商业中心。这里记载的是由于傅明严的提议和设计，在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资金支持下，成功地建造了Molenvliet区（今伽渣玛达街和哈炎乌禄街）的一条运河。这条运河后来衔接了芝利翁河，成为Noordwijk区（尤安达街）和Rijswijk区（退伍军人街）的分水道。运河消除了经常使巴达维亚城水患的危害。

当时，许多居住在巴达维亚城外的华人，开始种植甘蔗园和兴建糖厂，用甘蔗榨取蔗汁制糖，当时制糖的方式是很简单的。后来由于缺乏灶头燃料，1815年开始，制糖厂搬迁到中爪，东爪。

1740年，巴达维亚发生了对华人的屠杀。东印度贸易公司总督安得利安华格尼尔，下令士兵惨无人道地枪杀了一万多名华人。这就是“红溪惨案”。惨案后，华人联合爪哇人反抗中爪哇荷兰军队（1740-1743）。如果没有马打兰王朝苏南巴古布沃诺二世的背叛和马都拉的阿迪巴第查格拉宁腊王子援助荷军，被包围在三宝壟，处在劣势的荷兰军队很可能就会被驱逐出中爪哇，甚至整个爪哇岛。

1810年11月，发生龙卡王子的抗荷起义。他是哈孟古布沃诺二世的女婿。他在东爪哇与华人社会有密切的关系。他宣布自己是所有受荷印政府欺压的爪哇人和华人的“保护人”。他敦促华人联合起来，驱逐给爪哇社会带来苦难和危害的荷兰官吏；呼吁华人接管已经逃离的荷兰政府机关和岗站，防御敌人的反扑。这个起义获得许多华人的支持，当拉登龙卡军队在梭罗河畔的舍加兰被围剿战役中，被杀死的一百多名士兵中有十二名是华人。

1813年9月18日，华商陈仁生甲必丹，被委任日惹县长。这是苏罗约王子哈孟古布沃诺三世为了表彰陈仁生协助他夺回王位，授予“拉登杜孟公斯哥地安腊”衔位，并赠送了巴格冷和日惹地区占十四个村面积的土地，这十四个村民大约有1000名。爪哇战争（1825-1830）时期，他积极以金钱支持迪波尼哥罗王子进行游击战争，反抗荷兰军队。他把自己心爱的座骑送给王子。当时，有许多侨生华人协助迪波尼哥罗王子的军队，共同战斗，供应他们需要的铜钱、武器、鸦片等等。不少侨生华人参加战斗，肩并肩反抗荷兰人。

1827-1828年间，在中爪北岸的拉森地区，杜孟公沙士拉地拉卡王子（迪波尼哥罗王子的妻舅）发动的战斗里，许多在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几代的侨生华人，积极参加沙士拉地拉卡军队。伊斯兰华人支持在北部沿海地区根邦、拉森

和新埠头队被荷兰人打败以后，那些华人遭到荷军的残暴屠杀。

1772年，在西婆罗洲（西加里曼丹），罗芳伯和百多族人组织了“罗芳公司”。这些华人是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人。1760年代他们来到西婆罗洲开采金矿，三发苏丹却把他们当作开采金矿的矿工，残酷对待他们，引发了反抗。经过这个事件，苏丹改善了方式，把部分金矿开采权用租赁方式交给华人矿工开采。“罗芳公司”是一个开矿营利的根据地缘的民主会社组织，它有一整套管理行政机制，有法庭、监狱和武装军警，人们常把“罗芳公司”说成是一个国家。

1816，荷兰重新从英国手中取得了它在东印度的殖民地，想方设法夺回婆罗洲。荷印政府对华人经营的金矿非常有兴趣，荷兰人付了五万荷盾收买三发苏丹，取得他的同意，荷兰派遣军队企图夺取华人金矿，遭到华人武装反抗。华人对付荷军的策略是切断供水，在井水和河水中撒下毒药，不少荷军中毒死亡。华军也切断荷军的粮食供应，最后，荷军遭挫撤退。荷军撤退也因为要集中兵力对付1826年开始的爪哇战争。到了1854年，荷兰人控制了海上交通，成功地打败了罗芳公司的军队，罗芳公司被解散。

以上历史记载证明，当时华族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移居来努山打拉群岛的华人，并没有殖民和控制这片土地的企图。甚至像郑和率领强大的舰队，武器装备优良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欧洲人舰队，但郑和只是进行亲善访问、进行贸易、文化交流、传播伊斯兰教，向保护区收取贡品。华人和平的生活与当地居民融合在一起，他们大多数都是单身的，后来与当地原住民妇女通婚，他们的后裔称为侨生华人（巴巴）。他们的文化传统技能，在当地融化过程中产生了独特的侨生文化或巴巴文化。他们也使用当地语言或方言交流。

除此之外，华人也带来了种植技术，对当地农业生产作了巨大的贡献。1750年首次使用二三头牛拉动的碾米器，使碾米提高到每天五百吨，过去的舂米方法每天只有一百吨。他们也带来脚踏灌水方式，榨椰汁、犁耕、制盐技术等等。华人教导原住民懂得缝纫。针制品的衣裳首次也来自中国。华人也介绍种植花生豆、青豆、黄豆、西瓜和染色的蓝靛叶的方法。1611年华人带来使用大米发酵的酿酒方法。从绿豆和黄豆制作豆芽菜，豆腐，豆瓣酱和酱油。

荷印政府后来实行隔离政策，强制华人居住在指定的地区（居留法令 - *wijkensteisel*），将华人和当地居民隔离开来。华人要离开居留区必须拥有通行证（通行证法 - *passenstel sel*），违反者就被控上法院（*politie roll* - 没有辩护权的法庭）。为了便于分辨华人，禁止华人使用土著或欧式的服饰。荷印政府最突出的隔离政策，是将荷印居民分三个等级，第一是欧洲人包括欧印混血儿；第二是东亚人包括华人、阿拉伯人、和其他亚洲人；第三是土著居民。这个 1854 年条例规定这三个等级的居民必须遵守不同的法典。但是，在商业上华人必须遵守荷兰商业法。而在刑事法上，华人的地位却和土著相同，审查刑事案的是地方法院（*landraad* 或 *politie roll*）。

1900年3月17日，在巴达维亚城成立了傅竞克领导的中华会馆。这个侨生华人组织的宗旨，是发展中华文化、孔教和教育事业，目的要取缔当时流行的赌博习惯和办丧喜事时的铺张浪费。一年后（1901年）中华会馆在巴城开办华校。许久以来，荷印政府从来都不重视华人子弟的教育，中华会馆开办的华校是倾向中国大陆的，它很受到华人的欢迎，在短期内其他城市也办起华校。荷印政府担心华校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也开设了为华人子弟就读的荷文学校（HCS, Mulo, Kweekshool 等）。荷印政府成功地把华人分化成亲中国派（新报）和亲荷兰派（中华会）二个派别。

中华会馆的成立，推动了侨生华人祖辈的民族主义精神，也影响了土著阶层。中华会馆作为荷印时期的新型组织的成就，推动了至善社、伊斯兰商业联盟（后来改为伊斯兰联盟）、穆哈末地亚和其他团体的建立。

荷印殖民政府看到这个不利的局势后，加紧执行隔离政策，不仅隔离侨生华人与土著居民的关系，也隔离侨生华人与新客华人。1910年荷印政策颁布 WNO 条例，宣布出生在荷印的华人是荷印属土公民，不是荷兰王国公民。

十九世纪末期，侨生华人已经积极创办印务馆，出版华人马来语或巴达威马来语的故事书籍。他们也出版了各式各样许多报章，这个时期称为华人马来文学和华人马来报章诞生的时期。这个华人马来文学的出现，是比 1918 年成立的 Balai Pustaka 社（出版旧式文学的出版社）更早。像《新报》和《竞报》这类华人马来报章周刊之类的媒介，进展得很迅速，也维持了好几十年。

1928 年 10 月 28 日，以“一个民族一个语言和一个祖国——印度尼西亚”为决心的青年誓言，第一次高唱《大印度尼西亚》歌曲。在这个青年誓言的仪式里，有几位华族青年人参加，这证明了在民族独立运动初期，有一群华族已经参与和关心印尼民族的命运。

为了感谢华人马来报章经常刊载独立运动领袖的文章，以及尊重和争取华族的支持，1928 年独立运动领袖们同意从此开始，他们只用“中华”这个字眼来代替“支那”以称呼华人。

1932 年，正当华人社会分裂成倾向中国和倾向荷印政府两大政治派别的时刻，在泗水成立了由林坤贤领导的印尼中华党，它的观点和使命是争取印尼独立，脱离荷兰殖民统治。

这再一次证明，在华族社会已经产生高度的民族主义政治觉悟，它与印尼民族其他组成部分共同争取从荷兰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

日本占领时代初期，苏加诺和哈达这些领袖向日本占领军妥协，而一部分华族积极进行反日地下活动，有大本营在玛琅的秘密组织“中央海外挺进队”。这个组织由叶甫金领导，有 8000 名成员，其中有 400 名印尼人，散布在爪哇岛和马都拉岛。它有两个电台，与在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联络，进行了多次成功的破坏活动，其中破坏火车车轨、切断机场的电话线网。搜集情报，把情报提供给重庆的国民政府。后来，这个秘密组织被日本情报机关破获，没收了二台通讯设备。叶甫金成功逃脱，这个秘密组织成员是新客华人。也有许多侨生华人反抗日本的地下活动，在日本占领初期，他们和荷兰人并肩抗日本统治。在泗水有哥林医生和黄中一组织的地下活动。在茂物和巴城有费尔逆(Wernick)、蔡德发、李明玉的组织。它的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向在澳洲的同盟军总部报告，它搜集日军活动、岗哨、运输、集中营俘虏、舰只活动等等，也筹备和输送武器、电台零件、发射台和提供通行证。在巴城的总部设在明士库，在茂物总部设在彭士库。由于缺乏经验，1942 年底被日本谍报部侦破，李明玉和蔡德发被捕，他两人受到严刑拷打，蔡德发后来在安卒被斩首处死。

1945 年，林群贤、黄添水、黄长孝、陈英华、叶全明五名华人参与起草共和国宪法。他们是独立筹备工作调查机构(BPUPKI)成员，其中叶全明成为独立筹备委员会(PPKI)成员。

在反抗荷兰殖民者企图重新占领我国的保卫独立武装斗争时期，不能忘记华族的作用。他们输送粮食，从新加坡私运武器供给游击队。

1945年11月，反抗英军的泗水战役，华族青年起着不小的作用。雅加达《红白报》记者曾在梭罗城讲述他在泗水战役的经历，说有一位华族领袖在泗水电台演说中痛诉英军对付泗水人民的暴行，这个演说内容是要告诉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重庆电台在响应广播时呼吁华族青年与印尼人民并肩作战，反抗英军的暴行。华族青年男女受到重庆电台的宣传鼓舞，组织了自卫队，他们抢夺武器、奔上前线，反抗英军侵略。在这个战役中，遭到英军炮轰伤亡的有上千名华族。

苏加诺在1945年11月12日，讲述泗水战役时说：“几百名华族和阿拉伯族遭到枪杀和重伤，在印尼方面的牺牲更大。我强烈抗议使用现代武器来对付没有抵抗能力的城市居民。”

应该记载的是，在保卫独立的政治斗争中华族的贡献。在夏立尔第二内阁中，陈宝源法学士被委任为华人事务国务部长。在阿米尔·夏立夫丁组织的内阁中，萧玉灿被委任为代表华族的国务部长，民族党的王永利博士被委任为财政部副部长。在莱费尔战舰举行的谈判中，蔡锡胤博士成为印尼代表团成员。在海牙圆桌会议，哈达博士委任沈基爱博士为印尼代表团顾问兼成员。

1950年2月15日圆桌会议后，印尼联邦共和国（RIS）议会有六位议员是华人，萧玉灿和叶全明硕士代表共和国政府，陈金陵法学士代表印尼国，陈文安工学士和蔡士伟法学士代表东爪哇国，钟凌生代表西加里曼丹国。

在议会民主制时期（1950-1959），有8位华族成为临时议会议员。他们是，萧玉灿，陈文安，陈宝源，陈金陵，蔡士伟，钟凌生（1954年8月由张康顺代替），钟丁雁和叶全明（1954年8月由温金杜代替）。

在阿里沙士特罗亚米佐约第一届内阁，黄英地博士被委任为财政部长，李捷登被委任为卫生部长。1955年大选后国会华族议员有，黄贞贤（玛苏米党），陈温洪和陈金龙（伊联），钟丁炎（天主教党），李博如（民族党），赵迪俊（共产党）和洪江烈（国协）。在制宪会被选为议员的是，萧玉灿、黄自达、叶添兴、吴建传、林坤贤、黄博江等等（以上是国协代表），温多尼（民族党），黄海俊和陈艮如（共产党）。

在有领导的民主时期（1959-1965），萧玉灿被委任为代表专业人士的互助合作国会议员。后来在第四届工作内阁二项命令内阁和改组的二项命令内阁，黄自达被委任为总统助国务部长，大卫·陈义被委位为改组的二项命令内阁工程和结构部襄长。

1950年建立了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尼的华族选择了印尼籍或中国籍。选择印尼籍大多数是侨生华人。选择中国籍的是新客华人。但是在新客华人中也分成亲新中国派和亲台湾派，亲台湾派选择无国籍。这种分裂派别也反映在媒体上，即亲新中国的是华人版的《新报》和《生活报》，在印尼移交政权初期的创刊期，它们是支持印尼共和国的。而亲台湾的《天声日报》是荷兰时期由在印尼的国民党人出版的。后来台湾支持“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PRRI）和“共同誓约”（Permesta）叛乱，在印尼的国民党被禁止活动，亲台湾华校被关闭。

在议会民主时期（1950-1959）和有领导民主时期（1959-1965），国籍协商会（1954年成立）的政治作用是不可抹煞的。它是代表华族的最大团体，它争取华族正当权益和地位，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国协积极协助自愿选择印尼籍的华人，也开办学堂、大学，为需要教育的华人子

弟，特别是政府条例必须为离开华校的华人子弟提供就学机会。

在解决“华人问题”上，萧玉灿、吴建传、黄自达领导的国籍协商会支持民族建设(Nation Buiding)和主张结合(Integrasi)理念。这个理念主张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不追究种族来源的公民平等权利和义务，让华族完整地结合在印尼民族的母体里。结合理念赞成印尼民族的多元化，这是符合印尼民族独立先驱们提倡的“殊途同归”口号。印尼民族是由各种不同的族群、人种和各自不同的宗教、文化组成的，它认为只有在实现了没有人剥削人、没有多数派压迫少数派的社会，才会出现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

国协在冷战时代的发展过程，使它面临各种力量争夺的困境。主张结合理念的国协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站在执行政治宣言和纳沙贡团结政策的苏加诺总统这一边。由于支持苏加诺总统的政策，国协自然而然地站在当时“革命力量”阵线，和民族党、共产党、印尼党、贝蒂党、天主教党、伊联、伊盟党等等，一道为争取实现没有人剥削人的印尼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政党，尤其是印尼共产党一贯支持国协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不论在国会或其它论坛，舆论界或者在政治事件中。印共谴责万隆和西瓜哇其它城市发生的1963年5月10日种族主义事件。这些现实使得许多华人、特别是国协的会员和支持者同情共产党、印尼党和它们属下的群众团体，并且加入这些团体。九三〇运动事件发生后，像其他政治团体和政党一样，国协遭受苏哈多军事集团残酷镇压。

那些过去在中华会、受荷兰教育的侨生华人，不同意国协的结合理念，他们主张全面同化论。1963年3月24日，他们在雅加达发表同化声明，认为少数种族问题只能积极进行一切领域的同化途径，才能得到解决。声明的签署者是十位知名的侨生华人，其中有一些是国协的创办人，但在1955年退

出。这些签署人是钟丁炎律师、伊惹明发、罗祥贤硕士、王福涵、刘全道和欧阳炳坤。1961年1月13至15日，在中爪万东安（安巴拉瓦）举行了民族觉醒讨论会，会后发布了《同化宣言》。这个宣言签署人有30名，其中有王福涵、刘全道、郭华源（郭建义父亲）。

为了实现全面同化理念，抵制国协的影响，全面同化论者在1963年成立了民族统一辅导结构（LPKB），主席是王宗海法学士、海军中校。他们得到陆军领导和政治人物的大力支持，像哈梭诺中校、伊斯玛·韩巴利上尉、苏那利约法律教授、拉弟约斯·伯拉威罗硕士、佛兰舍达硕士、罗斯兰·阿都卡尼、哈里詹、惹哥·苏卡尔诺等等。民族统一辅导机构的纲领之一是在一切生活领域实行全面同化，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通婚）五个领域。九三〇事件发生后，在新秩序政权颁布了各种旨在禁止华人文化、传统习惯、宗教和文化的措施和条例，这个机构扮演重要的角色。

新秩序执政32年间，把华族从政治领域隔离起来，对所有怀疑参与九三〇运动和印共的人，包括国协和其它华人团体的会员和支持者，进行了逮捕、迫害和屠杀，给华人社会造成一段很深的创伤。国籍协商会成为恫吓华族远离政治领域的借口，用“支那”字眼来代替“中华”称呼华人，禁止华人公开举行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仪式，禁止使用华语和华文印刷品，改名换姓。这一系列旨在摧毁华族自尊心措施后，只让华人在商业领域活动。

当时是有一小撮华人在政治上活动，他们只是团体的财政或筹款人而已。有几位华人积极参与推翻苏加诺总统的政治行动，像林绵基、林绵昆二兄弟、哈里詹、苏福义。但不久苏福义对苏哈多专政权非常失望，他成为反对派，年轻的苏福义后来在一次登山运动事故中身亡。林绵基、林绵昆、哈里詹参与和主持“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这个机构是新秩

序政权建立后二十年内，在阿里·穆多波和苏惹诺·胡玛达尼领导下，对秩序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林绵昆转从商，成为富豪，是由华人富豪参加的“誓愿效忠基金会”的发言人。苏哈多总统下台前，郭建义突然离开这个基金会，参加民主党。后来民主党发生纠纷，他支持受到统治者抵制的梅加瓦蒂。

## 排华的暴力事件和种族歧视政策

根据历史记载，在荷兰人来到努山打拉群岛“东印度贸易公司(VOC)”和荷印殖民统治前的几百年，华人已经居住在努山打拉群岛，主要是爪哇岛北部海岸和苏门答腊南部海岸几个地区，他们和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和平相处了好几代。荷兰殖民者为了它的商业利益，制定了种种条例，实行分化华人与土著居民的隔离政策。

在努山打拉群岛发生的第一次排华罪恶事件，是1740年巴达维亚市（现在的雅加达）VOC军队对华人的杀戮。荷兰军队肆无忌惮地屠杀一万多名华人，猖狂地焚烧华人房子百余间，被杀害的华人尸体抛进红溪河，鲜血染红了河水。第二次排华的事件是查格拉宁勒四世的军队，对居住在爪哇中部与东部北海岸线的厨闽、新埠头到泗水的华人进行的屠杀，当时华族和爪哇族联合起来进行反抗VOC的战争。接着的排华事件是在爪哇战争初期，1825年9月23日在雅威，中爪和东爪接壤的一个小镇，苏丹哈孟古布沃诺一世之女——尤达古苏玛公主率领的骑兵对华人的屠杀，被杀害的华人有几十名。在整个中爪哇和梭罗河一带，对华人的屠杀是反复进行的，当时受叛乱的军队包围的华人，陷于孤立无助的状况。

爪哇战争结束以后，荷印殖民政府军牢牢地控制了除亚齐以外的整个爪哇岛和其它地区。荷兰殖民者残酷镇压一切敢于反抗荷印统治的武装叛乱。爪哇各地小王朝归顺殖民政府的统治。荷兰殖民者全力以赴地执行“强迫种植”（

Coltuurstelse), 窃取了大量财富。由于需要大批勤奋、有技能的廉价劳动力, 几十年来荷兰殖民者从中国南部省份把几十万华工运送到苏门答腊北部当园丘工人(多数是福建人)和到邦加勿里洞当锡矿工人(多数是客家人)。

此外, 由于不堪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和战争灾难, 许多华人也背井离乡, 迁移到努山打拉群岛寻找新的生活。这种成千上万华人迁徙浪潮, 在第二次大战前夕才停止。他们的后裔就是现在所谓的新客华人。尽管他们出生在印尼, 但由于他们生活在自己族群的圈子, 与当地居民社会隔离。他们保留了浓厚的华人传统,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华语或家乡方言。由于语言交流的障碍, 他们比较难于与外围的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苏门答腊北部、占碑、廖属、邦加、勿里洞和加里曼丹西部, 大多数属于这个“新客”华人社会。

尽管华人商人会与原住民、阿拉伯商人发生小规模的摩擦, 但几十年来都不会酿成突出的排华冲突事件。直到1918年10月31日, 库突士的华人住宅和商店遭到从玛涌、芝巴拉、巴帝及附近地区来的上千名伊斯兰联盟成员的攻击, 有16名华人和骚乱者死亡, 上百人受伤。

第尔多亚地·苏尔约倡立的伊斯兰商业联盟, 原本不是针对伊斯兰商人主要竞争对象的华商。伊商联盟后来改名为伊斯兰联盟, 迅速发展成为有50万成员的组织, 是当时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激进组织。为了转移目标, 荷印殖民政府进行离间阿拉伯伊斯兰商人与他们商业对手的华商的策略, 加剧他们之间的冲突。在土著事务局的策谋献计下, 荷印殖民者煽风点火, 结果, 从事染印花裙布业和丁香烟业的阿拉伯商人和华商的磨擦冲突酿成“库突士骚乱事件”。

当日本占领军在爪哇岛登陆, 荷兰军队毫无抵抗地从城市撤退。撤离前, 荷军撞开那些主人逃难离去的店铺, 把

里面的商品抢劫一空。抢劫行为怂恿了贫苦的民众，也跟着抢劫早已逃离的华人住宅和商店。损失最惨重的是中爪哇和东爪哇的华人，几百间华人的工厂被荷军摧毁破坏。

最重要的排华事件是发生在荷兰军事行动前后。1946年5月，在当格朗和附近的华人，有635人被杀害，其中有136人是妇女和儿童，1268间华人住宅被焚烧殆尽，236间被破坏，约二万五千名华人逃难到雅加达市。在苏岛巴眼亚比、西瓜古宁岸、玛惹冷卡、英德拉玛雅、中爪北加浪岸、直葛、普禾洛多、布巴宁卡、波伯沙里、东爪孔望、南海漳、任抹、玛琅、拉旺、巴厘西雅沙里等等，数百名华人残遭屠杀，数千所华人住房和财产受掠夺和焚烧。事实上，这些暴力事件是荷印民政管理署(Nica)荷军挑拨离间的。它的险恶目的是要破坏年轻的共和国的国际声誉，而部分无知的民众跌入了这个恶毒的陷阱。遭受到屠杀、攻击、抢劫的极少部分华人组织了“保安队”，一个自卫和保卫治安的组织。有一小撮队员由于亲友被杀害而激起了仇恨，又被荷兰人唆使、利诱而武装起来对付共和国的民军。这是一个几十年来被部分集团一直用来中伤和丑化华人的借口，用来诬陷整体华族是反动的、亲Nica和反对共和国的。

从印尼联邦共和国，直到荷兰移交政权和建立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实行民主议会制以来，政府内部的个别集团执行种族主义措施。尤安达繁荣部长提议的“堡垒纲领”政策提供进口特权给原住民，那些所谓的“人口商”的原住民靠着特殊关系获得进口准字。但是由于没有资金和经商能力，把进口准字特权售给华商，在当时，这种合作称为“阿里巴巴”。

在阿利第一届内阁中有二名华人部长，但仍然不能避免带有种族主义政府措施。政府以保证大米供应和稳定米价为理由，规定禁止私人的碾米业，一切碾米活动交由政府经营。实际上当时98%的碾米厂是华人所有的，这个措施使碾米厂瘫

疾，出现军人保护的非法碾米活动。

在阿利第二届内阁出现“阿沙阿特(Assaat)运动”。这个运动要求对原住民商人给予照顾和特权。阿沙阿特法学士是亲玛苏米党的国会议员，他要求政府颁布条例，禁止华人不论是公民还是外侨在特定的经商领域活动。他公开说，他准备执行排华纲领；他说华人不可靠，不可以让华人控制印尼经济。他攻击华人对国家不效忠，而阿拉伯人和华人不同，他们属于原住民。

1959年11月苏加诺总统突然签署了“政府第十号条例”。这个条例禁止外侨（主要针对华人）在省级和县级首府以外的地区经营零售商业活动。条例规定在1960年元旦生效。这个充满种族歧视的条例当然惊动和震撼了整个印尼华人社会。当时1958年国籍法令还没有执行，造成分不清谁是公民谁是外侨的混乱。地方军事掌权者任意的驱逐不仅是外侨的华人，也驱赶根据1946年国籍法令是公民的华人。这个第十号政府条例是尤安达内阁商业部长条例的继续，当时商业部长在1959年5月的条例中规定禁止外侨在内地的经商和居留。第十号政府条例损害了印中两国政府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派遣船只接回要离开印尼回国的华人。当时的印尼政府掉进了西方国家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陷阱。

1963年5月10日在万隆市发生了排华暴力事件。这个骚乱事件起因是华族大学生和土著大学生由于交通小事故，引起在校园打架。后来工程学院和巴渣渣兰大学的大学生首先发难，引发了对万隆几百间华人商店、住宅和车辆的破坏、烧毁和抢劫事件。接着事件扩大到西瓜哇的其他城市，打横、牙律、展玉、苏加巫眉等等。很可悲的是，叶全明，一位共和国独立的先驱者，也成为受害者。他因此非常失望，后来以要携带儿子治病为理由移居美国。

1967年印尼军队以“剿灭砂拉越人民游击队”为理由，挑拨西加的达雅族。结果，居住在西加穷乡僻壤的华人惨遭屠杀和残暴，数万名华人难民逃亡到山口洋和坤甸，一部分后来迁移到椰加达和爪哇各个城市。

在新秩序时期，苏哈多集团在不受丝毫非议和反抗的情况下，颁布了一系列歧视华人的条例。为了监视华人的活动，在国家谍报局机构内部成立了“华人事务统筹机构”（BKMC）。正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的犹太人一样，在印尼的华人完全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成为二等公民，他们是一切民族灾难的替罪羔羊。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切条例竟是一群参与“民族统一辅导机构”（LPKB）中的华裔提倡和推动的。王宗海于1999年9月在《Gamma》刊物举办的讨论会上，毫无悔意地说：“华人在宗教、信仰、习俗的仪式的禁令是我提议的。”他还竟然说：“苏哈多准许华人在家里举行这种仪式算是慷慨的。”他主张全面禁止这种仪式。他承认在万隆1966年举行的第二次陆军讨论会上，当时要他来选那一种称呼华人，他选择“支那”（Cina）代替“中华”（Tionghoa）。

在新秩序时期，排华的暴力事件连续不断，从绵兰到锡江、在爪哇岛的暴力事件不仅在“量”方面不断增加，在“质”方面也逐渐深化。它的顶峰是1998年5月13日、14日发生在雅加达的惨案。

尽管新秩序政府实行反华排华的政策，但是在产业经济领域，它给予华人发挥很大的作用。一小撮华人成为统治者贪污盗窃、积蓄财富的帮凶，他们成为与统治者共同掠夺国家财富的罪恶大财阀。这也成为丑化华人的借口，似乎整体华族都是没有道德的“经济动物”。

就这样，许久以来丑化和中伤华人的三个借口：一是“

保安队”，二是“国籍协商会是共产党”，三是没有道德的“经济动物”。

除此以外，从历史来看，排华事件大部分发生在爪哇岛。而在爪哇岛的华人比起爪哇岛外的华人是相当融入当地社会的。有一种说法，自从第波尼哥罗王朝时代，在爪哇社会流传有一种“迷信”说华人是带晦气的、不能接近的。据说第波尼哥罗在他的传记里叙述，他在班让地区俘虏了一名美丽的华妇，后来成为他的按摩女郎。这使他在 1826 年 10 月 15 日梭罗外的哥沃战役中失利。他也责怪妻舅莎斯拉地勒索在一次爪哇北岸的拉森的战役被挫败，因为他违反了禁令，与一名华妇发生性关系。第波尼哥罗的军队司令玩弄女人作乐，士兵沉迷抽鸦片，使军队在战争中被荷兰人打败，却归罪于华人带晦气。这种错误和种族主义的看法成为一种“迷信”。至今被某些人渲染，用来中伤华人。

自马打兰王朝以来，那些国王贵族不去做在老百姓眼里不讨好的差使，他们利用华人成为抽税承包人。抽税承包带来垂涎的利润，承包的华人变本加厉的压榨，使老百姓对华人反感。同样的，经营赌馆、妓院、制盐、鸦片馆也以高价承包给华人。这样一来，造成爪哇人从心理上对华人仇恨和反感。荷兰殖民者也以同样的办法把税收承包给华人。新秩序政府也同样利用华人继承了这种经营方式。

除了那些垄断特权，荷兰殖民者也进行了分离华人和当地居民的隔离政策。19 世纪中 20 世纪初，在强迫种植、施行居住法令和通行证法，促使华族商人和伊斯兰阿拉伯商人摩擦，引发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冲突。殖民时代的教育制度也特意把华人和原住民分隔开来，培植亲荷的华人组织（中华会）。

但是，排华政策的登峰造极是在新秩序政府时代。这表现在：1，苏哈多集团进行的破坏印中两国的友好外交关系，是符合美英政治利益的。2，通过诬蔑国籍协商会参与九三〇运动，剥夺华人的政治权利，执行一系列歧视华人的条例。3，让华人脱离政治领域。4，一小撮华人，成为他们贪污窃财的帮凶，在人民反抗之后，嫁祸于华人，华人成为替罪羔羊。

### “华人问题”的解决

我们从历史认识了“华人问题”的根源，那么就方便寻找解决的办法。解决“华人问题”应当基于国家和民族进步这个愿望出发，团结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而不要有任何猜疑心。

历史证明，华族是我们民族的组成部分。华族在这个土地上有着近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美洲、澳洲民族比较，它们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对印尼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了重大的贡献，从语言、艺术、文学、饮食文化等等，中华文化充实了印尼文化宝库。所以，我们印尼民族应当毫无保留地接受华族为整个民族的组成部分。

一方面，整个华人社会应当毫无保留地融入印尼社会，成为印尼民族的组成部分，建设印尼的国家，即一个朝向平等、富强、民主，没有贪污腐败、尊重法治和人权的社会，这是印尼华族不可推卸的任务和职责。

另一方面，政府机构，不论是执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应当平等对待所有族群，包括华族，撤销有歧视性的法令和条例、撤销有关国籍证件的条例、解散国家谍报局“处理华人事务机构”。政府官员、政界精英、社会贤达，不要有种族猜疑心，更不要有侮辱华人的歧视性言论。不要像雅加达省长苏地约梭那样，在受到报界记者揭露后所说的话。他说：“为什么

我在本哲只有一百平方米的木屋别墅，你们就吵吵闹闹，而那些单眼皮的华人的别墅你们就不过问。”也不要像那位斗争民主党派系议员那样，当和改革派系（国民公义党）议员李宁彪（华人）争执时，破口辱骂华人。

华族不要只在经济领域活动，而要进入其它领域，学术界、法律界、媒体报业、军警执法人员、政治界……华族要走出束缚自己的小圈子。政治不是可怕的，也不能够逃避它，我们要去认识政治、了解政治。华族可以积极主动参政，参加自己选择的政党，或者与其它族群共同组织政党。华族不要再像过去新秩序时代那样，成为统治者的筹款人。

1998年5月惨案，确实让华族觉悟到过去在政治上是无可奈何的，而苏哈多下台后，土生华人组织了许多政党、社团。由于遇到许多障碍，过去组建时兴致勃勃的活力，现在显然衰退了。华社的政党、社团也和全国其它政党、社会组织一样，出现分裂现象。在1999年的竞选活动期间，政党都用舞龙舞狮争取华人的支持和选票，可以看出华人选票对政党多么重要，华人也像其他族群一样成为政党争夺的对象。

1999年9月16日，在改革浪潮推动下，哈庇庇总统指令政府官员取消使用“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称呼。2000年1月17日，瓦希德总统撤销了对华人宗教、信仰和习俗的限制。后来宗教部长也规定了阳历春节为选择性假日，也废除了使用中文的禁令。尽管有人不喜欢瓦希德，但是他证明了自己是宽容多元化的民主人士，他一直保护在新秩序政权下政治上处在边缘和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群。

2002年2月17日，梅加瓦蒂总统在孔教信徒庆祝春节仪式上宣布了从2003年开始把春节定为公假日，不再是选择性假日。梅加瓦蒂的这个宣布，引起一些争议：如果它

是因为族群节日的理由而成为公假日，那末其它族群的节日有没有公假日？如果它是因为宗教或信仰的理由，那末印尼还有许多宗教和信仰，也可以要求成为公假日。有人认为，这是政府对不可忽视的中国经济飞跃发展的必然反应。

瓦希德总统和梅加瓦蒂对华人的亲善政策，华人如释重负。舞龙、舞狮、武术的团体，华文报刊、华语学习就像雨后春笋出现在各处城镇。“美都”电视台、商业广播电台也有了华语节目。不少“新客”华人成立了宗亲、地缘、氏族、校友等等组织，公开和热烈庆祝春节和传统节日。椰加达西区还举办了“华人先生”和“华人小姐”的活动。

社会感受到，在华人社会这种兴高采烈欢庆势头已经过头了。有些华人社会以为华人问题解决了、种族歧视消失了；其实，还有几十个歧视性条例和政策还没有撤销、国籍证件的规定还在、45年宪法有关不利外裔公民的条款也还没有修改、法部提交国会的新“国籍法令”草案还出现了歧视性的条款，国家谍报局“处理华人事务机构”没有解散。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言论认为政府优待华人的政策已经太多，会引起危险的社会不满情绪，苏地约梭的上面的言论，说明了不少官员还存在着种族歧视的心理，随时都会宣泄出来。

伴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和印尼中国两国关系的改善，有一些华人似乎不再把印尼看作自己的祖国，不再把自己看作印尼人。这些人，看来成为印尼公民好像只是为了一本印尼公民护照，在出入境时才使用它。还有一小部分华人热衷搞各国华人联络网，他们这种态度是非常危险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关系时刻都会变化，今天是友好的，明天会是敌对的。

以为撤销一部分歧视性条例、宣布春节为公假日，华人问题就解决了、种族歧视就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很幼稚的想法。

印尼华人问题的解决和种族歧视的消失，只有在我们国家富强了、有了“民主、没有贪污腐败、尊重法治和人权的社会”才会实现。作为印尼民族的组成部分，华人要和其它族群一道，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努力。但是也要知道，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们要首先走出经济危机的困境，为实现这个共同目标努力。

(全文完)

(华辉译。人名、地名多是译音)  
装载自椰加达的第 43、44 期《呼声》(HU Sheng)

# 印度尼西亚“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及其活动概略

蔡仁龙

## 一、 日寇铁蹄南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曾侵占了印度尼西亚。在日本占领期间，爪哇、苏门答腊、西婆罗洲（即现西加里曼丹）等地区的广大爱国华侨曾和印尼人民一道组织了地下抗日组织及开展武装斗争。“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简称“西盟会”）是组织较早，规模也较大的一支抗日组织。西婆罗洲广大抗日志士和爱国华侨及印尼人民遭到日寇的大屠杀也是整个印尼规模最大和最为残暴的。但是至今，对“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及广大爱国华侨抗日活动事迹，除了个别文章中三言两语的道及外，都没有任何的较详尽叙述及真实记载过。笔者当时居留西婆罗洲山口洋，耳闻目睹，亲历了其中一些事实。近年来，笔者又向当时一些“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组织者和参加者进行了调查访问，现将“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及其一些活动情况整理于下，供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侨史的同志们参考，想必是有意义的。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在1941年12月8日，以日本海、空军对美国珍珠港采取突然袭击开始的。与此同时，日本陆军南方军早已布署好对东南亚地区的侵略进军。日本陆军派第二十五军和第三航空集团担任攻马来半岛；派第十四军和第五航空集团担任进攻菲律宾；派第十五军担任进攻泰国和缅甸；派第十六军担任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即印度尼西亚）。日本南侵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掠夺东南亚地区的石油、橡胶、椰子、铁矾土、锡等战略资源，以支撑其实现“大

东亚共荣圈”和称霸亚洲的迷梦。荷属东印度是这些重要战略资源的主要产地，特别是石油。

早在1940年2月，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就曾向荷兰政府提出了一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放宽贸易限制，扩大日本人在荷印经营企业的便利，放宽对于在荷印日本商人雇佣人员和工人入境的限制等等。1940年5月18日，日本又向荷印当局提出了一项书面要求，规定了日本要求荷印供给它包括比以往它从荷印进口的数量多得多的铁矾土、石油等在内的十三种原料、资源的最低限额。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对荷属东印度早就有觊觎之心。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发动空袭珍珠港的同一天，在马来半岛东岸的宋卡(Singora)和哥打巴鲁(Kota Baru)等地登陆。只一个月即占领了整个马来半岛。1942年2月8日，日军登陆占领了新加坡，2月15日，英国远东军司令珀西瓦尔同日军山下奉文大将会谈，这个地区的英军终于无条件投降。

日军在进攻马来半岛的同时，也调遣了一支部队于1941年12月先占领了荷印重要的石油产地婆罗洲（现称加里曼丹）和西里伯斯（现称苏拉威西）。然后这些部队，从马来半岛和西里伯斯岛东西两面夹攻爪哇。婆罗洲日军则在北面阻击。1942年2月14日，日本陆军空降部队在苏门答腊岛的巨港降落，由今村均率领的第十六军在2月17日轻易地占领了该地区。1942年2月28日，日军分别西爪哇的孔雀港，万丹、南安由等地登陆，3月5日即占领了荷印首都巴达维亚（即现雅加达），3月7日占领了东爪哇首府，荷印最大的军港泗水，3月9日，荷军即宣告投降。从此整个荷属东印度便处在日寇法西斯的铁蹄之下，开始了三年八个月的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生活。

## 日寇侵略 荷印军败退

根据 1930 年荷印政府统计局统计，西婆罗洲人口共八十二万七千八百九十八人，其中华侨人口为十万零九千三百一十七人。主要的城市有首府坤甸（华侨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五人）、山口洋（华侨三万七千八百七十二人）、喃吧哇（华侨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一人）、上候、道房、三发、邦夏、松柏港、新党等皆有为数不少的华侨。1930 年调查以后，因战争影响，没有再进行统计过。1949 年 2 月西加里曼丹当局公布了 1948 年人口调查情况，据统计，全西加里曼丹已增至一百一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七人，比 1930 年增加 38 万余人，18 年来平均每年增加两万余人。1948 年华侨则增至二十万三千三百零五人，即比 1930 年增长了一倍，平均每年约增六千余人，剔除在日寇统治时被屠杀及自然死亡者外。据此推算，在 1941 年底，日军侵占西婆罗洲时，全洲华侨人口约 16 万人左右。

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在 1941 年 12 月 19 日派飞机 9 架轰炸西婆罗洲首府坤甸为其侵占西婆罗洲开路的。当时曾投下大量燃烧弹，使坤甸市顿成火海，然后回旋扫射约两小时，死伤约两千余人，其中 95% 为华侨。不久即派日本陆军登陆。当时驻守西婆罗洲的荷军及其组织的荷印保安队（有华侨及印尼人参加）虽组织了一些阻击，但终于在势单力薄、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迅即败退。日寇法西斯长驱直入，不久，即占领了整个西婆罗洲。在日寇侵入前夕，广大华侨及印尼人民多已逃至农村及山区避难，过着吃木薯、椰子等杂粮的生活。城镇荒凉，物品奇缺，日军为了支撑其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用各种强制的法西斯法令及到处搜捕来强迫印尼人民及华侨迁回城镇，组织了日伪维持会等以维持其军队的供应和全洲的社会生活和秩序。由于日寇法西斯的残暴统治，西婆罗洲的爱国华侨和先进分子，于 1942 年秋由贝震寰、刘云天、李

道夫、陈强、谢水金、吴金乡六人发起，在山口洋进行秘密商议后，进行地下串联活动。先后与各地区各种派别的分散的抗日力量进行联系，密切合作，酝酿成立“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当时在西婆罗洲地区还有如下几支抗日力量：

（一）由原荷印军少校巴帝辛及黄春枝（山口洋的企业家，黄能昌的长子，据说其父过去曾开发过金矿，有矿山及一些橡胶园、椰子园等，全家笃信天主教，大战前与荷印政府关系密切，黄春枝也曾是荷印保安军山口洋地区负责人之一）等领导的原荷印散兵及荷印保安军散兵。这部分人大部分隐藏在三发县三发河中游山区及山口洋郊区农村，人数约两百人左右。

（二）由李石祥（山口洋商人，爱国华侨）冯传旺领导的原抗日自卫团部分成员。他们原是在日寇侵占西婆罗洲前，由华侨青年、教师、店员、工人等组织起来抗击日军侵略的。此外还有各地和他们关系密切和领导下的华、印中上层人士。

（三）由原中国国民党山口洋直属支部主任委员李华照、黄聚安等领导的国民党员搞的反日活动。

（四）曾与北婆罗洲伍禅、林立信、陈绍棠等人领导的抗日组织联系。

1942年底，经过了两、三个月的串联及筹备工作以后，正式成立了“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总部设山口洋市。主要负责人有陈强、李道夫、许宜陶、刘云天、谢水金、贝震寰、吴金香、贝翰香、邬松风等。其中除邬松风是天主教徒，当时山口洋市中小学教员外，其他都是思想倾向进步的无党派人士，大都是华侨学校教员和商店职员。

“西盟会”正式成立后，积极发展组织，开展活动。

在西婆罗洲的主要城镇及农村地区成立了十五个“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分会。这些分会其负责人如下：

1，坤甸分会，人数三百余人，主要成员是铁工厂、木材厂等工人，负责人李禄、黄松海。

2，松柏港分会，人数百余人，主要成员是椰园工人和椰农、店员。负责人温又暖、杨官声。

3，喃吧哇分会，人数五、六十人，主要成员是椰园工人和椰农、店员，负责人许雄伟、林德明。

4，百富院分会，人数四、五十人，主要成员是渔民、椰园农民和工人，负责人林树荣，施壁钦。

5，大完肚分会，人数五十余人，主要成员是渔民，负责人游春秀等。

6，把西路下横分会，人数四百余人，主要成员是橡胶园工人、华农，负责人黄耀光、范乱等。

7，山口洋分会，人数约三百余人，主要成员是店员、运输工人、小商贩、教师和部分青年学生等，负责人黄云富、陈景文、南宗、林萍、张蕴略、张壁城等。

8，港坪分会，人数七、八十人，主要成员是椰农、渔民、负责人萧纪华、李国良。

9，文岛宜分会，人数约一百人，主要成员是渔民、椰园农民，负责人叶茂秀、陈瑞荣、古吉力人，卢俊元等。

10，邦戛分会，人数约二百人，主要成员是渔民，小商贩员、教师、运输搬运工人等，负责人黄略汉、何志雄、唐顺水等。

11，三发分会，人数约数百人，主要成员是橡胶园工人、店员，负责人宋晋康、傅孙瑶等。

12，自芒头分会，人数五十余人，主要成员是橡胶园工人，负责人黄火胜、黄添发等。

13，孟加影分会，人数两百余人，主要成员是橡胶园工人，负责人陈纪祥、林天水等。

14, 福津分会, 人数五、六十人, 主要成员是农民, 负责人张阳、魏石华。

15, 百万突分会, 人数五十余人, 主要成员橡胶园工人小贩, 负责人钟家济等。

除上述分会外, 还在其他一些乡村和市镇设立了一些联络站, 人数五、六十人不等。全体成员总数在三千五、六百人左右。

### 三、

## 西盟会积极活动

“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成立后, 除积极发展组织, 建立各个会外, 它的活动可分成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1942年秋成立起, 至1945年8月日寇投降时为止, 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 建立武装根据地, 开展对日寇的武装斗争, 破坏和袭击日军的交通运输和供应, 对日军驻地和伪警察署或巡逻队等进行袭击等。但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武装战斗。当时“西盟会”建立了两个武装根据地。一是把西山区根据地。这是“西盟会”的武装斗争组织大本营。在这里收集储藏了枪枝子弹、粮食等物, 训练武装人员(包括隐藏被日寇通缉的各方人士)。把西山区的武装队伍称为“中国义勇军”, 负责人是李道夫、黄耀光、黄聚安等。主要在坤甸—山口洋公路及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武装斗争活动。“西盟会”刚成立时, 仅有爱国华侨张伟邹捐献的一支重机枪和三支自动步枪(黄春枝家捐献)、五枝左轮手枪及十余个手榴弹。这些都是原荷印保安团成员留下私藏后捐献出来的, 此外尚有十余支土制猎枪。

第二个根据地是三发河流域根据地, 这是由原荷印军散兵负责人巴帝辛和黄春枝领导的。这里原有两百余人, 几

乎人手一枪，还有一部收发电台，装备较为充足。主要在三发、邦戛水陆两地开展游击武装斗争活动。后来，黄春枝被日寇逮捕后，这个根据地的武器都转归“西盟会”所掌握。此外，李石祥系统的保卫团成员在荷印军撤走后也留下部分的枪枝弹药。同时，“西盟会”还积极派人到西婆罗洲和北婆罗洲交界硕莪山区收购英军败退时落入民间的枪枝，以及三发、孟加影等地分会游击队袭击当地警察署，缴获当地警察部队的全部武器来武装自己。因此，据不完全统计，“西盟会”后来拥有的武器有重机枪四挺，各种步枪、手枪约二千支、手榴弹数百颗，子弹近万发。

（二）积极开展抗日和反对德、意法西斯的宣传活动。

“西盟会”利用电台，经常收听澳洲电台的国际战事广播，将收听的新闻，世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胜利战果，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胜利战果，印成传单进行传阅和散发，或向各分会队员并通过他们向华侨宣传，同时经常揭露日寇屠杀华、印（尼）各族人民的法西斯暴行，号召全体华印（尼）人士，团结对敌，打击日寇，不和日寇法西斯占领军日伪合作，鼓舞华、印（尼）人民战胜日寇法西斯的信心，这方面也收到相当的效果。

（三）收容和保护抗日分子和其他政治犯。对被日寇追捕的抗日分子及同情者，以及荷印时代的军政人员，尽力协助他们脱险，并根据不同情况，转移到根据地或北婆罗洲等安全地区安置，对他们的家属也是如此。对生活等有困难需协助者给予适当解决，与此同时，积极进行锄奸活动。“西盟会”组织了“肃奸委员会”的专门机构，负责清除汉奸、特务及其他日伪走狗。根据当时各地掌握的敌情和群众公开检举揭发，据不完全统计，仅山口洋、邦戛、孟加影一带就逮捕了罪证确凿、民愤较大的汉奸特务近百人，由“中国义勇军”进行逮捕、关押和审讯。到日军投降后，西盟会武装复员时，将这些人移交给重新接管西婆罗洲政权的荷印军看管。

总之，“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成立后，虽没有组织较大的和日寇占领军的正面战斗，但对于团结广大爱国华侨，反对日寇在西婆罗洲的法西斯统治，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牵制他们的力量，削弱他们的后方供应根据地等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正因如此，日本法西斯占领军对“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及华印（尼）人士的团结抗日活动，吓得要死，怕得要命，恨之入骨，千方百计的派遣许多暗探特务进行暗查和侦察。由于这些汉奸、特务无孔不入的猖狂活动，和抗日组织人员的缺乏经验及丧失警惕，招致了日寇法西斯在西婆罗洲进行了三次震动全印尼的规模空前大逮捕和大屠杀活动，被捕的华印（尼）人士约三千余人，其中华侨约一千五百余人。

### 日寇法西斯大逮捕大镇压

这几次大逮捕的情况简述如下：

第一次大逮捕发生在 1943 年 2 月 13 日。

1943 年 2 月 13 日的西婆罗洲各主要城市坤甸、邦戛、三发、喃吧港、松柏港等地的印尼人民及华侨，像往常一样七时左右早餐后，商店陆续开门，教师和学生正赴校上课，公务员正在上班……这时，由日本占领军宪兵司令部派出无数的警察、特务、爪牙按照他们手上的黑名单，挨家逐户地到要捕的华印（尼）人士家，通知他们立即跟随来人到指定地点“开会”，日本军方将有事情“通知”和“训话”等。当时，接到通知的华印（尼）人士对这一异常手法，虽表惊异但却没有高度警惕，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神秘而恐怖的大逮捕活动。因此他们都只身穿一套普通衣服，没有携带任何其他生活用品，也无和家人作任何告别的情况下随同来人去了。到了中午时分，家属才发现这是本市（地区）普遍的情况，被叫去的人大都是工商业、文化教育界包

括日寇维持会的一些上、中层知名人士和负责人、爱国华商、教员等，既不知他们到何处，更不准任何一个回来，后来家属通过到有关机关追问，才知他们全部已被拘留逮捕了。第一次西婆罗洲大逮捕大多就是用这种诱骗的诡计进行的。这次被捕的华印（尼）人士有五百余人，都是中上层人士，和荷印时代的一些官员。被逮捕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也不知他们拘留何处，犯了什么罪和命运如何？从此杳无音讯，下落不明，日寇法西斯占领军对此逮捕也缄口不言。

第二次大逮捕活动发生在半年以后，即1943年农历8月3日。这次是采取赤裸裸的法西斯恐怖的野蛮逮捕方式，和上次回然不同。8月13日凌晨，各地不少城郊农民正拖着一些农产品到市场赶集以换取一些生活日常用品。由于这是中秋节前夕，所以比平常较为热闹一些，但当他们准备进城时，各入城要道三叉路口都有日军站岗把守，不准进城。原来昨晚已宣布各地戒严，进行了大逮捕活动，直到凌晨仍在进行。这次逮捕活动都由日寇宪兵军警人员亲自出面，在特务汉奸的带领下按照名单驱车挨家逮捕。到被捕者家后，即将其往处包围，敲门冲入去后，立即用麻布袋或面粉袋套在被捕者头下扎紧，双手反绑推入汽车拉走，因此不少被捕者当时刚从床上起来，只穿一条背心和内短裤，也没穿鞋子而被绑走的。那天西婆罗洲各城镇一片白色恐怖，没有一家商店开门，马路上也几乎无人行走。这次由日寇特种部队（属海军陆战队）在全西婆罗洲逮捕华印（尼）人士约一千余人。

这次逮捕事件后，由日寇占领军主办的在坤甸印刷出版的西婆罗洲唯一一家中文日报《西婆罗洲新闻》（四开版，和现在的《参考消息》一般大小）于1943年底刊登了大字标题的报导，说什么日本皇军破获密谋反对皇军，妄图成立“西婆罗洲共和国”的抗日组织，并刊出声音已被枪决的所谓“西婆罗洲共和国”首领黄业纯、江周纪等十二人的名单和像片，以及所谓被缴获的一大批枪枝（照片上排列了十几枝）子弹的照

片等等。这样，广大的华、印（尼）人士及被捕者家属才深切意识到，亲人的真正“罪名”和生还回来的可能性是极为渺茫了。

日寇法西斯占领军对全西婆罗洲的大逮捕活动的最根本原因是日军在整个侵略战争中，遭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亿万中国人民及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坚决抵抗，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中的不断失利和节节败退情况下而进行疯狂报复、垂死挣扎的一个表现。但其直接的原因是由于西婆罗洲抗日组织对日寇侵略军的打击和被发现所致。

根据当时“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掌握的情报，第一次逮捕起因是因为隐藏在百万突村黄春枝橡胶园内的荷兰人夏格（原山口洋市土地局长）被附近的村民告密被捕，并且在胶园工人宿舍内搜到了一架无线电收发报机（这是黄春枝本人收藏的）。因此，作为胶园主人的黄春枝父亲黄能昌老先生也当场被捕（黄春枝当时不在该胶园内）。隔天，日寇特别警卫宪兵队即在全西婆罗洲各地进行了大逮捕活动。

第二次大逮捕的直接起因是隐藏在三发河中游由原荷印军少校巴帝辛领导，黄春枝接济的荷印军散兵一支十余人小分队，被当地日寇驻军突然袭击并全部被俘。当天晚上，日寇特别警卫宪兵队就在全洲范围进行了大逮捕。被捕华印（尼）人士约一千余人。这次被捕的包括与“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关系密切，积极支持的黄石洋、冯传旺、李贵郎和黄春枝本人，还有黄春枝的胞弟黄华秀，黄春晖，以及黄春枝的妻弟谢石奎，妹夫萧水华。总之黄能昌、黄春枝全家的成年男子无一幸免。黄春枝的堂兄黄春发，堂弟黄耀能及其另一妹夫谢石金则由“西盟会”及时派人援救，转送入把西区根据地，幸免于难。这次被捕者中尚有不少是西盟会的同情者或与“西盟会”有过关系的人，如山口洋的李任苍、蔡枝、黄祥等，坤甸方面有蓝琼山、张恢原、凌祥隆等。潜伏在

山口洋郊区原荷印军少校巴帝辛(已直接参加“西盟会”)及其旧部十三人也在此次被捕。

对于日寇法西斯大逮捕的起因,最初也曾有过下述说法:有一天夜里,正下大雨,李石祥及战友在某橡胶园中挖起一部分枪枝转移到另一胶园中,不料由于警惕不够,被日寇一特务发现告密后被掘出,李石洋等即遭到逮捕。日寇怀疑有地下抗日组织,从而在全洲开始了大逮捕。《西婆罗洲新闻》日报上刊登的枪枝照片即是其中被掘出的一部分。

日寇在《西婆罗洲新闻》日报上登的所谓成立“西婆罗洲共和国”和查获的枪枝弹药等完全是捏造的。在逮捕和公布枪决的所有十二名“西婆罗洲共和国”首领中,只有黄业纯和江周纪两人和“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有过关系。

黄业纯是西婆罗洲“合丰兄弟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是西婆罗洲第一流的工商企业家。在坤甸、山口洋、邦戛、三发等地都有“合丰兄弟公司”,拥有不少工厂、胶园、椰园、电影院、进出口贸易公司等。其弟黄业江则主持山口洋的公司和企业,山口洋最大一家电影院及唯一的制冰厂都属他所有。李石祥因生意关系和黄业纯、黄业江兄弟有联系。“西盟会”成立后,李石祥曾经向黄业纯、黄业江兄弟劝募捐款,接济“西盟会”。江周纪是荷、华混血种人,原任山口洋市政府秘书官,在荷印时期,和黄春枝一家即有来往,较为熟悉,日寇占领山口洋后,江周纪避难隐居在山口洋附近的福律镇郊区农村中,生活由黄春枝接济支持。因此这几个人知道西婆罗洲有地下抗日组织,其他十人则都是荷印政府时期的政府官员、医生或工程师等,和当时地下抗日组织不仅没有任何联系和关系,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种组织,因此可说是无辜的。至于照片中的枪枝弹药,则是日本侵略军占领西婆罗洲时,原荷印军自卫团撤退时丢弃的(荷军撤走后,日军登陆,由华印(尼)人士参加的荷印自卫团或保安团败退时,因害怕而在沿路村

庄、水沟等地丢弃枪枝现象屡见不鲜），日寇把他们拍成照片公开登载，不过是作为大逮捕和大屠杀华、印（尼）人士的一个藉口和伪证而已。

第三次大逮捕发生在 1944 年秋。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是无论在中国、欧洲还是在太平洋等战场、世界各国人民反抗德、意、日法西斯的反侵略战争都在大反攻阶段。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已于 1943 年秋投降。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在苏联红军及英美欧洲等各国的沉重打击下在节节败退。日寇法西斯在中国，遭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及亿万人民的大力围歼，日寇法西斯在太平洋各岛的战场上也一败涂地，日本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1944 年 7 月 18 日，担任日本天皇战时内阁总理、发动侵略战争整整四年之久的主要头目东条英机不得不被抛弃下台，换上了小矶国昭担任内阁总理，妄图苟延残喘。日本内阁头目的换马不等于政策有任何改变，而是更加疯狂的企图作垂死的挣扎，这次大逮捕也是这种垂死前挣扎的一个缩影。

这时，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由于前线惨败，兵员吃紧，因此印尼各岛包括西婆罗洲的兵力正不断被调往前线，企图挽回败局。但是他们是绝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的，因此为了镇住后方，发生了西婆罗洲规模最大的第三次大逮捕和大屠杀事件。

大逮捕的直接起因是当时北婆罗洲的抗日组织为了接济“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派了林立信押运一批物资（主要是布匹）到西婆罗洲，并准备购买一批药品运返北婆罗洲。这批物资和布匹顺利的到达了“西盟会”的抗日根据地。然后装运药品返回北婆罗洲，但是在途中，经过距离山口洋六公里的沙垄港口时，被日寇特警队截获。被捕的搬运

工供出货主姓名和地址，因此负责此事的“西盟会”负责人陈强和谢水金两同志同时被捕。“西盟会”组织得知消息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在事变后不到两小时，即安排护送林立信离开山口洋取道孟加影，越过华莪山区返回北婆罗洲，从而使负责押运的林立信幸免于难。当时，日寇虽然把这批药品当作“走私”商品处理（西婆罗洲在日寇统治时期，物品奇缺和昂贵，人们为了维持生活，因此各地走私粮、油、药品、布匹等等贩卖互通有无现象较普遍）。但由于林立信从北婆罗洲来西婆罗洲活动的情况，已被日寇军警特务侦察到，因此，在破获药品和运出事件后，除派大批特务暗探到处搜捕林立信外，也在全西婆罗洲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逮捕。这次被逮捕的华印（尼）人士约一千五百余人。除了多少数是参加“西盟会”抗日组织的成员（如陈强、谢水金等）外，绝大部分是商人、店员、工人、中、小学教员等爱国华侨。

### 被活埋两千多人 惨绝人寰

日本法西斯侵略军占领西婆罗洲三年零八个月中，先后三次大逮捕了华印（尼）人士三千多人。除了第三次被捕者在日寇投降前夕因被打被饿或病得骨瘦如柴的三百多人被释放回来外，其余二千多人下落在那里呢？这个谜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几个月后才得到了解答。成千上万的被难家属们在日寇投降初期，都曾抱着殷切的期望和祈祷着被捕的亲人们能安然归来，然而血的事实终使他们的期望成了泡影。

日寇投降几个月后，才陆陆续续的传出，所有被捕者均已罹难！除部分在日本法西斯监狱中被审讯拷打致死或病死者外，绝大部分被活埋在坤甸郊区的榴连港机场和东万律机场。

笔者作为被难家属成员之一，于1946年2月16日，曾随同山口洋市的部分被难家属们乘了几辆大汽车前往东万律

飞机场亲自目睹了被难者活埋的现场及进行吊唁和祭悼。惨绝人寰的被难者们被活埋的现场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早在每次大逮捕后不久的一段时间，人们曾发现在坤甸山口洋公路上，在漆黑的深夜有过多次日军军用卡车装满东西，用帆布篷遮盖得严严实实，上面坐着几个荷枪实弹的日寇押运，既不知押运什么东西，也不知运到何处。现在真相大白。当时，被捕者即一个个被双手和全身反绑，扛上汽车，层层叠放，运到上述两个机场秘密集体活埋屠杀的。

东万律机场及其附近空地，因无使用，年久失修，原来到处杂草荆棘丛生，现在这一大片空旷地则到处是活埋人的大坑，每个坑长约八至十米，宽约三至五米，深五至十米。日寇投降后，已由“西盟会”会同一些地区的中华公会，派人对埋人坑进行了整理，即每个坑周围边缘锄一小沟，整成一个个坑形。但每个坑面泥土上仍布满了无数的头盖骨、四肢、肋骨等各种碎骨，以及无数沾满污血、血迹斑斑的破衣服碎布片，惨不忍睹。显然这些是被难者们在被处决和活埋前被殴打或和敌人搏斗致伤的标记，也是日本法西斯暴行的一个个铁的罪证。全场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埋人坑，据说每个坑被埋三、四十至七、八十人不等。被难家属们见此惨状无不嚎淘痛哭，悲痛欲绝。但是谁也无法找到和认出自己的亲人，因此我们曾将布满坑面上的头盖骨收集在一起，放在一个临时搭起的草棚下，举行了简单隆重的悼念仪式。这些只不过是一小部分的头盖骨而已，大部分尚埋在各坑的泥土下，据当时在场的一些住在东万律镇附近的侨胞们说，当时东万律及其附近都被列为禁区，这些埋人大坑也多是日军用枪枝逼迫下由被捕者挖的，然后日寇刽子手将他们一个个推进坑内，由于被捕者的反抗，因此，遇到枪托刺刀的殴打或刺杀，有的即开枪屠杀。在那些夜晚，凌厉的嚎叫声，划过长空，极为悲惨和恐怖。由于日军在周围进行警

戒且又是禁区，因此长期无人敢去观看，直到日寇投降后真相才终于大白于世。

为了纪念这些被日本法西斯残杀害的华印（尼）抗日人士及爱国者，日寇投降后各地中华公会积极筹款在坤甸、山口洋和东万律、邦戛建造了四个“被难华印人士纪念碑”，至今仍然矗立在这三个城镇。

下面是我们收集和了解到的当时被难者的一小部分人的名单，这是远远不完全的，希望知情者或被难家属继续提供。

黄业纯	黄业江	黄能昌	黄春枝	李石祥
江周纪	黄华秀	黄春晖	谢石金	萧水华
张恢原	刘长英	郭荣富	朱登奎	张淑谋
赖星曹	梁星秋	江九富	郭淮添	廖起然
廖水华	熊海水	邓克尧	李恩晋	贺云辉
李开亮	贺兴龙	陈明轩	叶钱丑	郑宏生
许庆瑞	伍伟民	廖佛霖	李慕唐	曾德业
谢琼森	黄木华	谢六	郑嘉城	江殷昌
唐山镇	汤辉轩	邹桂凤	朱清秀	张焕标
黄春生	刘南生	房荣堂	冯锋南	余是我
黄竹友	许采卿	徐日南	黄千	李杏章
郭福瑞	郭杰	卢善贤	林炳全	林燕卿
黄赞成	赖友保	赖福贤	吴新德	吴新发
吴新华	吴新昌	郭汉达	林福源	林金泉
林长泉	钟体仁	吴清松	林翼如	凌兆思
郑海城	郑清源	李春澍	凌熙章	凌烘章
凌章	陈少馨	钟义达	尤源盛	王福城
许新明	郭清顺	黄鸿儒	林宋宏	林松发
林松和	刘光裕	刘光木	刘光炳	林文康
苏春辉	陈天炎	林春明	陈锡祉	钟拱良
苏添庆	李承德	黄海如	黄耀祥	冯麟芝
冯钺东	冯炯芳	黎纪城	陈荣轩	廖世盛
林振华	吴双财	陈维华	陈石添	吴秋兰
曾维廉	林亚水	蔡玉芳	蔡职贤	蔡双贤

成和盛	成世祿	李天梅	郭坤錫	林玉安
林文安	许华祥	关声亮	付维尊	李开回
梁启耀	李开回	梁启火覃	陈石增	池保亭
付家中	黄其祥	欧阳南钦	朱锦辉	朱锦元
陈达洲	李日青	魏士秀	张永贵	苏添进
郭木祥	陈文福	吴均华	黄庆春	黄祥麟
付进明	付石兴	张肖生	张鸿伟	付炳文
李明石	李亚谷	曾繁乐	黄庆丰	黄衣溪
赖寿郎 等等。				

(参考《印尼华侨情况》整理)

#### 四、

### 抗日后的西盟会

“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第二阶段的活动是从 1945 年至 1949 年 6 月。

日寇投降前夕，“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根据当前的形势，曾讨论确定了当时的工作方针，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全面组织动员武装力量，分别进驻所有大中城市，监视日寇投降活动，保护人民安全。八月底盟军先遣部队代表（澳洲军代表）抵达坤甸，和“西盟会”代表会谈取得了协议，决定由西婆罗洲华印人士联合组成二十三人的“保安委员会”，负责接管日伪政权，华方代表十二人，由“西盟会”指派，印尼方代表十一人，由当地各党派派出。正职由华侨担任，副职由印尼人士担任。实际上，盟军（英、荷、澳等军队）的目的是在荷、澳军队大批开入西婆罗洲重新接管政权以前，把“保安委员会”作为一个缓冲作用，从而阻碍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取得独立接管政权。“保安委员会”下设“保安队”代替警察部队，维持地方秩序。队员中华侨占 60%，由“西盟会”指派，印尼方面占 40%，

由印尼独立运动组织派出和伪警改编；队长以上的正职仍是华侨担任。

“保安委员会”总会设在坤甸。中、小城市设分会共五十余个单位。全部所属保安队员约三千余人，约三分之一的队员配备有武装。“保安委员会”在日寇投降初期，在维持西婆罗洲社会秩序和治安方面起过了良好的作用。

第二，清查敌产。各地“保安委员会”下，设立了“敌产保管委员会”，每一委员会下设主任一人（华侨担任），副主任两人，（华印各一人）负责调查日伪军营物资，码头、仓库、银行以及政府机关设备一切敌人财产，一一加以清点查封。

第三，清除汉奸特务及其他日伪走狗。上面已提到，这项工作由“西盟会”单独组织“肃奸委员会”负责。

第四，调查登记日寇在三年八个月占领期间，主要是三次大逮捕中被惨杀人士名单及去向，被活埋地点，以及被难人士的财产丧失及其家属的困难补助、生活赡养费等善后处理工作。

这期间，在印尼各地，特别是爪哇，以苏加诺为代表的印尼民族主义者和印尼共产党人都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运动而斗争，而且已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布印尼独立和印尼共和国的诞生。但是荷兰帝国主义并没有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所觉悟，而仍企图卷土重来，再对印尼进行殖民统治。

1945年底，经过周密的准备和策划后，荷兰军队在澳洲军队的密切配合下，从海空两路大批开进西婆罗洲，接管西婆罗洲各地的政权。实际上是扶植荷兰帝国主义对西婆罗洲进行殖民统治，镇压印尼民族独立运动和扑灭“西婆罗洲后日同盟会”的抗日进步力量。这个做法和英帝国主义在马来亚及新加坡的做法及目的是雷同的。

## 荷殖卷土重来 分化西盟会

由于荷军重新掌握西婆罗洲政权，而且极力拉拢扶植原亲荷派的势力和人员，对“西盟会”和华侨及印尼的抗日力量进行瓦解和软硬兼施的政策，达到其扑灭印尼民族独立运动，重新统治西婆罗洲的目的；而“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原来就是在抗日的前提下由政治观点极不相同的派别或集团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统一的，任何政党和坚强领导。日寇投降后，各派别或集团为了各自的思想倾向和利益也不可能一致。在此情况下，“西盟会”内部也急剧发生了分化。

一、思想倾向进步的一派（“西盟会”骨干）主张武装对抗，不让联军接管部队登陆，并联合当地民族独立运动力量，坚决反对荷帝的殖民统治。虽然这一派人数最多，实力最大，但由于经过三年多的战斗和艰苦生活，现在日寇已投降，认为胜利了，实现了和平了，这部分人中大多数成员多属农民、渔民、店员等，组织也松散，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渴望回去谋生。因此正当西盟会代表与荷军司令部谈判，尚未结束，总会也未作出最后决策的情况下，不少武装队员即纷纷自动携械离队回家去了，从而失去武装斗争的支柱。

二、原荷印军的散兵，荷军登陆后，在荷印政府的号召和收留下，大都登记归队，并被改编调去爪哇等地区镇压当地民族独立运动。

三、以 XXX 等天主教徒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他们企图搞第三势力，事实上他们是亲荷派。他们开始公然反对建立联合统一的华侨社团“中华公会”和联合当地民族共同抗荷的原定计划。曾提出把“西盟会”改为一个定名为“民主同盟”（不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建立一个以华人为主的“西婆罗洲共和国”，并马上印发共和国纸币等主张。“

“西盟会”领导机构和 XXX 等人经过多次激烈的争论，他们的  
主张被否决后，即撕下伪装的外衣，公然和荷军合作，公开和  
“西盟会”对抗。他们造谣诬蔑“西盟会”是共产党的组织，  
在荷兰殖民政府的支持下，他们把接收过来的“西婆印务馆”  
作为私产，擅自把原计划由坤甸中华公会主办的机关报《中华  
公报》改为《中华日报》。原来“西盟会”派他担任《中华公  
报》的社长兼总编辑，XXX 即乘此而窃据了《中华日报》的大  
权。不仅拒登“西盟会”的宣传稿件消息，表面上是公正中  
立，实质上站在相反的立场，攻击反对建立华侨统一领导机  
构。为此，思想倾向进步的爱国华侨另行筹组出版了坤甸《黎  
明报》。

四、以李华照、黄聚安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党员，也拉出  
部分国民党员，到各地搞复党活动。战前中国国民党在西婆罗  
洲有坤甸、山口洋，喃吧哇三个直属支部，其他各城镇共有分  
部一百多个，人数不下两万人。当时中国经过八年的浴血抗  
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成了中、苏、英、美四大列  
强之一，广大海外华侨无不欢欣鼓舞，感到骄傲。但西婆罗洲  
地处偏僻，他们中间不少人并不大了解国内情况，不很清楚这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的结果。不少人受到蒋介  
石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蒙蔽，因而日寇投降后，他们乘势一度  
曾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公开抢夺侨团、侨校，并怂恿荷军逮  
捕抗日分子和拒绝恢复国民党籍的旧党员，诬陷他们为共产  
党，秘密组织收藏枪枝和印尼人民一起反对荷兰政府，搞独  
立运动，企图暴乱等等。国民党支部和这些人是“西婆罗洲反  
日同盟会”后期的死对头，后来形成了西婆罗洲华侨社会中进  
步与反动，民主与反民主，爱国反蒋和卖国拥蒋的两大势力的  
斗争。

#### 西盟会与荷殖谈判

由于“西盟会”内部四分五裂，荷军重新占领了西婆

罗洲，急于全面掌握政权，十分害怕印尼的民族独立运动更加扩大和发展，因此步步进逼。荷军先遣部队司令樊·穆克，曾正面提出要求抗日武装立即复员，态度极为蛮横。“西盟会”在当时的处境和条件下，不得已提出了复员的几个条件：

一、荷军进驻每一城市，必须事前三天通知当地“保安委员会”，避免与所在地的保安队及“中国义勇军”发生误会，而引起冲突；

二、各地保安队要根据自愿原则改编为正式警察（包括各级警官），但只限于维持地方秩序，不能把他们调动去反对印尼独立运动；

三、对中国义勇军和自愿复员的保安队员，除补发入伍以来的工资外，并加发三个月作为复员费；

四、惩判日、伪特务和汉奸，西盟会逮捕的百余名汉奸特务移交荷军法庭进行审判；

五、赔偿荷军当年撤退进行焦土政策时被毁的华侨财产，

六、建立华印人士被难纪念碑，抚恤被难家属；

七、废除侨长制度（即加必丹制、老大制）及人头税，承认各地“中华公会”为华侨统一领导机构，对内有权处理华侨事务，对外有权代表华侨有关的交涉事宜等等。

事实上这些条件是带有妥协性的。荷军司令对上述这样一些妥协条件，为了达到他的总目标和阴谋，表面上表示接受，但又借故拒绝在《谈判纪要》上签字。“西盟会”代

表也明知荷军方面言而无信、即使这样一些条件也不可能接受实行（果然后来只履行了第六、第七两条件，其他有的不完全兑现，有的根本不认帐）。但“西盟会”内部已经四分五裂，势难坚持，各地保安会的一些胆小怕事的负责人也纷纷辞职不干。1946年初谈判后一星期，“西盟会”即公开宣布，抗日工作至此结束，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即日起开始全面复员……并号召全西婆罗洲各阶层侨胞成立“中华公会”，为维护华侨正当权益、做好华侨文化教育和福利事业而努力奋斗。“西盟会”并通令各地分会把枪枝子弹和关押的汉奸特务交给所在地荷澳联军。

### 解散西盟会 解散保安会

“保安委员会”总会也通知各保安分会，移交敌产和政府机关，并宣布解散“保安会”。从此“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组织表面上已不再存在。“西盟会”各地交出的枪枝等约一千五百多支，各种子弹数千发，尽管交出的是较旧的武器，一些较好的枪弹不少被武装队员自动私藏起来，总部也无法控制，但是，这不能不是“西盟会”后期犯的一个严重错误。虽然“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不是党所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而是华侨自发组织的一支抗日力量，由于没有经验，也没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和政治路线，更没有完整的政治思想工作，加上日寇投降后荷印的政治军事压力及所处的形势和处境，以致造成在这种妥协条件下结束和交出枪枝弹药，这些是一个惨痛的经验教训。

1945年底，“西盟会”决定解散前，其负责人和一些进步的抗日分子曾与“马来亚共产党星洲市委员会”取得联系。当时英帝国主义重新占领星马以后，也是利用威逼和利诱，当时马共在修正主义领导人莱特领导下，向英军交出了全部枪枝弹药，解散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放弃了武装，转为搞社会政党的活动。“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上述作法是否得到

马共所指示不得而知，但至少，受到马共当时领导人及其作法的影响是很显然的。

## 筹组中华公会

1946年初“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宣布复员后，各地分会成员很快参加到筹组“中华公会”的活动中去。不到半年时间，全西婆罗洲各地的“中华公会”先后正式成立。总会设在坤甸，各中、小城镇共设“中华公会”分会一百多个，各地“中华公会”的骨干分子大都属“西盟会”的成员。

“中华公会”组成初期，主要任务是团结各阶层华侨，举办华侨文化教育和福利事业，并教育华侨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反对荷印殖民政府战前“以华制华”的侨长制度，并全力做好被难家属的抚恤工作和华侨物资配给工作。因为战后初期，粮食、布匹、糖、盐等较为缺乏，全西婆罗洲各地居民都实行按每户人口定量配给制度。这个工作对安定广大华侨生活曾起过一定良好的作用，各地“中华公会”一般都下设“中华教育委员会”统筹统办各侨校的复办和教育经费等工作，因此各地侨校不少统编为“中公”第一校、第二校、第三校等迅速恢复和发展，此外，还组织“中华青年会”，“中华妇女协会”等分别负责青年和妇女工作。大中城市的“中华公会”还下设有“工商部”负责华侨商业和劳工事务。在初期，各地“中华公会”成立后，战前华侨社会中的各个同业团体，各省籍或地区同乡会等帮派组织和社团，不再出现，国民党支部的党员人数也比战前减少了三分之二左右。

## 被迫成立锄奸团

但是，另一方面，“西盟会”复员后，尽管各地“中华公会”成立，并开展了各项生气勃勃的促进华侨团结爱国活动，而荷兰帝国主义在印尼各地也重新篡夺了抗日胜利的果实，掌握了政权，并且疯狂的镇压各地民族独立运动。西婆罗洲荷兰“尼加政府”站稳脚跟后，同样对争取印尼独立运动分子和华侨抗日分子进行镇压。西婆罗洲特别是山口洋等一些地区，荷兰驻军司令部接二连三地传讯和搜查原“西盟会”主要负责人，追查“西盟会”武器下落，一些积极的抗日分子被迫流亡到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原思想较进步的“西盟会”的负责人极为气愤，感到忍无可忍，因此联系了一部分人重新拿起武器，成立了“人民锄奸团”。负责人有刘云天、谢水金、贝翰香、林萍、古吉力人、周敬孝等。“人民除奸团”曾先后采取暗杀手段打死了张亮（汉奸、山口洋一个搞宗教迷信的神棍，其儿子是日军翻译，汉奸）钟国仁（汉奸，一间咖啡店老板）和打伤了赖森华、张锦松等七人。1946年8月29日，又打死了荷军侦探长阿目。第二天，荷军如临大敌，派水陆两路全付武装士兵，开到山口洋包围全市，逐家逐户强迫华侨下半旗为被杀的侦探长致哀。因绝大多数的华侨都拒绝升半旗，结果军警不断鸣枪恐吓，并开枪打伤十余人，捣毁不少商店，引起全洲各地罢工、罢市，与荷军殖民政府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荷军被迫终于撤换了当军司令和警察总监，这就是山口洋的“八·三〇事件”。“人民锄奸”这种以暗杀手段来消灭一些汉奸特务的做法，后来受到批评纠正，不过这也反映了当时西婆罗洲华侨对荷军及其爪牙和一些汉奸特务的切齿痛恨。“人民锄奸团”接受批评后于1946年秋解散。“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从此正式全部结束。

转载自《印尼华侨与华人概论》

## 苏哈多暴政下的排华惨情

- 记西加表哥一家在排华事件中惨死经过 -

红至搏

### 和平宁静自在的生活

1946年9月16日,天气晴朗,秋高气爽,鸟语花香。下午,我们家来了两位远方客人。客人进屋后和爸爸谈话,然后妈妈端上茶,和客人客套了几句,才请客人喝茶。妈妈走开后,爸爸叫到我前面,介绍说:“这位是从很远的地方——西罗滑埠头来的满姨丈。”我听了爸爸的话,向客人叩首,同时称一声:“姨丈您好!”爸爸接着说:“这位是姨丈的儿子,今年十一岁,比你大一岁,你叫他表哥。”我说声表哥好,同时表哥也向我说:“表弟你好!”并伸过手来和我握手。接着爸爸再说:“姨丈姓蔡,大名叫方仁,表哥名叫蔡南成,你记住了!”同时叫我们到外面去,我和表哥拉着手就到外面去玩了。表哥和姨丈在我们家住了五个晚上才回去。

翌年的元宵节后,爸爸带我到姨丈家。清早天刚亮,我们就动身,穿过许多山脉、草地和平原,渡过许多山溪及河流,走了十多个小时山径小路,下午五点多钟我们才到达西罗滑埠头姨丈的家。在姨丈家我们宿了三个晚上,白天表哥都带我到周围邻居亲戚朋友家玩,在那几天的旅程中,最让我注意的事就是:西罗滑埠头每个家庭中,妇女都戴着首饰,有的插金发钗,有的戴项链,有的戴金手镯,有的戴钻戒。在回家的路上我问爸爸:我们的家乡甲板村的家庭妇女都没有戴首饰,为什么西罗滑埠头的妇女都戴着许多漂亮的金饰钻饰呢?爸爸告诉我:我们的家乡是刚开发的新地方,人民都为了吃饭,为开发种植忙,没有钱买首饰。西罗滑埠头是几百年前最富有的地方,在开采金矿旺盛时期,是七公司中,生产黄金最多的地方,市区繁荣,人民生活非常富有,所以到现在妇女还普遍戴首饰。据说,在那儿的一处大河

边，有个大金矿，储量有几百公吨呢！几百年来有英国人、荷兰人和华人的公司，经过几十次进行开采，都因为没法治水而失败告终。

## 种植胡椒和树胶

十多年后，表哥一个人到我家来，表哥已长成身体高大、皮肤赤黑英俊的大男人了。见面时，我们彼此都互相不认识了。表哥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在那个晚上，我们谈得很多：表哥告诉我，他已在六年前和李爱香女士结婚了。李爱香表嫂今年 26 岁，已经生了个儿子，现在已五岁了，取名叫蔡民林。他结婚后的第二年，当地流行天花病及霍乱病，岳父母及父母在那天灾中先后去世了，夫妇两人感到非常的孤单和悲哀，本地又还没有好的耕地，难有发展，翌年两人商量决定搬到昔多港住，在那里全是原始森林，土地非常肥沃。两个人在那孤独一家人的地方，没有应酬，没有和他人往来，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开山辟地，经过一年多的劳动，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种下的稻田丰收了，收到的稻谷，可供一家人三年的粮食。夫妇两人非常的高兴，对未来充满希望，就开始种二百株胡椒及四百株树胶，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连番种稻，种胡椒及树胶，到现在已经种了五百株胡椒及三千株树胶，最先种的两百株胡椒，已经采收了一次，晒干了共 225 公斤。表哥有远大的理想，他计划十年后，要拥有一千多株胡椒及两万株树胶，农园的事务顾工人料理，自己搬到山口洋或坤甸市去做批发生意，到爪哇或新加坡去采购……。

## 当局禁止华人在乡镇做零售生意

我很高兴，表示十足支持他的想法。然后我也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告诉表哥：我 1956 南华中学毕业后，因为家里生活辛苦，就停学了，1957 年到三发的一个小地方，朋友的哇郎里（小零售店）当学徒，半年后做小贩。直到 1959 年初土产

价钱较好，父母给一点本钱，开店做小生意，到 59 年末，政府禁止华人在乡镇做零售生意（PPIO），我又失业了，回到父母身边种稻，种胡椒，割树胶，那时许多媒人来说媒，父母一直催促结婚，有两三个姑娘又长得很漂亮动人，最后还是决定到外面闯，先学缝纫，1960 年末向父母要了他们仅存的 2900 盾现钱准备到山口洋去买缝纫机，学裁缝，来到山口洋唯一卖缝纫机的商店里，一问才知道，每架缝衣机的价钱是 6100 盾，店主人，万森兴老板说：货真价实 6100 盾，一仙都不能少，学裁缝的愿望变成了梦。伤心的回到埠温老师店里发呆，温老师鼓励我，不用愁，外面一起干，随着温老师的意思，我在他店里帮忙了半年，店里生意非常旺盛，我想走也走不开了。温老师的意思，店里赚到两人平分，我拒绝他的好意，答应继续帮忙他。但在他店前我放了一厨卖点洋杂货，他同意了，翌日我带着 2400 盾到山口洋办货：买一打七星油、三打退热散、三打止痛散及女人用的海棠粉一打、巴黎粉一打，包在一起，只有现在的四个塑料饭盒那样大，回到温老师的店时，他刚好在前面，温老师对我说你的货还在车上吗？我去帮你拿下来！我把手上提着的货给他看；同时说：只这一小包要你帮忙吗？温老师笑着说，在抽屉里还有一万多盾，为什么你不拿去办货！在温老师的店里我住了近两年，我才搬到这间店，自己开一间店，现在看到我们店里满满的都是货，都是邦夏及山口洋的老板赊购买来的，卖出去赚很少……。

### 被强迫驱赶逃命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好像做了一场梦，两年后，就是 1967 年 9 月 23 日，我和表哥在山口洋黄泥路口见面，两个人拉着手无声无泪的哭了一阵，然后还是我先开口问表哥被赶下来几天了；他说已一星期了，生活没有着落，一家三口跟着难民走，还好刚过八岁的小民林很懂事，渴了饿了也不哭。我知道，他们每天只分到约 200 毫升

的粥水，饿了十多天，就带他们到亚牙的饭摊，各人吃一盘鸡饭，还了饭钱，我将全部口袋里的钱拿出来算了一下，一共还有六千多盾。我拿给表哥 5000 盾，表哥不肯收，我说山口洋我较熟悉，一个人饿不了，你们一家人，人生地不熟，表哥才收下，然后我们在一株大树下，表哥将他们一家被迫害经过告诉我：

我们的村长是大雅族，名叫 ATOT，经常有来我们家吃饭。他很喜欢喝酒，我们家有酒一定请他喝，我们就像好朋友，有事请帮忙，他也不曾推辞。9 月初他三次到家里来，都郑重提出要我离开那地方。9 月 1 日他再来一次，行动异常，也不要在家吃饭，说话有点威吓：这地区已不准华人居住了，如果你们不马上离开，将非常危险！我们辛辛苦苦，日以继夜，劳动了七八年，怎能轻易放弃？我们觉得非常的犹豫、彷徨而且恐惧。9 月 13 日晚上，约 9 点钟，家里来了一群人，他们身体高大，穿树叶为衣服，短头发，脚穿黑皮靴，个个都凶狠吓人，大声的说了许多的话。我听不懂，还要打我们。我们非常害怕，外面又有枪声。过一会儿，村长急匆匆的跑进屋来，向我大声的说：BAPAK 命令你们全家，马上出去，离开这里。我们三个人走到门角，村长和那个像是头人，说了几句话，他（头人）点头了，村长叫我们穿好衣服才出去。我们全家三人穿好衣服，那些人就野蛮的将我们推出门外去，我们在前院不肯走远，他们就向我们头顶空中开枪，我们非常的怕，走到看不见那些人的地方才停下来。

### 家被烧光了、连身上东西都抢光了

我们往家的方向看去，我们的家已被大火烧到屋顶了。我们全家就在那荒野的杂草丛中，在无数的蚊虫攻击下熬了一夜，翌晨天刚发白，还有袅袅的白烟，我们想走近被烧光的家，还距离几十米，就有杂乱的呵斥声：支那，你们想找死！接着有许多枪声及子弹穿过我们头顶树叶的声音。我们没有选

择的机会，只好回头往西跑，走到下午四点多，到达一户人家，我们过去和主人讨水喝，原来主人和我们有一面之缘，前两年在我家里吃过饭，喝过水，我们要求他们给一屯饭吃，当我们吃过饭，已快天黑了，我们要求在他家里宿一夜，他像是胸有成竹，马上拒绝了，同时还要我们马上离开，并指示我往城市方向走，我们不敢多说，无可奈何地再往西边去，走不多久，走进种过稻的再生矮林，杂草特别多，举步艰难，天也黑了，我们摸索着走，不久下大雨了，天更黑，伸手不见五指，还好蚊虫被雨打死了或不忍出来叮我们，但那夜雨的无情冷酷，我们一家冷得骨头里都痛，全身颤抖，蹲着过了一晚。天刚亮我们再继续往西走，走到中午，到达一家很矮的村屋，我们进去想向他们讨饭吃，他给我们一大杓子水，我们轮流喝。刚喝完，两个主人，手拿着弯刀，小的把风，大的就向我老婆扑过去，抢她颈上的金项链及她手上结婚时戴到现在的金戒指，抢光了还踢我一脚才往里屋走。我们就匆忙往外走，不敢停脚的一直往西跑，跑了很久，跑不动了，三个人才停下来全身都发抖，说不出话来。

### 主人十五岁女儿被强暴致死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才安定过来，庆幸没有被杀害，我们被吓坏了，肚子也不觉得饿了。再继续往前走，走到天黑了，看不见路了，我们才在旁边草丛中蹲着打盹。当我们醒来时，天边有点星星，已是三更时辰了，透过星星微弱的光，能模糊看到脚下的羊肠山径，我们继续往前走，走了约半个时辰，我们遇到横在径中的一条小山溪。我们又渴又饿，不管是脏还是净，三个人低下头，喝呀喝，喝饱了才走，走不多远，三个人都觉肚子不舒服，坐在地上，不久就睡着了。我们醒来已是清晨了，我们再往前走了三四个钟头，到达一间村屋。屋前有拜天神的香炉，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直往屋里走，刚靠至门，屋里主人

先向我们打招呼了：“你们一定从很远来吧？快进屋里坐。”我们还没有回答他的话，就向他讨水喝，主人说你们别急，你们太累了，先坐好，我就拿，他往屋后，不久捧着三杯饮料出来，分给我们各人一杯。我们接过就喝，是一杯暖暖的糖茶。

我们喝着茶，主人说，前几天已经下来很多了，都被载到山口洋去集中，你们能全家人口齐全出来就好，先休息一下吧！我去煮饭。我们三个人就在主人准备好的席子上坐着，然后睡着了，当主人叫醒我们时，已是中午十二点，主人先叫我们洗澡，然后才请我们吃饭。主人知道我们饿了，三大盘饭都盛得满满的，还有一碟炒江鱼干及大碗黄豆泡油汤，平时我们家都很少吃这样好菜，我向主人道谢，主人说：何必言谢，我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我的小女儿月娟，十五岁，十多天前被那一群畜性强暴死了。我的日子也不长了，这地方不能久留，你们马上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我们全家活着就好，他好像有说不完的痛苦和委屈，没说完，放声大哭，同时赶我们走，我们不知如何是好，随着屋主的意思走了。

我们走了大半天才到大路（汽车路）。在大路旁，我们更彷徨了，我们身无分文，我们要到那里去？我们要向大路的南方还是向北方走？我们在草地上坐下来，我们在遗憾，我们发呆，突然爱香放声大哭，一向坚强的爱香第一次哭了，民林也哭了，最后三个人围在一起哭。也不知道哭了多久，傍晚来了一辆汽车，下来的像是公务人员，他们把我们三个人同时拉上车去，车上已经有很多人，都是华人，一车满满的，摇摇摆摆颠簸前行，晚上七八点钟，我们被卸落在在一间栈房前面。

### 13岁被迫嫁给50岁

表哥说完了被驱逐及逃难的经过，就回难民营去了，我一个人来到路边的咖啡摊，坐下不久，那位从鹿邑三把沙村下来的难民，约七十岁的年纪带着一个十三岁的孙女，孙女长得

很秀丽可爱。已经是第四次和我们见面了，老人家总是反反复复的乞求：先生，你们行行好吧！收留我孙女，你带回去给她饭吃就好，我老人家不要一分钱，我不久就会饿死了，我死了她无依无靠，她父母兄长都被杀光了，只要养活她一条命，你们要她做什么都可以……坐在我旁边的人，名叫安丁，开口了：“老人家，将你的孙女嫁给隔壁五十多数的老兵可以吗？老人家答应了，就马上带给隔壁的老兵。老兵没有异议，安丁把小女孩带进屋里，老人家双眼泪水滚流，低头离开了。安丁怎样想，那老人家怎样想，我无法知道。三十多年过去了，到现在我的心仍然无法平静。天啊！民族的耻辱，何时雪恨？

1967年9月23日，我和表哥全家见面后，就没有再见面了。1969年4月24日下午，我离开山口洋，乘坐 SEIDAUN 排水量 35 公吨的轮船到椰城，27 日到椰城 PASAR IKAN 码头。在椰城人生地不熟，民族败类多次陷害，重重的刁难，坎坎坷坷，苍天保佑才能站得住脚，生存下来。

### 武林在难民营病死

我离开家乡 20 年，离开山口洋 17 年后，1986 年，社会环境较为安定了，我第一次回家乡。当我从飞机上下来，踏到坤甸机场的地面时，心中很不平静，很惶然。爸爸拥有的几万株树胶园没有了，乡里人称为大屋的房子没有了，我自己创的店没有了，汽车没有了，什么都光了。找到我哥哥，在他的小村屋里住了一个晚上，哥哥告诉我，他已有一千多株柑树，生活稳定，让我放心。翌日我坐车去小村路不远，看到一座座茂盛结满果实的柑园，我高兴了，希望表哥的柑园也这样果实累累。

不久，后面有两个学生，刚放学回家，他们蹦跳着到我面前，我问小弟弟小妹知道南成哥的家在那里吗？他们同

声回答，您找我爸爸有事吗？我说我是从椰加达来的贵亮叔叔，两个孩子说；我爸爸妈妈常常说，非常非常想念您。我问你们放学回家，为什么跑那样快，男孩子说我要赶回去帮爸妈摘柑，女孩子说我要回去煮饭做菜，还要养鸡养猪，前面左转弯不远，黄色的门就是我们家。两个孩子飞快的先跑了，当我到达那黄色的门前时，表哥表嫂正扛着一筐满满的柑，从园中赶回家，把柑放在门前，表哥跑过来和我握手，两人不知从何说起，表嫂拿着两粒又黄又大的柑过来说：叔叔吃柑先，吃柑先。然后表哥领我到屋里，表嫂和小侄女就杀鸡煮菜，表哥和侄儿再到园去将采好的几筐柑挑回家里。晚上七点钟我们才吃饭，晚饭后表哥才介绍给孩子们，我和以前的一些事，同时介绍小侄儿是生于 1975 年，名叫民安，侄女叫民珠，生于 1976 年，今年 10 岁。我问表哥民林去那里？表哥告诉我民林在难民营里泻肚子，身体发烧，没有钱买药给他吃，两三天就死了。

表嫂哭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骂，没人性，没良心、没天理。我们谈到半夜，表哥告诉我，他父母及岳父母留下给他们很多金首饰、金块，还有几粒钻石、共有二公斤多埋在昔多港家的睡床下面，有机会一定要去挖出来。我问表哥那年搬来种柑？表哥对我说：“我们在难民营住了一年多，1970 年，有个好心人介绍我说：古打路有位朋友，忍受不了政府虐待华人的政策，将 2000 株柑园便宜卖掉，准备搬到澳洲去生活，留下一公顷耕地及住房，免费给难民住。1970 年 9 月 30 日我就搬到这里住，开头只能种稻种青菜为生。1976 年才开始向临近的地主赊租块地种柑，经过 16 年的努力耕耘，现在已经种了一千三百多株柑，已经结果的才五百株。我已经 51 岁了，老了，你嫂子都 46 岁了。经表哥这样说，我才认真的看嫂子，嫂子的脸还像青年人一样白嫩，美丽贤慧，文静大方。翌日早上，吃过早餐，向表哥表嫂告别了，平安回到椰加达。

## 种柑被欺榨 心在淌血

1994年民安考入坤甸大学，读了半年，学校放假回到家里帮忙除草，全园柑树果实累累，民安非常高兴。快要开学了，民安到乡村合作社（KUD）联系，合作社都说暂时不买，表哥亲自去了几次，交涉的结果都一样，再过三天就开学了，家里没有钱，全家商量决定，先采8筐大柑，民安自己随车带到坤甸卖给零售商，每公斤一千盾，能卖到40多万，够一学期的费用了。1995年1月28日中午，民安带着8筐柑，到坤甸去读书，汽车来到山口洋近郊，有四个政府官员，检查车辆载的货物，8筐柑当然是最显眼的物品，官员问有运载准证吗？是谁的柑？

民安是大学生，印尼语当然讲得好，先向官爷表明，我是坤甸某大学的学生，同时将学生证给官爷看，说明因为KUD暂不买柑，再过三天就开学了，因为父母家里没有钱，所以采下自种的柑到坤甸卖了作费用，官爷说，你要做生意，要卖柑，必须到合作社买来卖，自己种的柑不准自己卖，你载柑没有准证是犯法。现在你一定要跟我到警察局，罚款或坐牢，民安请司机向官爷说了许多好话，最后8筐柑被没收了事，民安当晚坐车返回家，回到家已是翌早三点钟了，表哥知道柑被抢了，说声岂有此理一拳打在桌上，两个杯子跳到地上了，表嫂赶紧收起杯子，安慰说，不要紧钱去人平安，就算送给鬼吧！其实她心里也在流血。受到这样大的打击，全家都非常难受，民安决定不继续读书了，就跟朋友到安汶地区的山场工作。家里没有钱就和小店的亚永哥借40万盾作路费，跟朋友到安汶去工作。一直等到2月27日，KUD才答应买表哥的柑，拿到四十个筐，采足四十筐柑，3月1日叫工人用脚踏车载到大路旁，中午一点钟，亚克哥的车来载，表嫂亲自交待亚克哥，从KUD收到钱，还脚踏车载的工钱10万盾，还存的柑钱3月5号才带过来。表嫂估计着，每筐柑一般都是50多公斤合共约2100公斤，每

公斤 400 盾，可得到 80 多万，自家还能收到 60 多万，如果卖给亚胶哥，这样漂亮的柑，一般都会另外加二三万盾。

等 5 号收到钱，还给哇弄阿永哥 40 万盾，余下 20 多万，就留作几个月的家用，过年时没钱买衣服给民珠，18 岁的大姑娘，也该给她买两件新衣。3 月 5 号中午，亚克哥来了，亚克哥拿出 KUD 的单来，告诉表哥；你的柑被当作小柑，重量只 1900 公斤，当时我和 KUD 的人交涉，他们很凶，我和他们理论，重量应该是 2 千多公斤，是上等的中柑，我们的拳头小，争不过他们。我从 KUD 收到的钱是 19 万，我的载费就 9 万算，你不用再还我一万盾了，什么天理？卖 40 筐柑还要你垫一万盾。当天晚上表嫂异常的大声骂很多难听的粗话，还骂 KUD 骂政府，没人性、没道德、没天理……，半夜睡醒再骂个不停，从那天起，每天每晚都无休止的骂个不停，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她无病，太疲倦了，受到一点打击，吃了药就会好，看了好几次医生，药吃完都是老样子，不停的骂。

### 民安死了 表嫂也晕倒死了

当年 6 月 7 日中午，表哥家来了两位生客，其中一位是警察，他们带来了 310 万盾现钱及两张文件说是安汶寄来的，叫表哥签名，表哥以为是民安寄回来的，签过名，算过钱的数目对了，警察才说，钱是民安的老板给你们的抚恤金，民安在 5 月 3 日出差时，在大海遇到风浪和他的三个朋友四个人连船一起沉在大海里，失踪了，希望您老节哀……。那两个人刚走没多久，表嫂就晕倒在地上，用各种方法都救不醒，请邻居来帮忙扛到大路坐车去医院，还没到大路，她大力挣扎一下就断气死了。

表嫂及民安的含冤而死，对表哥的打击太重了，要不是为小女民珠的未来，表哥也不想活下去了。邻居的朋友们，知道表哥受到这样大的打击都常常来家里谈天，安慰表哥，表哥

的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但对那地方及事业的感情已经没有了，朋友们主张他搬到椰城，同时帮他出卖柑园，结果值 6 - 7 千万盾的柑园 3 千万盾廉价卖了。

1995 年 12 月表哥及民珠父女两个人带着 3000 万盾，茫然来到人生地不熟的雅加达，经一位亲人热情的协助，在井加连的一处乡村租到一间 3 x 12m<sup>2</sup> 的房子住下来。幸好民珠的活动力很强，第二天就到市场及周围观察，发现早上很多出去上班的人，匆匆吃一小包 Nasi Uduk 或 Roti 就走。民珠就学做着卖，同时到市上办些 Roti 来卖。不到一个月生活费就有着落了，表哥才比较放心。表哥看到来买饭吃的人很多，路过的人也很多，1996 年 2 月就开始学做生意，到当年 12 月，生意已做开门路了。过新年时，父女两人将店里的货总结起来，约值 5000 万盾，十个月赚了一倍。表哥奋斗的精神又活跃起来了。

1997 年 5 月，屋左邻有间 5 x 20m<sup>2</sup> 的房子，表哥租到了，就搬到新店营商。到 1997 年末再将店里的货总结，已值 9000 多万盾，同时还有现款 4000 万盾。过年时表哥高兴，来椰城几年才第一次买鸡，而且买两只，还买两公斤猪肉及一些年货。过了年生意越做越旺了，全店满满都是商品，到了 1998 年 4 月，听说 5 - 6 月份烟涨 50%，表哥就将全部现钱 7000 万盾买香烟，希望 6 月份买出去，可多赚一点。21 岁的民珠，仪表出众，文静大方，举止更成熟迷人了。XX 新村电器厂陈老板的三公子，人品都好，常来店里买东西及招徕电具，认识一年了，父母陪着到店里向民珠求婚。民珠答应了，但提出一个条件：结婚后一定要住在店里陪爸爸做生意。陈老板了解了民珠的家境。就介绍邻居的女儿，四十岁，在银行里工作……。表哥开头不想再结婚经各方周旋，为了民珠的前程也同意了。大家商量决定计划：表哥和陈老板介绍的郭凤仙小姐，择吉日於当年 8 月初 6 日结婚，民珠和陈老板的三公子，陈平平于年尾 12 月 18 日结

婚。

表哥的生意更旺盛了，许多货都放在店门外，顾客买东西，有些时候还要排队等，平平看在眼里，就马上从工厂里选一位好工人给民珠店里帮忙。

### 物品全被抢光 民珠被奸污 全家葬身火海

1998年5月14日的下午两点钟，两个身体粗黑高大的流氓，带着一群人及一辆卡车，来到表哥店前店前，几十个人同时冲进店里，吆喝怪叫进行抢劫，表哥阻止，马上遭领头的拳打脚踢。不到一句钟，从店前到屋后厅的物品全被抢光，连生活用具都被抢走或破坏，表哥又一次由生活富足的人变成一无所有。民珠躲在墙脚哭泣。6点钟，表哥想做饭，才发现全部用具都没有了，或还留下来的也被打破了，想到外面买食品，周围环境又很恐怖。还好匪徒抢劫时还掉下三个面包，表哥拾起来自己吃了一个，给一个民珠吃，民珠吃了两口就不要了。表哥父女两人余惧未消，不知这次大难是怎么回事。在这住了两年，和邻居原住民的交往也很融洽，和邻组长的友情更深了，组长有什么好吃的都会送一些过来，表哥也常送给他们礼物。晚上七点多钟前门马路上人声杂乱，突然有急迫的敲门声，表哥刚打开门一群十多个粗人，强闯进屋来，两个较年轻的夹着表哥拳打脚踢，把表哥推倒在屋角，不让起来，十多个往后屋闯，不久听到民珠的惨叫声妈妈、爸爸救命啊……不久听到那群畜牲的淫笑声，最后是命令声，玩了把她解决掉！约一个钟头后，他们才一个个离开，没有人限制表哥的行动了，表哥马上到后厅去看民珠，看到民珠赤裸裸的躺在血泊中。表哥马上抱起民珠，发现民珠已经断气死了，高喊一声，天啊！你为什么不长眼睛，表哥自己也晕过去。不久，屋的前厅一声爆炸，全屋变成火海。表哥抱着民珠葬身火海。一个为国家创造业绩，发展农业生产、走向发达至富的家庭，在苏哈多暴政灭绝人性，三次有预谋的驱逐、讹诈，奸淫烧杀的践踏下淹

没了。

## 身历目睹暴政暴行 罄竹难书

我是三发县，穷乡僻壤，K村长大的中华民族群体一分子，我看到四十年代，刚从中国来到印尼不久的大叔们，每天手拿锄头在农田里 12 到 18 小时锄地种胡椒的冲天干劲，我父母及兄长每晚一点钟头戴土油灯到胶园去割树胶及收回胶汁到制成胶片，已是中午一点钟了。休息二小时后，下午又到农园去种青菜种胡椒，等等的奋斗过程，体验受剥夺营商权失去生活来源的痛苦；刚创建开学不到一年，拥有 550 位学生的学校，被政府没收心中的伤痛；我亲眼看到 1966 年的示威游行；我亲身体会被驱逐离家逃难没有饭吃喝不到水的艰难和困苦；我在 1967 年 5 月到 12 月亲眼看到了，听到了谁在主使大雅族兄弟驱逐华人；从西哇黎、白芒头、鹿邑、山口洋，我看到许多鲜为人知的人间最悲惨的社会活动过程，我还体验到，发现许多华族亲人被困在鹿邑学校里，生命垂危，乞求富有的人派车去接载被拒绝时，我内心的疑惑和愤怒；我也体会到 1994 年到 1996 年几个奸商勾结官僚统治收购柑桔，坑害华族亲人柑农的狠毒手段，至少有两位中年农民妇女因为收到卖柑的钱不够还运费，想不通而发疯。亲身经历了 1998 年黑色五月，事后亲临视察椰城及其周围地区及爪哇各地的受灾情况，唯锡江及棉兰地区我没能力到场了解。相信 1998 年我们中华族群的商店、工厂及住家在全印尼遭到焚烧、抢劫及破坏的总数超过 20,000 万间。

## 为民族和国家前途大家应精诚团结起来

夜半时，我想到现实：我们中华族群，在商场的竞争中个个都是英雄，在社团组织中，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才是优秀的领导人，坐不到领导位子时，就说三道四或自当主席另起炉灶，或为了个人或一班人的利益而放弃了社团重要的计划，或把社团当自己的公司处理等等不良现象。我相信这都

是因为我们几十年没过有理性的正常集体生活而产生的自然现象。只要大家能组织起来，就是好事，只要大家平心静气的共同研究，集体商量，朝着社团利益及民族利益为最高目标前进！明天华社将会成为一个坚固的整体。

为了中华族群共同的未来，我再具体提出一点建议，供各社团精英，社会贤达及慈善家参考：到三发县、孟加影及山口洋地区去扶贫济急施予粮食、衣着及药品，是第一步。为了要彻底解决，西加华人赤贫问题，华社必须成立一个扶贫机构或基金会，以这个机构的名义向三发县或孟加影县政府申请一块地皮（那里的费用很便宜，地方政府特别支持）开发成综合农园，根据申请到该地定居的贫民的工作能力，分配给他们地皮，并在该地面建一间极简单的房子供他们居住，然后引导他们种稻或种其他经济作物，或养家畜，同时帮助他运输及找市场销售，相信经三五年的努力，他们将能自力更生，续而走向繁荣发达。还有一条和吃饭同样重要，那就是教育，教育他们热爱社区，热爱民族，灌输给他们进步的人生观及生活的道德观念，使他们有求进向上的欲望，引导他们积极努力争取奋发图强。

二是扶贫教育工作：首先动员山三孟三地区帮助全区域的贫苦儿童上学。接下来建筑一所拥有耕地的学校，收容孤贫儿童，供给他们吃、住、穿，给他们像普通人一样上学读书，教他们劳动生产，长大了才根据他们的特长分配培养。这些工作虽是任重道远，但对中华族群的前途是有积极作用和深远意义。

从今天起，我们中华族群不要再被当作羔羊，我们不要再施用舍及金钱买来主流社会的虚伪笑脸、要真诚朴实的尊重，我们要唤起民族的复兴及迅猛的崛起。我们要依靠教育充实民族的综合力量，我们要掀起全民族的大团结，共同奋斗，争取公正和平等及应有的尊严。尊贵的各华社领导精英，各大

企业家、资本家及慈善家，打开你善良的心扉，为中华族群的前途。为子孙后代铺就一条康庄大道，努力筹策组成一个整体，放弃个人利益，避开分裂的阴影，向着中华大团结的崇高理想和神圣目标迈进。为把辽阔富饶的印度尼西亚建设成公正繁荣、安宁美丽的国家，作更多更大的贡献。

转载自印尼《国际日报》( 22/1 - 28/1/03 连载 )

# 铁蹄践踏 奸杀一家六口见证记

—悼念难友杜如明全家遇难 35 周年

红至搏

1965 年 9 月 30 日事变之后，全印尼都动乱不安；示威、劫掠、破坏已成为人们每天关注的大事。西加里曼丹山口洋地区也不例外。1966 年 4 月开始，经常示威破坏，当年 5 月 9 日，在直木港的示威破坏更严重，政府放任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华人知识分子、中华公会、教委会等华人团体领导人，被扣上红帽子，成为攻击的对象，政府强迫他们集中到坤甸，又迫使坤甸华人负责他们的生活费用。我（诸贵亮）就是三发县第一批被驱逐中的人，我反对政府颠倒黑白捏造嫁罪，逃离现场，到山口洋地区躲避，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

## 暴政驱赶数十万华人成难民

1967 年 5 月，在苏哈多暴君的指示下，威迫利诱达雅族，借达雅族不喜欢华人为名，在西加全三发县地区，百多个乡村，推行惨无人道的全面大排华；纵火焚烧、抢劫、掠夺、强奸、杀戳、无恶不作。到当年 12 月，据当时广播电台及报纸的报导，全区十七万二千多人，被驱逐离开用汗水劳力耕耘了数百年而建成的橡胶园、胡椒园、榴连及红毛丹果园，数以万计个温暖幸福的家庭，变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难民。武力强迫他们集中到山口洋等市区，流离失所。又威迫山口洋市区华人承担他们的生活费。

当时山口洋市区华人总数还不到两万人，要养活近十倍的难民，实在是无能为力。每天每位难民只分到约二百毫升粥水。饮用水奇缺，难民营都是破旧仓库，又黑又脏，空气不流通，幼婴儿童及老年人，根本就无法适应这非人居住的地方，死亡率非常高。

10月23日晚上两点，我和几位朋友从打拉鹿内地载来一车难民，共有大小57人，来到红十字会，他们的负责人说，各地的营寮都满了，只好分配到码头路兴薰药房。我们来到该薰房，看守的官人说，五六百平方米的薰房，已经三千一百多人，根本就容纳不了。你们好心人也忙了一整夜，就暂时把他们放下来再打算吧！我听到这些话，就往薰房门走去，还离房门五、六米就听见里面有许多机器声，走到近门时，有一股很臭很热的气味冲出来，我靠旁再往前走，依门柱往里面看，漆黑一片，透过外来天空的微光，模糊中里面地上有许多东西在蠕动，也听到数不清的咳嗽声、哭声、低泣声、泣诉声、呻吟声，幼婴低微的哇哇声。听到这里看守人员，发出强烈的命令声：“上头有令外人不准看集中营，请你马上离开！”我听令离开薰房门，到汽车房，安排难民下车后，马上离开，回到睡觉的地方，坐在地板上，又是个彻夜不眠的晚上……。

### 一天尸首五十人

翌日10点，我到榕树下，找专门负责埋葬尸体的人，他人称“小伙计”，看到他在忙着从三轮车上把尸箱搬下来。我靠近他，叫他小伙计好，他很高兴，人很热情，在交谈约5分钟时间，我才清楚：这位小伙计，开头每天埋葬有一个或两三个尸体，红十字会给他50盾（约值5美元）。现在一天最多是59具，红十字照样给50盾，小伙计说，那钱给少不要紧，有时木板、铁钉也不够，开头是一箱一个尸，现在只好将小的尸，一箱装五、六个了……。

### 救济品跑那里去？

1968年初开始，国际红十字会寄来许多救济品；包括大米、玉米、粟米、沙丁鱼、医药等，据说有几千吨，分配给难民。但又有几巴仙的难民拿到该物品呢？我有个朋友是

货车司机，当时他每天都去坤甸载救济米，从坤甸老埠头，载到山口洋，存到政府仓库里。司机也是难民，他妻儿及朋友领到救济米，为什么经常都是灰黑色的米呢？我们的民族都是信奉真主及玉皇上帝，参加救济工作的人多是穿着漂亮的衣服的慈善者，他们的良心在那里？还有人性吗？

## 军人每天到处抓人，百姓遭殃

1968年，没有新的难民潮了，山口洋市面除许多难民外，到处都可见到军人及特工人员，天天抓人，华人每天都有失踪的，更恐怖了。我和阿丁及温拉等朋友，几乎每天都在市上转来转去，听有什么新闻。看看难民在行乞……当年2月27日晚上，我看到亚答街十字路口旁，有一摊新咖啡摊，桌上没有摆满糖果及糕点，只有一小罐白糖和咖啡粉，看得出那是难民摆的。我们三人就坐下来，要了三杯咖啡，看到摊主人很沉闷的样子，喝完了就走。从那天晚上起，我们三人每晚都来这里喝咖啡，时间久了，接触多了，从女主人口中知道了，她爸爸今年42岁，名叫杜振安，她叫杜如明，今年十八岁，是孟加影半路，雨场港拉乐村来的难民。

5月3日晚上，我一个人来喝咖啡，因为下毛毛雨，我坐的位子靠近里面，和主人较靠近，举目看去，才发现他们父女两人的衣服是那样单薄陈旧，往下看，两人都没穿鞋，赤脚踩在湿地上，脚盘上裹着许多泥，我心理感到十分难受，但也爱莫能助。喝完咖啡马上就回去了。当晚整个晚上翻来覆去，没法入睡，想着一个问题：读书时我知道，伟大的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祖国……现在怎么变成羔羊了？最后还是自己作解答：因为中华民族还落后，还不够团结、不够强大，落后就会受凌辱、就要挨打……。想到这里，听到街边很热闹，原来是天快亮了。

妻子、女儿被奸杀，孩子也悲惨地被杀了，屋子也被烧  
了

1968年6月6日的晚上，街上行人非常少，我一个人不自觉地又来到杜先生的咖啡摊，要了一杯咖啡，刚坐下来不久将下雨了，还刮风，我觉得有点冷。看看杜先生父女两人也表现得很冷，想和他们谈谈话，可以驱散寒冷，就拉开了话题。前几天问如明妹，知道您的大名，现在我也告诉您我的姓名，我姓诸名叫贵亮，是邦夏那边来的难民。杜先生您以前是做生意，开哇弄店吗？

杜先生愣了一下，如明叫爸一声之后，杜先生才回答：那有本事做生意，我二十岁就搬到拉乐村，开山种稻、种木薯青果、种树胶树。经过二十多年的辛苦劳动，我已经有二千八百多株橡胶树，七百多棵胡椒，榴连六十多棵、红毛丹也种很多，家里还存积二千八百多支罗胡椒及五、六百支罗树胶，计划明年将这些东西全卖掉，搬到山口洋住，给孩子们多读点书、学手艺，现在什么都没了。说到这里他长叹了口气。如明又叫爸，停了一会，我再问：杜先生家里还有几个孩子？听到这问话，杜先生面露悲伤、仇恨，眼睛溢出泪水，看看我，看看如明，才开始答话：没有了。如明靠近她父亲，好像示意他说下去。停了一会儿，杜先生哽咽地说，如明她妈叫李香莲，今年39岁，如明的弟弟如钢，今年15岁，妹妹如菱11岁，都没了。

停了一下，杜先生才接下去说：在去年（1967年）12月13日晚上，我家来了几十个穿绿色衫裤的人，他们手上都拿着枪，一进屋几个人就抓住我，把我捆绑在柱头上。然后几个人打我踢我，三、四个人去强迫我老婆，脱掉她的衣服。另一大群人去强迫如菱，脱她的衣服，结果二人的衣服都被脱得一丝不挂，三四个轮流强奸我老婆，我老婆叫冤枉，如纲上前帮她妈妈，被打二枪，倒下死了；十多个在轮流凌辱如菱；如明她妈，拼命挣扎起来，去抱如纲，看到如

纲死了，要去帮如菱，肚下被刺两刀，踢到墙脚，满身是血，也死了。如菱开头还会挣扎，大声叫：“妈妈、妈妈，痛啊、痛极了”，不久就没声音了，手脚在蠕动，十多个畜牲，玩够了才走开。如菱下体流血，停止了呼吸。

那些畜生，整理好衣服，又打我，有个用枪托打在我头上。以后我就什么都知道了。翌日，当我清醒过来时，看到家里除了儿女及她妈，三具尸体外，什么物品都被抢光了。不久又来了一群穿绿衣的人，一看到我，他们就骂：“死猪、死猪、支那，你为什么不死”。之后他们就把我从柱头解开，双手仍捆着，几个人拉着我，然后推到屋外去，将我家仅存的半桶土油，浇淋到墙脚，放火将房子烧了。看到火烧上屋顶了，他们才拉着我到大路旁，然后用吉普车把我载到山口洋，丢到难民营里，等他们走远了，我才踏着沉重的脚步，也不知道渴和饿，到埠头去找我的正在学手工的女儿，就是如明……。

### 放声大哭后的苦咖啡

说到这里，杜先生放声大哭，如明也大声的哭，我想安慰他们，说了许多话，似乎他们父女都没听见，一直大声的哭，我忍受不了这样悲哀的场面，也跟着哭，然后坐下来，用双手托着额头哭泣。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仿佛听见有低微的声音说：亮哥，你喝口热咖啡吧！接着是句粗沉的声音；半夜了，你喝了回去休息吧！

我才惊醒过来，看到如明站在面前，双手拿着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她说：你的咖啡脏了，换一杯新的吧！我才知道刚才那杯咖啡，已掉满了泪水。我伸手接过如明的咖啡，放在桌上，低头一直喝，喝完了很不好意思的说：“杜先生对不起，如明对不起。”就起身回去了。一步一步艰难的边走边想，走到半路，一直觉得口腔里很苦很苦，想起来才知道，刚才喝的那杯是如明忘了放糖的苦咖啡。从那个晚上以后，我和杜先生

父女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了，我和他们谈现实社会，谈如何走向未来……双方好像找到了知己，憧憬美好的明天。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当年九月一日的晚上，天上正下着毛毛细雨，我像往常一样来杜先生的摊子喝咖啡，杜先生有事到亲戚家，只如明一个人做生意。如明看到我来了表现得特别高兴。我们闲聊了一阵子，我才向如明要了一杯咖啡。因为下雨，没有其他客人，如明把咖啡送上以后，就站在我的面前没有离开，继续先前的谈话。因为如明的爸爸不在，我们的谈话也比较开朗自然。偶然间我想进一步了解对方，和她结为好友，就开始认真的向如明看去，没想到，如明也正在认真的看着我。我有点不好意思，看向如明的头顶，瞧见她那乌黑的梳得很整齐的头、黑而细的眉毛、长而弯的睫毛、一双水汪汪充满希望的眼睛。那娇柔羞涩的情态，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几乎不能自主了，举起手想摸如明的头发，想摸如明红润有两个小酒窝而带微笑的脸颊，想拉她白璧无瑕透红润的手……但我提醒自己：不能失礼，就将手收回来。然后看向如明的脸，原来她仍然在注视自己，两对眼神拉成了直线，凝聚在一起，好久好久，我才主动收回视线，说声对不起，坐回凳子上喝咖啡。如明也开口了：咖啡甜吗？我马上回答：很香很甜。过不久杜先生回来了，我和他说了几句话就告辞回去了。

### 漂亮的如明被兵抓走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的晚上，我和四位朋友一起到杜先生的摊位喝咖啡，但这次和往常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到达杜先生的摊位时，没有看见如明父女及他们的摊子，我心里想，杜先生一定将摊子移到别条街去做生意了，就约朋友们一起到其他街旁去找，找了大半天，全山口洋市的街道都找遍了，没有找到，当天晚上咖啡就不喝了。我带着疑惑的心情回去。第二及第三天的晚上继续找，都没有找到，只好请

问旁边的摊子，这一问的答案，就像晴天霹雳。他们隔邻摆摊的人齐声说：前几天晚上两点钟，漂亮的阿明被兵抓走了，杜先生的摊子不要摆了。我问明了杜先生住的地方，第二天就去找他们。在公司山路旁找到了杜先生父女住的地方。我向旁边的人打听清楚，那间 2 x 2 米的草寮，顶上是几张旧塑料袋联起来盖着，靠在红毛丹树旁，墙是用旧纸盒及塑料索连成的，没有门，草寮内还挂着他们父女各人一件旧衣服及一个小饭煲，两个塑料盆，就没有其他东西了。我问杜先生去那里？据说人家介绍他一个好心的宪兵，前天到邦夏去找他女儿，到现在还没回来。

从杜振安、杜如明父女失踪那天起，我每天都不间断的到各处去寻找他们。

### 被抓去审问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凌晨四点钟，住在 X 地我的至亲侄儿带着特务刽子手，到我住的地方来逮捕我，由于先前我已有心理准备，还能逃脱这一劫难，没有被抓走。这事件给我心灵上十分沉痛的创伤，但又不愿亲人受特务的刁难。我知道一年来山口洋安全五位一体首领，也就是当地的宪兵司令，已经救助了一百多位华人脱离死难。天刚亮，我就逃到这位好心的宪兵家，要求他保我的安全。我将全部实情告诉他，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山口洋宪兵部好心的 HARSONO 中校及 IWAI 上尉，你们正义勇敢的行动，我将永远感谢你、怀念你。当天中午十一点，那特务就来宪兵部借人，我就不说二句话跟着他走。特务把我关在旅馆后面一间店屋的房间里，每天半夜都有几个便衣军人来提审，用尽各种刑具，甚至用触电逼供。一连三晚带到大河桥面，三四个兵，用上了膛的几支枪指着，迫我承认他们捏造的罪状，蹂躏到他们自己都受不了，才把我拉回去关起来。

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三十号的下午五点钟，我听到隔壁的收音机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广播电台的声音，中国在西部成功试炸第二颗氢弹。这一条新闻给我带来无限的振奋和希望。

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审讯不能得逞，真的要下毒手了，1969年1月4日，我被带往文岛宜他们的临时审查所。还未进门我就看见如明在屋里面，我感到非常吃惊，但很快躲开，避免和如明打招呼。我在楼后上楼，三天都在后面不敢到前面来。1月7日早上特务到山口洋，命令我不要乱走动，但我还是伺机到前面和如明见面，问明情况。原来如明被强迫抓走的第三天，她爸爸带了个宪兵到文岛宜来交涉，特务答应让如明第二天和爸爸一起回去，要如明的爸爸留下来住一个晚上，讲好了宪兵就回山口洋了。

那天晚上，特务领着如明和杜先生三个人一起到餐馆吃晚饭。那晚凌晨二时杜先生被带了出去，过不久外面只听两声枪响，杜先生就没有回来了。特务告诉如明，说她爸爸自己跳进河里。说到这里，如明哭了，总说活在这世上没意义了。我安慰她，千万别绝望，不要寻短见，活着就有希望……。

### 如明被迫跳河 我听见后就如千刀万箭穿心

1月11日，我又被带往山口洋，关在两项人民命令体育馆的厕所里。厕所的面积是2 X 2，没有通风洞，只在下边有个水洞可通风。11个人挤在一起，有一半是我小时的同学。幸亏每天9点放出来洗澡一个钟头，可吸一点新鲜空气，才没有闷死在里面。直到当年1月19日，我被释放出来，算是自由了，但特务每隔十天八日，还会找我谈话，给我精神上带来非常大的压力。1969年3月7日，特务又来找我谈话，他告诉我他已经调任松柏港办事了。我问他在新地

方的生活情况，他说食宿都和山口洋一样，不一样的就是抓到入犯，不经审讯，就带到横平山枪毙。我心里想知道如明的下落，就问他，你太太也一起搬到松柏港吗？他的回答是：我那里有太太，在文岛宜那是捡来的难民妹，我送你回山口洋的那天晚上她就跳到文岛宜的大河里找她的爸爸去了，我现在又捡到一个 13 岁的呢。那魔鬼讲得很轻松，我听见后就如千刀万箭穿心般的悲痛！

杜振安先生一家六口，团结恩爱，共同努力，耕耘劳动了二十多年的农园财产，刚刚起步，正要走向小康之家，一个美满欢乐的家庭，在铁蹄践踏下毁灭了，消失的无影无踪，含冤九泉。我永远怀念他们，祈望上苍为他们雪耻，为他们讨回公道。在悼念杜振安全家的同时，我也向其他成千上万像杜家一样遭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华人兄弟姐妹表示沉痛的哀悼！

转载自《国际日报》12/9-16/9/02 连载

# 人物介绍



## 砂拉越人民的好儿子

### — 悼念杨贤华烈士

杨贤华（又名小杨）出生于晋连路 17 哩，家境贫寒，以务农为生。他是老大，因此，从小就得上田劳作帮父母分担家务。念完小学就辍学，只得在工余时分自修。

17 哩农村，是革命的红区。居民几近八、九十巴仙都参加革命活动。在反帝反殖战线上，这里的劳动人民坚决勇敢、团结合作，形成一股坚强的力量，坚持不妥协的斗争。小杨生长在这里，自小就深受熏陶。家穷、思想单纯，使他接受反迫害、反剥削的革命思潮。参加地区学习和工作后，他表现得勤奋苦学，工作认真负责。因此，深受赞赏，很快就被派往艰苦的民族工作区，接受考验和锻炼。

在革命组织的第三项总方针——“以地下工作为主，以民族工作为中心，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感召下，他毅然选择了告别亲人、远离家乡、奔赴边疆，肩负起艰险的边区民族工作。

1963 年初，小杨与彭梦合等同志，只携带些简单的衣物，就满腔热情、斗志昂扬踏上征途，向砂印边区进发，直达西加边界的士加央河（卡布尔江的主要支流之一）地区。

他坚决勇敢地迈开第一步，就毫不迟疑地以鲜血谱写他参加革命的光辉史迹。

小杨负责的工作区，是印尼西加中部边界的士加央河上游地区。从中游河岸的 Kp. Enkadok 开始，向上便是 Kp. Palapasang, Sulu, Sekajan 至河尾的 Kp. Sidet; 河南面即是 Sung Kong 山区（此区有七个甘榜），其东面山脚下，便是 Senutu 和 Pol; Pol 之东南方为 Sebakak 山区，有甘榜

Patong 等，毗邻 Serimbu，周围都是达雅甘榜。

这一地区的居民，尚处半原始状态：贫穷、落后、不卫生、多病；他们以“集体换工制”进行山稻生产。使用的农具仅是巴冷刀和勿龙斧；打山猪狩猎亦采集体式—先行侦察探明野兽集中处，便发动全甘榜人前去围捕，猎获后，逐户逐人均分。多数居民一年至多仅有半年粮（谷米），衣不蔽体，男人只着短裤，女的则围一条不及膝盖头的黑冉乌（Jambu），有些还以椰壳制成“遮羞具”绕腰一圈吊於阴部。他们惨遭奸商剥削：一条短裤或冉乌需用几十筒（一筒相等二十牛奶罐的容量）米才换得到。缺粮时只靠木薯、玉米、甘蔗、山茄和野果充饥。他们嗜好腐臭的兽肉，视之为珍品，非逢上等嘉宾绝不取用。他们极少接触外来者，偶尔碰见，顿感恐惧。但，甘榜群众本身非常团结，集体性强，而且很服从甘榜头和长老。

来到这样的荒山野岭，地生人不熟，情况复杂，又不通语言，困难多多。如何开展工作呢？

小杨苦苦思索，记起奥斯特洛夫斯基发出的激励豪语，“困难之所以存在，意是要人们去克服。只有敢于跋涉千里的人，才能攀登群山的顶峰。”于是，他暗下决心，只有向前，绝不后退。他坚信，有组织的领导，有同志们的合作，只要心中有群众，必能拨开云雾见青天。工作一定可以开展，群众一定会站到我们这一边。

解脱了忧虑，轻装上阵，迈开轻盈的步伐，向前，向前。

他举步第一法就是面向群众，深入群众。群众不热情、群众冷漠、有意避开自己，他认为理所当然。群众未了解自己，而且可能曾遭欺骗，具有提防之心，倒是好事。他天天跟大夥儿到稻芭、到野外猎物、捕鱼、找山菜；在甘榜

帮老太婆提水、生火、拾柴……。真是上天不负有心人，日复一日，逐渐形成逐日增多的人群接受了他。在他耐心细致地教育和热情地帮助之下，终于获得甘榜士加央人民的友好相待，热烈支持。

小杨在冲破了第一道难关，建立了稳固的立足点后，他总结了经验，制定计划，准备扩大工作范围，由点到面推展向全区域。于是，他向甘榜中长老提出准备到周围甘榜去开展工作。不料反应极佳，群众大表赞同，还表愿意同行协助。在甘榜头的陪伴下配合几位青少年，开发到 Engkadok、Palapasang、Sulu 及 Sidet 等甘榜。由于有熟人领路，所到之处，均获热情欢迎，还用各种形式进行交谈、开会、共餐畅饮，也搞些福利工作。

1963年8、9月，组织上派张同志去负责士加央河地区的民族工作，给小杨极大的鼓舞。

小杨和张同志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一致确定：一，要准备和开展武装斗争，一定要搞好民族工作；二，要搞好民族工作，必须诚心实意、热情满怀、不怕脏、不怕苦地照顾群众的根本利益；耐心细腻地进行福利工作，形成与群众的鱼水关系；三，搞印尼边区的民族工作，必须充分注意他们是印尼国民这特殊性；四，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立论与游击战的需要做考量，搞民族工作不能局限于一点或一个小范围，必须竭力由点到面，扩展到整个地区，而且必须摸透整个山区、森林的情况以及地形地势；五，必须不间断地、逐步深入地进行调查工作，经研究总结，制定有效的工作计划；有中心有重点的搞，并从中找出典型，推动全局；六，要善于培养、发现甘榜群众的积极分子，使之成为开展工作的桥梁和骨干。同时，还提出必须要求组织上多派些人来，才能赶时间做好工作。

小杨同志组织纪律性强，工作认真负责，有勇气、干

劲足。决定了的事，他逐点牢记，一一推行。会后，他带领同志们走遍工作区的全部甘榜。

近 2 个月的时间，攀山越岭，过平地涉急滩，一到甘榜停留就找群众谈、开会、做调查，工作不休，还参与群众的劳作，为群众治病（用草药），洗伤口、敷药；和群众共餐同眠，无异是甘榜人的一份子。

经此一趟广泛性的工作，一般地掌握了各甘榜的关系和联系，不同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概况，从中还发现甘榜色奴都具有发展为典型甘榜的条件，有利今后有重点，有中心地加深工作。同时，带动了甘榜士加央的几位青少年和色奴甘榜头 Uh 一边工作加倍信心；更加深了工作者对民族工作的认识。对进一步深入搞好工作，创设了条件和基础。

工作有进展，意味着任务更繁重，时间更紧迫。小杨干劲十足，把握时机，调动人力，组成了核心领导组，实行集体领导。随即委派梁亚明和砂孟配合 Uh 向双公区进军，开辟新的工作点。

小杨为着落实“抓住中心一环，创造典型，取得经验，推动全局”的思想实质，决心短期蹲点在 Kp. Senutu。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和总结，洞悉甘榜的全面状态，他大胆地通过 Kp. Enkadok 的一个达雅族小商人，前往 Padawan 他认识的一间店，办了布匹、锅、和盐、打火机等廉价货。然后在色奴都举行一次“全甘榜联欢会”有讲话，表扬、激励；有进餐饮酒，有联欢歌舞；更有分发礼物，进行“货换货”交易。他热情地在会上说，“我们革命组织的领导，十分感激甘榜人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备有一点礼物答谢你们。领导上决定你们每家逐户派送一条男装短裤、一条黑冉勿（Jambu）、一个耐用打火机和三粒火石米。另外备有盐和布、锅等和你们换米。以前你们换一

个（同样的）锅要二百筒米，我们只换十筒，一筒盐以前是换二十筒米，我们只换二筒、一小茶匙“巴拉煎”须付一筒米，以后不必换，我们会教你们自己做……。一件件讲、一桩桩算、一样样换，一对比，群众恍然大悟，如梦初醒，顿感被人欺骗的羞愤。

从此，群众视我们亲如手足，密切非常。常到联络点献米送杂粮；狩猎捕鱼，若有所获也必无次不漏地送北加工作者。特别是甘榜头 Uh，亲自发动群众开辟一块稻芭（与三十一户口同等面积），全由群众合力耕作，收获全献给工作者。他也发动群众远近不分，到处种木薯等杂粮，以备必要时方便工作者取用。这是小杨费心思、爱群众的显著成果。

小杨还大胆地分别在色奴都、士加央和波开办学语言的“学堂”，以之为固定宣传教育群众的场所。这对工作也是重要的一环。此外，带动群众种蔬菜、豆类；讲究畜牧方法，提供“草药疗病”……。总之，进行一切对群众有利的，有助于提高他们觉悟的工作。

1965 年底，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正式建立，士加央区民族工作队改建成第二支队，小杨被委为副政委。在二支成立仪式上，小杨豪迈地说，“今天，我们大家全副武装，配备齐全，庄严建立成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我感到无比光荣和骄傲。我们二支全体指战员是从艰苦中锻炼出来的，我们佩带的武器、背包、军服等全部装备是在组织领导下，全由我们二支队通过统战工作搞出来的。我们还将保存起来的大批武器全数献给总部……。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只要发挥人的积极因素，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什么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决心服从组织，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在艰险的前哨、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钢铁炼成的勇士，忠贞不屈的英雄豪杰”，发自内

心的豪言壮语，鞭策着他，阔步向前，骋驰在为解放祖国必须面对的艰险复杂的武装斗争征途上。

小杨意识到人民武装部队的正式建立，是开展武装斗争向前跨进了一步，一场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决战，即将来临。在思想上有了认识，在行动上即行自我锻炼：他自动参加军事训练，参加侦察巡逻，熟悉地形，摸透地势，还常和战士们讨论游击战、战略与战术；在民族工作线上也和群众谈武装斗争可能出现的局面，贮备军粮，紧急时的联系等等。

他把建立人民武装看成是北加革命的一大发展。他热爱部队，重视思想工作。他常和同志们谈心，了解战士的情绪，常表扬好的、批判错误的。他认真利用二支出版的“战斗报”（以手抄复印本），发表自己的实践体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群众热爱部队的感人实例等内容的文章，以鼓舞启发和教育战士。

1966年间，同志们在抢收蕃薯时遭敌袭击后，他主持了检讨会，指出岗哨麻痹大意、不负责任的错误。他深刻分析“站岗”职务，指出漫不经心、打瞌睡对部队安全的严重威胁，需即刻改正。

敌军逐日增多，分驻每一座甘榜，活动频繁，严重阻碍民族工作的开展，部队活动也面对极大威胁。

部队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在战斗中不断吸取经验，在日常中加强训练，不断提高才能适应局势的发展变化。只要有条件或创设条件，主动出击，歼敌之小股兵力，是有效保存自己和提高自己的形式。1967年中期，敌军逐日分小股调往上游。我二支掌握到其中一股30多人敌兵，日必经一处伏击条件极佳的地带，断然决定去打一场埋伏战，小杨坚决勇

敢地负起实地指挥的重任。从开动员会、侦察、出发到现场分配任务，他毫不含糊、认真地给指导与监督。可惜当敌军将临的时刻，因一战士意外枪走火，一场有望的胜利伏击战却成泡影。回营后，在检讨会上，小杨做了总结，严厉批评出事的战士。

敌军纠结了越来越多的兵力，日益猖狂，步步逼近，特别是它一小队巡逻兵失踪和发现我支队的伏击点后，更是狂妄乱闯，只要我们离营活动，几乎任何一处都要发生遭遇战。可我军绝不能坐以待毙，联系群众，掌握情报，解决粮草必不可缺，也不能一概放弃“主动出击”的。这时候的小杨，沉着冷静，机警勇敢，酷似一位战场老将。

营地可能随时被敌围攻，决定放弃、撤离。政委把病、弱、女同志和营地必搬的物质委托小杨负责带领和处理，还要他找一新地点建营，小杨二话不说，并立即召集有关的人做准备，次日凌晨就先行撤离。

步入 1968 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年头，二支面临生死搏杀的岁月，正月一开头，余百日、沙克便在执行联系任务途中，遭敌袭击，牺牲了；敌军侦察四处，近迫我军，而且残酷迫害群众。与总部、三支、一支完全失去联系，二支陷入孤军作战的困难境地。

二支领导决定派人回国，祈望从这一线了解情况，也要求国内领导协助解决西部部队的问题。在小杨的周密调配下，回国的五位同志顺利出发了。

困难越来越多，局面日渐对我二支不利，二支处在一个紧要关头。就在这样的时刻，二支主要负责人之一投降叛变，还带印军进一步搜山，投传单，喊话“投降”，……。

所有这些，发生在眼前的每一件事，小杨同志身历其境，百感交加。他严肃正确的对待，立场不动摇，斗志更坚强。

对百日、砂克两烈士的牺牲，他痛斥敌人的残暴，亲身参与处理他们的安葬事宜；原来他们二人在近恩加笃处山间打了猴子，到甘榜煮猴肉吃而出事。他召集战友们指出白日、沙克的轻敌麻痹，总结了血的教训。

派回国执行任务的五位战士，历时经年，从未了解到有发生意外，但不回归，小杨内心也诸多忧虑，他认为派去的人既使有产生不回的思想，也不可能是全部人，是不是国内也有问题呢？！

小杨同志始终坚持维护革命利益，坚持斗争，暂保存二支，带领全体指战员战斗下去。他向政委建议，带领战士打回国内，由政委去找联系，他本身带队在新路开展工作。政委赞赏他的积极性，但告诉他暂时不宜实行。并提出由小杨带几个人再回国找组织，并定期赶回边区，小杨立即接受，表示要坚决完成任务。

回国的准备工作积极策划，进行准备。张、杨同志齐出动，带三个警卫去侦察，联系群众，了解砂境敌情。几天后，即行折返营地，不料，去了二、三天，途经 Sedet 一个老稻芭时，碰上大股敌军，敌以强火力，不间断的扫射，三名警卫不知所踪，小杨当场牺牲，张则中弹受伤，身边只跟一个小达雅战士。这一不幸事件发生于 1969 年 2 月 19 日，凌晨五时。

小杨同志始终立场坚定，忠心耿耿、热爱人民，为了西部人民武装斗争，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小杨同志是民族战线上的典范，是人民武装部队的榜样，是北加人民的好儿子。我们永远怀念他。

许贵仁 于  
19-02-2001 古晋

## 一位可敬的西加海上交通员

广平

1968年底，陈瑞庭等同志在执行运输任务时，不幸被捕，因此内河的交通线遭到破坏不能运作。但部队同志要我们想办法在短时间内，把一批粮食运到前方。我们和刘国杨同志（文刀）共同商量后，他同意采用海上运输线（这条线从来不曾用过）并由他主要负责执行。

早在1966年这条线由文刀及何永财、何天庆、古现德等同志先后逐渐完成的，到1967年至1969年主要由文刀、文兴及其他同志负责运输任务。这条海上运输线比原先其他线是最长、最复杂、最艰险的，面对情况多变的茫茫大海，又要避开敌人海上的巡逻和海岸上的哨兵，因此要完成这一任务，是一项不简单而艰巨的工作。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在政治思想上要有坚定的革命性，又习惯海上生活，不怕困难，不畏艰险。（二）鱼船及捕鱼工具，船用的机器。当时机器一时无法解决，改用帆船。从此，文刀等同志的海上运输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一次往返如果没有意外（是指敌情或天气），需要一个星期或十天的时间，相反的需要半个多月或再长的时间。往往在复杂的天气、复杂的海域或夜间行驶，文刀同志都亲自掌舵，风大时手拉帆的绳子要用一定手力来控制船身平稳，特别在风大、浪高、流急时，就需全神贯注与海浪搏斗，丝毫不能松懈、大意，否则船随时有被大浪打翻的危险。遇到逆风、逆流时，就要用桨来划，往往一小时的行程，就要划上一天的时间。在夜间碰到下雨又吹风时，全身湿淋淋，冷到你发抖，牙齿打架，双手麻木，那种滋味真得很难受。肚饿时用饼干或干粮淡水充饥，淡水用完，就喝海水，白天天气炎热时，就跳到海里冲凉。有时为了避风或有敌情，船暂时驶进海边的暗沟里，本来可以轮流休息，但海边那种小蚊子咬到你手脚不停的

摆动、拍打，无法入睡。有时到联络点天未黑，船又要驶到公海靠近国际航线抛锚等天黑。船的排水量只有三吨，一条船通常两个人，一前一后根本没有条件休息，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直等到回来才换。文刀同志每次回来，体重要减轻几公斤，眼窝凹进去，眼眶发黑，眼球布满红丝，走起路来脚步飘浮（因在船上摇摆的时间太长的缘故）。由于长时间抓帆的绳子或划浆时两只手掌也起了很多水泡。每当讲他辛苦了，他总是笑呵呵，开朗的回答：“干革命嘛，受一点苦算得了什么！”

文刀同志对工作负责精神，有和他接触过的人，是有目共睹的。有一次得到通知，要把一批粮食很快运到部队去，由5位同志分两条船负责执行，其中一条是由文刀及邓远达两同志负责。那时恰巧是年尾天，海上一直吹东北风，风大浪高这样的恶劣天气，用帆船逆风行驶，是一项难上加难的事。所以，另一条船出发五天，还没有驶出假狮海岸线的范围，被迫返航整船的粮食都被海水浸湿。再说刘、邓两同志，船一出海不久，就和另一条船失去了联系。他们日夜在海上与风浪搏斗十多天，终于到达目的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碰到的困难可想而知，如疲劳、寒冷、饥饿和危险时刻侵袭着他们，他们本着向革命、向部队同志负责的精神，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们用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来鼓舞自己的勇气。十多天用干粮配海水充饥，口干到喉咙咳出血丝。

另有一次，文刀同志在巴罗时，独自一人，每个月要到打玛若（是禁区的范围）与部队同志联络一次，足往往返三个多月才联络上，每次往返要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后来一个晚上，就在这禁区的海滩上，遇上印尼的民防队。在未搜查前，他机警地把身上带的文件，放进嘴里咬烂吞进肚里，但被其中的一个敌兵发现他吃东西，问他你吃什么？并用手电筒往嘴里照，什么东西都没发现，文刀说我吃药，你

们不信给你看，边说边拿出退热丸吃给敌兵看，这样暂时打消敌兵的怀疑（后来在审问中对吃药一事，敌人还召来有关的群众对这件事来对证，群众一口承认，文刀患有一种怪病，经常要吃药，去那里身上都带着药，而且晚上到处乱跑）。敌人搜背包时，拿到两本小册子（毛主席语录及革命歌曲）但敌兵看不懂中文，问文刀这是什么书？回答是药书，敌人把小册子放进背包边的小袋，连夜用船把文刀同志载到巴罗其总部去。在船上途中时，文刀同志机警的把那两本小册子取出并扔进海里，文刀同志暗想现在不怕了，敌人手上没有物证。在几天几夜的疲劳审问中，问不出什么东西，四个民防队的口供又不一致，被其上司大骂一顿。文刀同志在群众担保下，终于被释放了，但还限制在群众家，不能外出。

几个月后，在群众的帮助下，偷偷的走出了这个限制范围，重新和同志们取得联系，并继续他的海上运输工作。船在1969年才改用机器推动。到1970年底，文刀同志进砂拉越境内才停止他的运输工作。

注：刘国杨同志（别名文刀）是北盟成员，北加人民游击队成员。他出生于西加假狮地区，是椰农出身，受过华文小学六年的教育。1966年，在印尼地区上参加工作，翌年到巴罗建立联络站。1968年到70年参加运输工作。71年到海口区士巴岸地下领导中心学习班学习。1971年3月参加青山反“围剿”斗争。同年6月4日在老路15哩跟敌人驳火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0多岁。

## 编后话

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印尼苏加诺政府的“抗马援北”政策下，我们有数百名热血青年奔赴砂印边界，和西加同志与群众曾有一段可歌可泣、令人难忘的血泪史。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无数砂拉越同志在异国他乡日以继夜的战斗，以至血洒沙场；也有许多可敬的西加同志为我们的事业，风雨同舟跟我们战斗在一起，以至付出宝贝的生命。这是一首值得讴歌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赞歌。

令人欣慰的是，第五辑的《友谊丛书》多少能反映当年的边界风云的一些斗争事实。本书的刊出，希望能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往后能不断地收到能反映类似砂印儿女风雨同舟的斗争事迹的来稿。

令人钦佩折服的是，西加同志与群众长期来为本国事业英勇艰苦、不屈不挠的战斗。这种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战斗不息、不断发展强大的力量源泉。尤为进者，当年他们更勇于冲破民族狭隘主义与闭关自守的藩篱，跨越国土、民族和时空的鸿沟，把思想境界引向更加广义宽泛的国际主义的高度。回想当年有多少的西加同志与群众在本国、在异国尽心尽力、艰苦奋斗，甚至抛头颅、洒热血，这种高尚无私的精神将永铭刻在咱们心里。在此，请允许我们——作为当年并肩战斗的战友，向他们——亲如手足的战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沉重的悼念！

值得高兴的是，有多位朋友能写出或讲出自己当年的风雨战斗经历。我们期盼能有更多的朋友能动起笔来，写出自己难忘的战斗经历。

印尼是我们的毗邻，印尼华人跟我们有渊源密切的关系，对于他们的处境我们深表同情与关注。我们也深信，他们会积极努力，奋发向上，找出自救自强的出路。

印尼是我们的毗邻，印尼华人跟我们有渊源密切的关系，对于他们的处境我们深表同情与关注。我们也深信，他们会积极努力，奋发向上，找出自救自强的出路。

最后，我们还得声明：本丛书所有文章的立场和观点不代表本会以及本编委会的立场与观点。

编委会  
2003年10月

《女童丛书》之五  
《砂印边界风云》

出版者：余清漫

736K, Taman Ecorich,  
Jalan Tg. Batu, 97000  
Bintulu, Sarawak, Malaysia.

作者：罗丁等

印刷：诗巫联成印务公司

初版：2003年10月26日

定价：RM16.00

国际书号：ISBN983-40483-4-3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ISBN 983-40483-4-3



9 789834 048341